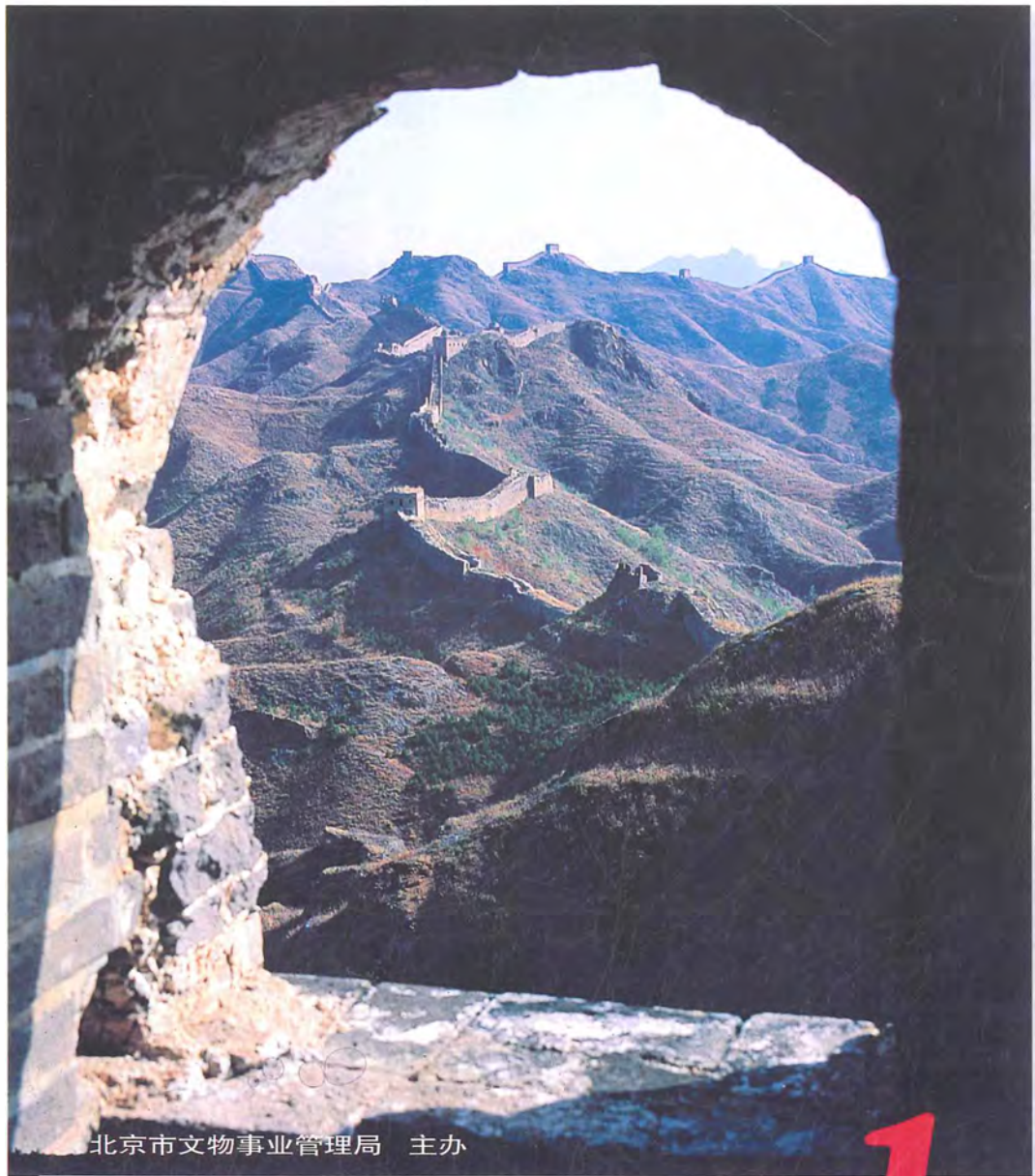


北京文博

BEIJING WENBO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主办

1999 **1**

燕京汽车 厂出土的



◎ 墓门上部影作结构

唐代墓葬



◎ 塔



◎ 西壁上的壁画

1998年12月9日，位于陶然亭东侧的燕京汽车厂院内出土了两座唐墓和一座金墓。其中的一座唐代砖室墓规模较大、影作结构繁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该墓为单室结构，由墓门、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通长约5.28米。墓门南开，墓门墙残高约3.6米、宽2.72米，中为券门，两侧及上部影作立柱、门簷、阑额、柱头斗拱、补间斗拱、人字拱、挑檐、瓦垄等结构。甬道长1.69米、宽1.22米、通高1.68米。两侧各有两个小龕，砖雕灰塑成力士及菩萨形象。甬道两端砌有两道封门砖。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弧，南北长约3.6米、东西宽约3.7米，墓壁高约2.92米，穹隆顶已不存。棺床位于墓室西北，西北临墓壁，东、南两面作成须弥座形，妆饰有壶门和彩画。墓室四角及东、西、北三壁中部影作出七根立柱，上有柱头斗拱，柱与柱之间以阑额相连。四壁上部对称妆饰八个小龕和放置十二生肖的小台。十二生肖用整砖刻成，外涂以灰塑，现只能见到两个残坏的躯干，躯干为人形。



◎ 东壁南侧的小龕

南壁券门东侧影作一灯台或衣架，西侧影作两把椅子。西壁南部有一塔形浮雕，用砖磨成。西壁北侧及北壁西侧各有一幅壁画，西壁上为墓主人及侍女形象；北壁为马厩，内绘马夫和一骏马。北壁东部及东壁的南北各有一个壁龕，壁龕外观影作成建筑形式，均有彩画。其中，北壁上的壁龕内部空间较大，南北宽0.84米、东西长0.87米、通高1.37米。

该墓早年被盗，仅出土了一盒墓志和几个小陶罐。墓志首题为“大燕柳城何府君墓志铭并序”。

文：王策
图：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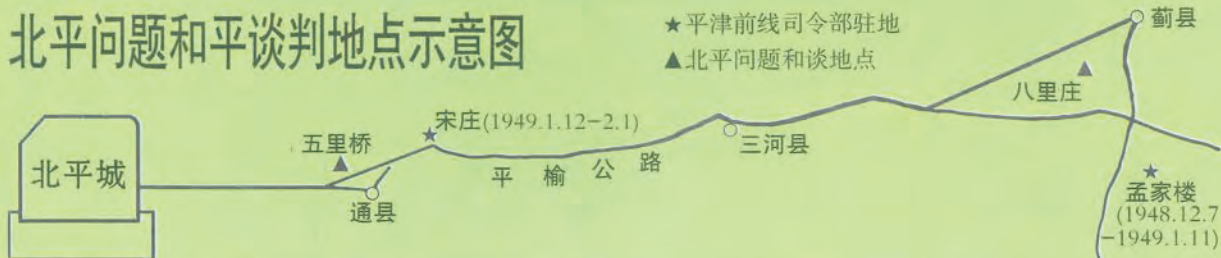
◎ 墓室内的柱及柱头斗拱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



① 中共北岳区党委机关报《北岳日报》1948年12月18日头版头条报道人民解放军四面八方包围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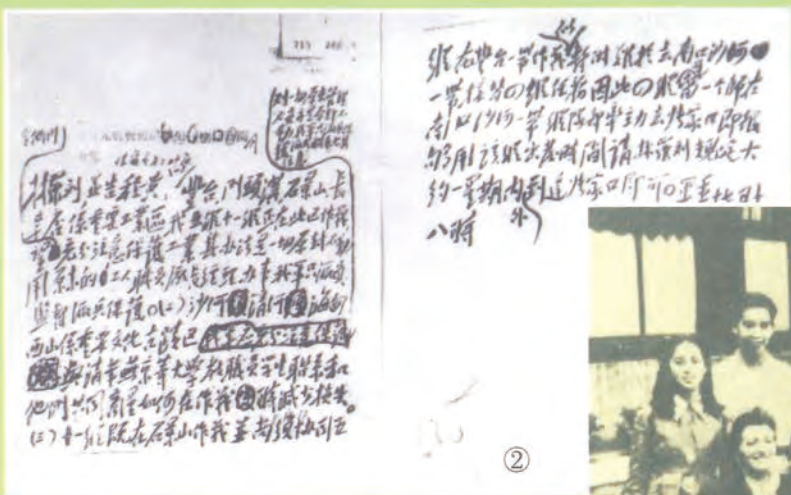
北平问题和平谈判地点示意图



(孟家楼村距北平约90km, 宋庄村距北平约25km)

③ 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先生全家合影。右一为其幼女何鲁美, 后遭国民党特务暗害牺牲。左一为其长女何鲁丽, 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彩二)



② 保护古都北平文化遗产和设施, 成为北平问题和平解决双方和北平市各界人士之共识。图为毛泽东主席起草、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于1948年12月17日发出的关于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电报指示手稿照。



③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



① 原国民党军华北总部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为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立了大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称赞。图为1949年3月25日，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西苑机场热情迎接刚刚到达北平的毛泽东主席。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同志出任解放后第一任北平市委书记。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任职中共北平市委第一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

④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时半，人民解放军北平警备部队在第41军政治委员莫文骅将军率领下开进西直门，宣告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2月3日，举行北平入城式，毛泽东指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人民解放战争的总结。



⑤ 庆祝北平解放大会于1949年2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20万军民参加，图为会场主席台——天安门城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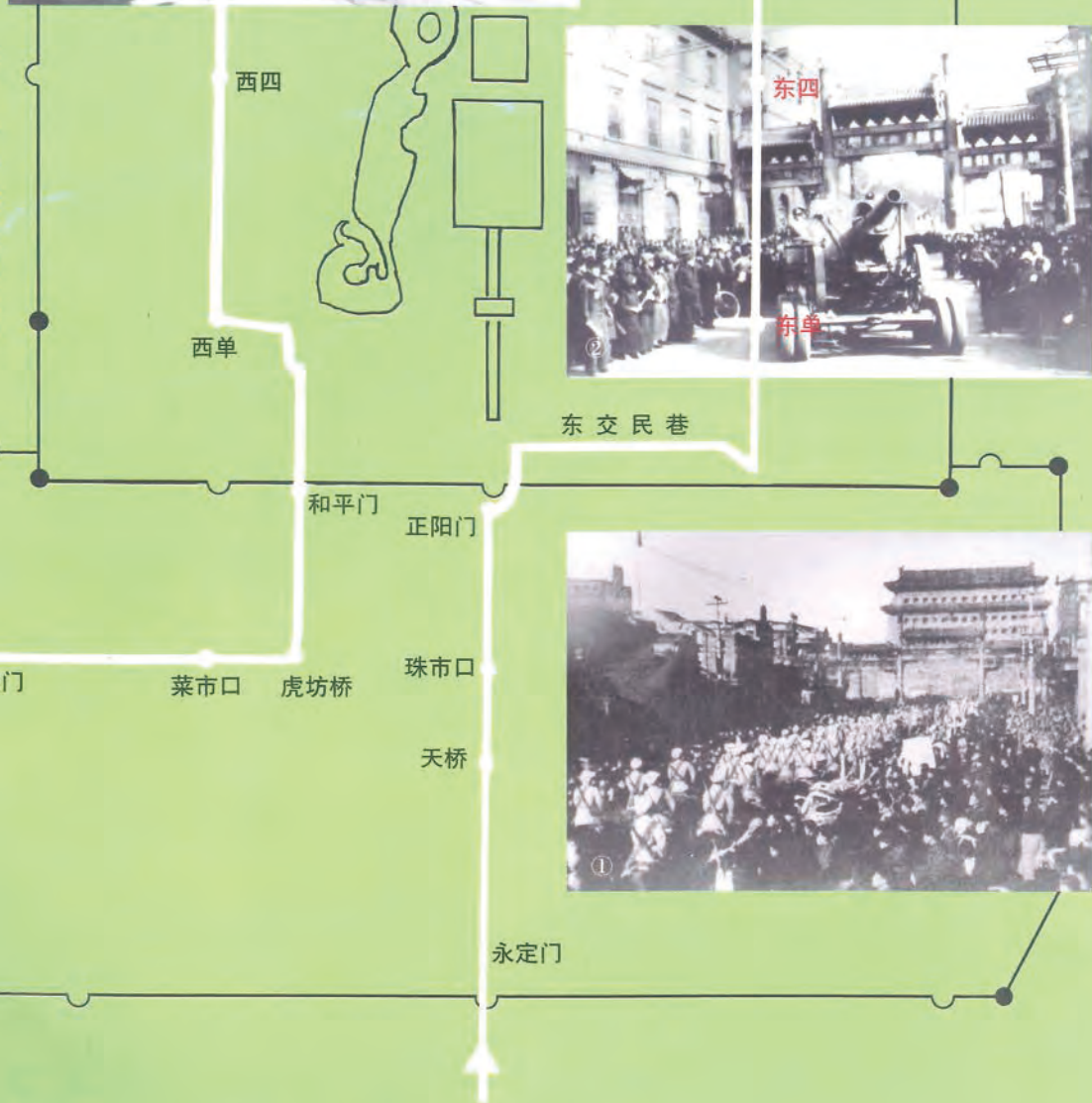
⑥ 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三将军在正阳门箭楼上检阅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行进路线图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



- ① 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队行进在正阳门之前。
- ② 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队行进东交民巷。
- ③ 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队行进在地安门附近。

(彩四)

(李铁虎 撰稿)

(图片：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档案馆)

卷首语

《北京文博》创刊四年多以来,以研讨文物工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介绍文博领域的研究成果,宣传党和国家新时期文物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为宗旨,形成了政策性强、资料翔实,学术气氛活跃,动态信息及时的风格和特点,成为指导全市文物事业发展,服务于各级文物部门的重要阵地,受到广大文物工作者和热心文物保护事业人士的喜爱。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物荟萃,丰富的文物资源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北京的对外开放、发展旅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挥北京文化中心的功​​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北京的文物保护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文物工作者和所有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人们,群策群力,理清思路,把握机遇,迎难而上,推动北京文物事业以新的面貌迈向新世纪。

在这方面,《北京文博》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特殊的作用。更贴近现实,努力地揭示和总结文博事业发展的规律,更富有开拓性和指导性,更加积极地倡导新观点、新事物、新经验,衷心希望《北京文博》“百尺杆头,更进一步”,成为集指导性、学术性、资料性为一体的优秀期刊。

梅宁华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八日



北京文博

精
初
題

1999.1(总15期)

● 文物工作

- 美国博物馆管理管窥 中国博物馆访美代表团(6)
一九九八年北京地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成就
..... 王有泉(10)
天坛历史文化挖掘与现代公园建设 姚 安(13)
浅谈《北京文博》的选题思路 张 岩(16)

● 文物与考古

- 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分布地域与年代分期 王继红(19)
圆明园之藻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王有泉(39)

●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 50 年

- 北平和平接管史略 季 华(57)
半个世纪的回忆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一次秘密活动 周士琦(63)

● 北京史地

- 藩镇统治下的幽州 何 力(65)
万寿寺选址成因考 孔祥利(69)
密云长城“四路”营城 城堡 关口 城楼 郑云山(78)
《傅恒宗祠碑》与大金川战役 李 巍(84)

● 古建修缮

- 灵严寺大殿修缮工程概述
——灵严寺大殿构造简述及其年代初探 李小涛(89)

北京文博

襟
初
題

1999.1(总15期)

● 文物鉴赏

玉璧鉴赏 李 宏(93)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1998 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王辅宇(98)

封面、封底:金山岭长城

封二、彩插一:燕京汽车厂出土的唐代墓葬

彩插二、三、四:纪念北平和平解放 50 周年

封三:老舍纪念馆开馆

东岳庙民俗博物馆开馆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白

副 主 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秦公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成大生 张 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荣太为 赵其昌 侯 明 晋宏逵 徐 伟 徐 明 靳晓峰
韩 永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铨

主 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魏伯涛 张岩

美术编辑:田冰灵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BEIJING WEN BO

NO. 1, 1999

● CULTURAL RELICS WORK

- Notes on Museum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 by Delegation of Chinese Museums to USA (6)
- Main Achievement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groun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ng Area, 1998 by Wang Youquan (10)
-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the Heaven Temple and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Park in the Temple by Yao An (13)
- On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 Selection of the *Beijing Wen Bo*
..... by Zheng Yan (16)

●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Reg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the Animal Designs of the Shanron - Culture
..... by Wang Jihong (19)
-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Zaoyuan Site in the Yuanmingyuan Palace ...
..... by Wang Youquan (39)

●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BEIPING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aceful Taking-over of Beiping by Ji Hua (57)
- Recollection Going Back Half a Century: A Secret Activity on the Eve of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Beiping by Zhou Shiqi (63)

● BEIJ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 Youzhou District under the Rule of the Outlying Province Commander
..... by He Li (65)
- Background of the Location of the Wanshou Temple by Kong Xiangli (69)
- Castles, Forts, Passes and Towers along the Branches of the Great Wall at Miyun
..... by Zheng Yunshan (78)

BEIJING WEN BO

NO. 1, 1999

"Stela of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Fu Heng's Family" and the Dajinchuan Campaign
..... by Li Wei (84)

● REPAIRS OF ANCIENT BUILDINGS

A Summary of the Repairs of the Main Pavilion in the Lingyan Temple; On the
Structure and Date of the Pavilion by Li Xiaotao (89)

● CULTURAL RELICS APPRECIATION

Appreciation of Jade *Bi* Discs by Li Hong (93)

●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Event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
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4th Season, 1998) ... by Wang Fuyu (98)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u Jimin, Li Xueq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ans: *Mei Ninghua, Liao Jimi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Qin Gong*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Rong Dawei, Zhao Qichang, Jin Hongkui, Xu Wei, Xu Ming, Shu Xiaofeng, Han Yo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Art Editor: *Tian Bingling*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美国博物馆管理管窥

中国博物馆访美代表团

1998年12月6日至18日,作为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丹佛大学、亚洲艺术协调委员会文化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博物馆代表团一行六人赴美进行了学习、考察和文化交流活动,北京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此项活动。在美期间代表团参观、考察了塞克勒——弗利尔美术馆(属于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博物院系统)、丹佛艺术博物馆(州立博物馆)、圣特菲国际民俗博物馆(市立博物馆)、华盛顿纺织品博物馆(私立博物馆)、TOAS部落村落(新墨西哥州印地安人保留地)等7家博物馆和丹佛大学(该校开设人类学系和博物馆专业)。代表团还与美国新闻总署国际访问者中心与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的官员、肯尼迪议员艺术与人文问题法律专家、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美国博物馆协会负责人、丹佛市亚洲艺术协调委员会负责人等,就博物馆管理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了解、学习到了美国一些博物馆在管理与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将代表团通过考察交流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取得的一些认识摘介如下,以利于学习、借鉴,推动我市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一、多方面筹集事业经费

美国所有博物馆皆属非赢利机构,皆可以向公司或私人筹款。在美国只有史密森博物院是国家级博物馆,其每年经费的

70%由国会批准、政府下拨。但近几年,属于史密森系统的国家博物馆也感到政府拨款的不足,也开始自己寻求部分经费。其他非国家级的博物馆,如州、市立博物馆的经费只有少部分由州、市政府拨给。美国联邦政府设有三个属于政府机构的基金会组织,即艺术基金会、人文基金会与博物馆、图书馆所,这三个基金会中,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所是专为所有不能得到联邦政府拨款的博物馆提供资金方面支持的机构。1997年美国近8000个博物馆中有1200多个博物馆向该所提出申请,有19%即近200个博物馆获得1.8亿美元的支持。但支持的额度并不高,最高者两年能得到12万美元。其余两个基金会,特别是艺术基金会每年也受理并资助非国家级的博物馆之艺术项目。但由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的基金会毕竟不可能为众多博物馆提供更多的资助,所以,几乎所有非国家级的博物馆都要由自己筹集基金,而私立博物馆的事业经费则全部是由自己筹集的。例如圣特菲的国际民俗博物馆属州立博物馆,州政府下拨的款额一年约70万,用以解决员工工资、水电、维修等行政开支,但办展览等业务活动费用则由自己解决。这种情况在非国家级的公立博物馆中是有代表性的。又如华盛顿的一座私立博物馆——纺织品博物馆,每年预算为200万美元,其中只有20%来自联邦基金会拨款,其余皆要自筹。公私立博物馆筹款的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亦有许多共同的做法,概括而言,有如下几种主要方式:

1. 设立永久的基金,以投资的收益部分来支持博物馆事业

基金主要来自私人捐助。博物馆董事会一般都是主要的筹款人,董事本身即是大公司主持人,很容易帮助博物馆向该公司募捐。许多博物馆都已有或正在努力筹集资金来设置永久性的基金,作为自己财务上的保障。例如上述华盛顿的纺织品博物馆是一个小馆,年预算 200 万美元中有 20% 即来自其永久性基金。几年前该馆已有基金 500 万元左右,近几年该馆又计划扩增 800 万,至 1983 年底已筹到 748 万,接近预期目标。这笔基金的捐款人有近百人,大笔捐款人有 60 人左右。至今年底这个小馆即已有永久基金近 1300 万美元,这样该馆每年即可以从这笔基金中提取 50% 的数额用来开展业务活动(5% 的基数是本金与投资股票、债务所得利息之总合,以三年平均值计,基金中有 30% 为债券 70% 为股票)。为了保证永久基金的不亏损,该馆特意请了专门的投资专家,在董事会中也设有财务委员会负责确保永久基金投资的正确。华盛顿的另一私人美术馆菲利普藏品馆,也正在筹集永久资金,为此亦雇用了金融专家作顾问,与董事会共同计划基金的投资方向。

不仅是小馆,大型的国家博物馆多数也有各自的永久基金。例如属史密森博物院系统的弗利尔美术馆在 1910 年时即已由弗利尔先生捐助一笔永久基金。近十年中,弗利尔的这笔基金的本金已从诸类利息中得到增补,使总额增长了近三倍。

美国博物馆所以能从有钱的个人与企业中募集到大量捐款建立永久基金或专项基金,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政府的税收政策有关,其政策规定,凡个人或企业向文化教育事业捐款,即可将其税金减少同样数额,同时纳税部分的税率也可以有一定幅度的降低,这对于税率很高的美国公民个人与企业来讲,自然是具有极大的鼓励与导向作用的。这无疑是美国博物馆能从私人

企业征得大量捐款的主要原因。

2. 为举办特展与开展专题项目临时征求赞助。

除募捐以建立永久基金外,美国博物馆在举行常设展览外的特展或举行某一专题研究性质项目时,也往往成功地募集到经费。一些企业愿意赞助这样的展览或项目的原因,除上述税收政策的刺激外,也因为要借助某一著名博物馆或其主办的某项较有影响的活动,通过新闻媒体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并在公众中创造良好形象。因此,博物馆在使用企业所捐资金时,要在有关宣传材料中提到这些企业捐助者的名称。但是博物馆不会直接为这些企业的商品作促销广告。企业为博物馆作贡献不仅捐款一种形式,也可能是承担某项工作,如为展览印制广告与图册。

由于需要企业的支持,所以美国各博物馆及有关的非赢利机构在平时十分注意与企业界建立良好的关系。例如,亚洲艺术协调委员会在对外散发的自己组织的介绍材料中列出了提供过赞助的公司、企业名录,并经常为这些机构举行招待会,进行联谊。

国家级的史密森博物院的资金虽有 70% 来自联邦政府,但其余 30% 也来自企业与私人捐款,也需要不断寻求资金来扩大自己的活动。近年来募捐的主要目标已由公司、企业转向个人,为此,史密森博物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私人筹款委员会。

对于博物馆如何向个人或公司争取资助,科罗拉多艺术商业委员会主任与丹佛市犹太博物馆顾问莱斯里(leslie)女士等,在她们讲演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如帮助公司提高其员工的艺术修养,以增加其创造性,方法是给这些公司一些看展览或参加音乐会的优待券。又如为公司负责人们举办高档次的午餐会,为他们创造联系的机会。据统计 1997 年全美企业对艺术事业的支持达到 11.6 亿美元。

二、努力扩大与公众的联系

1. 建立会员制度

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小博物馆都实行会员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会员包括个人与团体会员两种。会员人数也都相当可观。如丹佛州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有44000名会员,华盛顿一小型的私立美术馆菲利普藏品馆有活跃的会员5700名,其中有120个公司会员。华盛顿私立的纺织品博物馆在这方面做得尤其突出,会员除遍布全美诸州外,还分布在国际上50个国家,每年可收入20万元会费。凡是会员每年都要交会费,会费数额各馆不等,如史密森博物院会员每人每年会费为30美元,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50美元,丹佛自然历史博物馆一家四口一年收55美元,圣特菲的国际民俗博物馆一人一年45美元,夫妻俩65美元,高级的会员费是5000美元。会员有一定权利,如规定一年可有几次活动免费进场,定期收到免费邮寄的博物馆所办刊物,或者到博物馆开办的艺术品商店买东西时可以打折扣等。一般来讲,会员费的总收入都要超过给他们提供的优待。更重要的是,会员中有许多人实际上是博物馆筹款募捐的主要对象,团体会员更可以帮助做这项工作。此外,会员中许多人还自愿到博物馆作义务工(简称“义工”),并做其它宣传工作。

总之,会员制度不仅沟通与密切了公众与博物馆的关系,扩大了博物馆的影响,而且对博物馆事业从财政到业务工作都有极大的帮助。

2. 推行义工制度

在美国博物馆中,各项实际业务工作,如文物保管、展览讲解及各种研究工作,都有义工参加,这是美国博物馆中另一比较普遍实行的制度,是在其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得以顺利推行的。义工有在校的大

学生、公司的职员、退休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的夫人(例如华盛顿纺织品博物馆以义工身份为代表团做讲解的即是前驻中国大使恒安石的夫人)等,当然他们都是对博物馆,对文物有浓厚兴趣的人。义工在博物馆工作范围很广泛,可以作展览的讲解员,作文物、保管工作,也可作文物保护修复工作。退休的专家因其专长与外语水平而被请来作专题研究或整理重要文书档案。例如新墨西哥州历史博物馆即聘请该州已退休的原子能、导弹专家在馆内从事外文图书的整理工作,使他们的语言才能得到发挥。义工不收取报酬。与大学有合作关系的博物馆,作义工的大学生可以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结合从事的工作进修某项业务。大型的博物馆每年都有大量的义工,史密森博物院是这方面的典型,其员工共有6600名,而义工即有5000名,每年可节省资金数百万美元。在小型博物馆中,义工人数甚至会超过正式职工,如圣特菲的国际民俗博物馆正式的职工只有26名,而义工竟达百名,当代表团参观该馆时,看到在许多部门有义工在认真地工作,与正式职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由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到义工制度对美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影响。

三、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美国博物馆普遍重视发挥其教育职能并体现于各项工作中,这点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是博物馆的展览内容经过精心设计多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性,例如丹佛的犹太博物馆是座小型博物馆,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出色。该馆展览民族性很强,以展示犹太人的文化为自己的使命。每年该馆皆要搞“大屠杀”展览,揭露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又如新墨西哥州印第安艺术与文化博物馆开设的反映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文化的“目前、现在、永久、将来”展览,即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民族风格向世界表明印第安文化至今仍在的事

实。

其次,博物馆往往配合展览搞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在史密森博物院负责设计、实施教育项目的部门负责人凯勒(Carol a. bogash)女士介绍,该部很像大学的继续教育部。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教育给公众。教育形式极丰富,例如,配合展览举办各种演讲会,每月皆出版专门刊物介绍该月与展览配套的各种讲演。所有华盛顿社区的人皆可以来史密森博物馆参加讲座,会员即可以免费。史密林博物院的一个宗旨即是把专业艺术知识传播出去。

不仅大馆,小馆也将不断更新教育项目的内容与形式列入每年工作规划,如丹佛的犹太博物馆专设有教育主管,使每个展览都有明确的带教育性质的主题,经常组织参观团体,利用其有限的展览空间多作教育活动。特别是经常与学校联系,征求对设计展览的意见,看是否合乎教学需要,应该搞什么样的展览来辅助教育,通过此举努力争取中小學生观众。该馆在搞“大屠杀”展览时还聘请教师来讲这个题目同时配合搞电影宣传,并组织会议讨论有关大屠杀问题,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在丹佛艺术馆也设有教育部,其特点亦是注重对学生的教育,代表团在参观该馆时,即看到若干学生团体由教师带来参观。该馆许多展览皆有供中小學生动手的内容,使学生能触摸展品或模拟物,通过实践性活动来理解展览内容。不仅如此,该馆还大力开展成人教育,已成为社区成人教育的重要场所,有许多年龄超过进入大学的成人来这里学习。同时丹佛大学与此馆有长久的合作关系,丹佛大学教师可在丹佛艺术馆里担任职务,丹佛大学选修博物馆学课程的学生可以在这个馆中选修有关艺术或考古学的课程,取得学分。

总之,美国不少博物馆有很强的自觉教育意识,非常自然地将展览及其它专业活动与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公众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博物馆真正发挥了对民众教育的功能。

在美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两周时间内,代表团亲身感受到美国博物馆界有许多对我们有启发的做法,除上举几点最重要者外,在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工作效率、藏品保管与研究、展陈形式、大学博物馆学教育等方面也都有许多长处。代表团认为美国博物馆事业能够比较发达的原因,一方面是与其它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保障了博物馆能够获得(或能够通过努力争取到)事业发展所必需的足够资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美国博物馆界已摸索出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关系的途径,即充分利用政府给予非赢利组织的权利,积极地、主动地争取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如舆论的、经济的)支持,既有效地得到经济收益,又在此基础上较好地保持了博物馆作为社会公众教育重要机构的形象,对美国公众的文化生活与社区教育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代表团感到,中国博物馆界可以从上述启示中学到不少东西。比如,如何在当前国家投入不足情况下借鉴上述美国博物馆的一些方法主动地争取企业界与有经济力量的个人的支持,逐渐地走上自我发展的正常轨道;如何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的性质、任务,将博物馆真正办成一种重要的公众教育机构;如何很好地通过自身努力克服以往与公众脱离的倾向,通过类似会员制(或“博物馆之友”制)义工制度,通过展陈方式的改革并增加观众动手、介入的项目,使博物馆的活动成为人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真正赢得公众的热爱与关注。

凡此都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当前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代表团认为,立足于中国现实条件,有选择性地采用美国博物馆界行之有效的措施,吸收其成功的经验,将有助于克服中国博物馆事业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在新形势下摸索出新的生路。

一九九八年 北京地区 地下文物 保护工作 主要成就

王有泉

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都北京,不仅以拥有数量众多的地上文物而闻名,同时也以丰富的地下文物而著称,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物共同构成北京古代文明的载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多年来,我市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一直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在过去的1998年里,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文物工作者的努力工作下,北京地区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将配合我市重点工程平安大街、菜市口南延路、长河治理的建设而进行的地下文物保护,列为工作重点。

●在平安大街施工前,文物部门与工程指挥部签定了保护地下文物的协议。工程施工开始后,文物和施工单位互相配合,相继在平安里以西发现并清理了唐墓一座,在静心斋北墙外发现石条砌成的古代水

道,在东不压桥胡同口,发掘清理了东不压桥南侧用青石条砌筑的河堤及皇城水关残址,在北海中学前、北河沿大街北口、东黄城根北街北口都发现并清理了明皇城北城墙基础,在什刹海体校门口至白米斜街一线发现四处原什刹海南岸堤岸遗迹,对西压桥遗址进行测绘清理,对在西压桥遗址附近发现石刻给予妥善保护。

●长河治理工程是我市河湖水系整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河起点为长河闸,终点在高粱桥入暗渠处,河道全长5.5公里。对于沿线施工中遇到的文物遗存,文物部门与施工单位积极配合。对位于海淀区石佛寺附近的麦钟桥残存的桥基进行了清理保护,对新发现的广源下闸进行了清理、测绘。修复了新发现的位于紫竹院公园西北的御码头遗址。

●菜市口南延路也是我市的一项重点工程,8月下旬开始,文物部门对工程沿线展开文物勘探和发掘工作,已发现清理汉代水井6座、清代水井1座、清墓3座,辽金时期的建筑夯土遗迹7处。将出土的两块记载30年代梨园大师梅兰芳等人义捐之事的碑刻运到戏曲博物馆保护、展览。

●从1991年就开始的配合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建设进行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1998年又有新收获。2—5月,完成勘探面积约4500平方米,发掘战国晚期墓葬8座;汉代砖室墓28座,其中两座为多室墓,土坑墓95座;辽墓3座;清及近代墓88座;水井一座。共出土印章、铜镜、带钩、箭镞、铁铲、陶壶、陶鼎、陶盒、陶仓、陶俑等共计200余件。另外还出土了铜钱100余枚。

●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地下文物的安全和解决因保护政策的限制造成对黄土坡村发展的制约,市政府、市文物局和房山区政府共同投资,将黄土坡村迁出遗址区。为配合黄土坡村新址工程建设,防止在规划建设损坏地下文物,自10月下旬起对新址区域进行先期考古勘探工作,发现早期墓葬

15座和一些灰坑。

●北京至沈阳高速路工程是国家“九五”重点建设工程,文物部门主动与工程指挥部取得联系,在有关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市文研所对京沈高速路(北京段)工程沿线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完成大沙务、马房、大灰店等取土场汉、唐、辽墓的清理发掘工作。

●为了配合三台山化学危险品仓库新建道路工程,于4月对施工用地进行了先期考古勘探,对勘探中发现的一座东汉砖室墓进行发掘。

●市文研所和延庆县文管所联合对延庆县康庄镇榆林堡村清代驿站和遛马场进行勘探,发现石墙基础一段,路土两处。对现存城墙的形制及做法进行了勘察。对城门及北城的西墙南段基础进行了勘探。探明北城城墙基础。选取北城北墙的一段进行了解剖。搞清了城墙的基本做法及年代,并在城墙基础下发现了时代更早的路土和文化层。

●8月26日至9月3日,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管理处院内发现的一座明代妃子墓葬和一座明代皇子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两座墓葬位于管理处院内西南角,北靠金山,东西与玉泉山相望。两墓东西并列,相距约50米,均为砖室墓,早年被盗,破坏严重。整体用青砖砌成,磨砖对缝,制作考究。出土墓志一盒及石五供等。

●根据群众举报,对宣武区平湖里危改小区一基建工地发现的4口唐代水井进行清理,对在清理过程中发生的破坏文物事件进行了处理,并借助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普及文物法知识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还对位于龙庆峡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延庆乡村俱乐部工程,进行了先期考古勘探。○在宣武区广安门内南线阁胡同北口,发现并清理了金代下水道遗迹。○清理中山公园内北京复八线地铁天安门西站通风道竖井工程出土的明代金水河旧河道遗迹。○会同密云县文管所在河南寨乡

提辖庄清理汉代墓葬7座。○清理北池子大街的原东城酱油厂,在基建施工中出土了一座辽代砖室墓。○在宣武区清理了一座战国时期墓葬,发现一批重要文物。○配合筒子河治理工程,清理景山西街下水道。○对市广播局延庆龙庆峡工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和随工清理,发掘春秋时期墓葬两座。○对位于背阴胡同的京海二期工程中出土的一座唐墓和两座水井进行了清理和测绘,发现墓志一盒。

●在接近年终岁末的寒冬季节,为了配合通州运河治理及道路改建工程,市文物研究所对郝家府村段运河内的沉船进行勘探和清理,出土古船两艘。

●今年北京地区地下文物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对颐和园内发现的元代名臣耶律楚材次子——耶律铸夫妇合葬墓的发掘。这是北京市近年来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近年来北京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数量、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元代墓葬,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该墓墓葬形制独特,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其次,墓主人耶律铸,为元代著名人物耶律楚材之子,《元史》有传,身份地位显赫,其墓志铭的发现为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料。再次,该墓出土随葬品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为北京地区元代墓葬的研究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最后,该墓发现地点十分重要,其西北紧邻颐和园内的耶律楚材祠,确定此地应为耶律楚材的家族墓地。该墓的发掘,恰在1998年的国庆节期间,考古工作者放弃节假日休息,加班加点,共清理出180余件文物。

●12月10日在燕京汽车厂内发现两座唐墓和一座辽墓,其中一座唐墓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墓门及墓室内有多处砖雕仿木影作,并残存有精美的壁画。出土的墓志采用当时的幽州地方割据政权年号。此墓的砖雕仿木影作是北京地区唐代墓葬中极少见的,文物价值很高,因此,文物局已将此墓砖雕仿木影作和壁画切割、装箱,

运至古建博物馆保存。

琉璃河商周遗址是我市的一个国家级的遗址保护区,目前在遗址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我市唯一的一个为解决学术问题而进行主动发掘的考古工地。1998年内完成了对一座深10余米的西周时期的古井的发掘,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和发掘的西周时期的古井。为解决位于遗址中古城的一直悬而未决的南城墙位置确定问题,在古城东南部进行了部分发掘,发现类似于北城墙内墙脚下的地层堆积,初步确定了南城墙的具体位置。

回顾、总结1998年北京地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和收获:1.市委、市政府、文物局领导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文物工作者尽职尽责并坚决贯彻执行了当前我

(上接18页)真正起到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没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和讨论是不行的。《北京文博》十分重视不同学术思想的争论。比如北京古都风貌的保护,历史观点纷杂,各执一辞。有些业务人员不太明确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不太爱表明自己的观点。《北京文博》在遇到此类选题时,以鼓励百家争鸣为原则,只要言之有理,自成一家之说,都尽可能选用,使各种学术观点得以充分发表,积极创造一个相互探讨的园地,从而达到有所发现,有所论证,明辨理论,提高认识的目的。

对于基础理论及各学科专业理论的研究,选题区别几种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鼓励发表各种意见。比如《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活动的历史年代有很多提法,没有定论,编辑部就注意编发了几篇不同文章,并冠以编者按来说明。在编辑过程中,贯彻了学术自由的原则,发挥了编辑的导向作用,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意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选题活泼有生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保护工作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是我们取得地下文物保护工作成绩的立足点。2.在城区内进行考古工作有了新突破,为今后如何配合北京旧城区改造中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3.如何进一步快捷、有效地开展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使这项工作在北京的经济建设中制度化、法制化,是我们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和总结的。4.如何解决好我市配合基建考古与课题考古研究的关系,是我市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5.广大市民文物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为文物部门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文物线索,说明我们今后应进一步加大保护文物宣传力度。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尽管《北京文博》固定栏目不多,但栏目的覆盖面大,对选题的多样化提供多角度的研究园地,来稿中不仅有宗教部门、园林部门的文章,也有民俗学、地理学方面的文章,兼收并蓄,百花齐放。还有资料性的选题,例如:“北京市文物局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目录”连载十期,极富资料性,“文博事业大事记”每期都刊载日志性资料,也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在资料性选题方面,有时也不能仅强调资料性,将其搞成资料汇编的形式,从而尽可能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多数文章是既有资料性,又是论文的双重效果。

《北京文博》创刊以来,努力克服文博刊物题材面窄,比较单调,专业性过强的状况,面对同行的激烈竞争,通过调整内容,优化选题和组稿,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提高了自己的刊物品位,这种贴近社会的办刊方式得到了上级领导和业务人员的认可,逐渐趋于合理、完善。

(作者为《北京文博》编辑部助理编辑)

天坛

历史文化挖掘

与现代公园建设

姚安

一、“文化建园”方针的确立

天坛作为神秘祭坛的历史约有五百年左右,在祭坛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公园建设,首先应该分析与了解天坛的历史文化特征。针对特征,发挥特项长处,搞好公园建设。从80年代末期,天坛就提出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将天坛建成祭天文化博物馆性质的游览场所,围绕这一主题,加强文化研究,深挖历史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天坛文化的无穷魅力,天坛公园相继恢复了主要殿堂的历史原貌,设立了相应的展馆,为实现天坛的总体规划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1. 天坛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根据天坛自身特色制定的。

首先,天坛有着和古代祭天密切联系的深厚文化内涵。天坛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距今已有570多年的历史,而中华祭天的历史则要追溯到远古洪荒年代,传说三皇五帝时(距今约5000年)人们就已经祭天,周朝(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郊祀天地就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祀典。伴随我

们古老民族的历史,祭天文化也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天坛作为这种深远文化的象征,体现了古人在天文历法、礼仪音乐、建筑艺术及思维意识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凝聚了中华祖先无穷智慧和传统文化,以其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宏伟的建筑风格,成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写照,人类建筑艺术的瑰宝。将天坛建成中华祭天文化博物馆性质的高层次游览场所,正是针对天坛这一特色制定的。

其次,天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占地273公顷,主要建筑各具特色。中国古人关于“天圆地方”、“天高地低”、“天玄地黄”等等观念在这里无不体现得精妙绝伦,在天坛的柏林松涛中,无处不能感受到我们祖先尊崇自然、对皇天无限敬仰的情怀,占地之广阔、建筑之恢宏壮美,天坛已经成为露天博物馆,展示了我们民族在传统哲学、美学、建筑学等方面高超的艺术成就。

第三,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旅游事业的空前发展,天坛日益成为北京的标志、中国的象征,天坛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针对这一特点,天坛必须抓住时机,向着高层次方向发展,突破“一般公园”的管理观念,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2.天坛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制定是天坛几十年发展道路决定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天坛的皇家坛庙地位由此丧失。民国七年(1918)天坛作为公园开放,完成了由皇帝祭坛到社会公园的功能性转变。解放后,天坛被列为国家重点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残损的古建获得整修,古柏得到养护,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在体现古坛神韵的同时,又增建了月季园、百花园、丁香林、双环亭等游览景区,园林绿化获得空前发展。

回顾天坛走过的道路,50年代天坛办过农场、林场;60年代天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园内广栽果树,种菜、种庄稼,曾用茄子当绿化带,一派农村公社景象;70年代,园内大搞各类游园会;80年代初期,园内展销会商贾云集,还引进了马戏、耍猴、气功、魔术、地摊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坛跟着运动走,没有长远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一直到八十年代,果品收入始终是天坛主要收入来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也吹进了这座古老的园林,天坛人开始探索天坛的发展道路。1980年,皇乾殿举办了“祭天文物陈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使天坛人尝到了充分发挥文物作用的甜头。1984年,提出在斋宫拟办“明城”的大胆设想(因与天坛自身特色有差距,未实行)。1985年,斋宫开始筹备“祭天文物陈列”,请走了租赁斋宫的懋隆商行。1986年8月15日,斋宫正式对游人开放。1987年斋宫收入22万,无论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出租房屋前进了一大步,斋宫的展陈开放是天坛走挖掘祭天文化道路的起点,对今后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8年4月,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天坛回音壁内三个展室恢复历史原貌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即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对古建筑保护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无疑使天

坛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89年,公园开始筹备祈年殿的展陈,1990年4月28日,祈年殿恢复清咸丰朝历史原貌陈列展览收费开放,仅用100天时间就收回了140万元的投资。同年,天坛收入由1989年的500多万一下上升到960万元,增长了近一倍。

正如邓小平同志论述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再吹牛也没用”。天坛由1980年到1990年十年中,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园容园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走过的曲折道路和探索实践使天坛人信服了只有走具有天坛特色的发展道路,天坛才更具有生机和活力,天坛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将其建成祭天文化博物馆性质的高层次旅游文化胜地,这一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确立,是天坛几代人努力摸索的结果,是天坛几十年发展道路决定的。

二、加强文化研究是实现天坛文化建园的有效途径

现在的天坛,祈年殿、皇乾殿、皇穹宇已经恢复历史原貌。祈年殿东配殿建成了祭天乐舞馆,天坛像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呈现在游人面前,如果我们把恢宏的建筑比喻成宝库的殿堂,那么发生在殿堂里的一切就是宝库的珍宝,现在殿堂大门已经打开,怎样才能做到如数家珍似的将宝库内的珍宝展示给游人,让人们了解、玩味、欣赏珍宝的来源及特点,进而热爱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热爱我们伟大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我想只有通过不断深入细致的研究,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展陈内容,将研究成果以展览的形式向游人发布,使天坛真正成为中华祭天文化博物馆,让游人获得较高层次的文化享受。

从九十年代开始,天坛建立了以文物及文化内涵开发为任务的研究室,召开了“天坛历史文化与开发利用研讨会”,先后整理出版了《天坛大事记》、《天坛文化论丛》等,继祈年殿后又恢复了圜丘历史原貌,恢复了

祭祀灯具,举办了“帝王与祭天”系列展览之一“乾隆与天坛”展览,恢复了斋宫钟楼,开发了“玉辇”、“太平景象”等一系列文化项目。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成果。

从1993年天坛研究室开始进行的天坛声学现象研究为例,经过三年多艰苦的测试和研究工作,天坛回音古建筑拥有了科学的解释,这为“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天坛回音建筑提供了科学依据。天坛声学建筑不仅是具有潜力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具有世界瞩目的声学研究价值。声学建筑的形成本明清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研究可知当时的科技发展状况,而获得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为旅游项目服务,使游人在游览中获得乐趣,游览到天心石时会想到“亿兆景从”,游览到回音壁、三音石时会想到“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从而使旅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旅游。这一项目研究成果也为天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以及把天坛建成祭天文化博物馆性质的高层次文化旅游场所起到积极作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

纵观天坛近些年来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验性管理阶段。这一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园林方针多变,绿化结合生产,文物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尚未放在应有的位置,凭经验,靠拼体力,效益低,长期靠吃国家补贴。

第二阶段:粗放型管理阶段。大约在八十年代前半期,天坛探索发展道路的初始,思想活跃,商业化气息较浓,经济收入在300万元左右,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是以牺牲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一阶段,天坛是急于脱贫阶段,来不及进行长远的、深入细致的战略思考,带有某种急功近利的色彩,但是仍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适合天坛发展的道路,建立相对完善的各项

制度,积累了经济实力。

第三阶段:科学管理的基础阶段。这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天坛经过艰苦努力,确立了发展方向和目标,各项工作日趋实现标准化、制度化,经济收入超过500万元,并逐年提高,达到1995年的4800万元。从1991年开始,连续四年被评为局先进单位,被旅游行业评为先进景点,天坛走上了科学管理的道路。但是,现在要发展比前些年要难得多,想创新想更上一层楼很困难,天坛面临二次创业。进入这一时期,我们的目标较从前更为清晰,我们对自身有了更多的理性认识,要向更高层次发展,必须积蓄后劲,继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公园发展服务。

三、强化自身特色,是公园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所谓特色,就是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天坛的事业要想发展,也应强化自身特色,特色即生命力,而深挖文化内涵,汲取传统文化,是突出特色的首要手段,也是使公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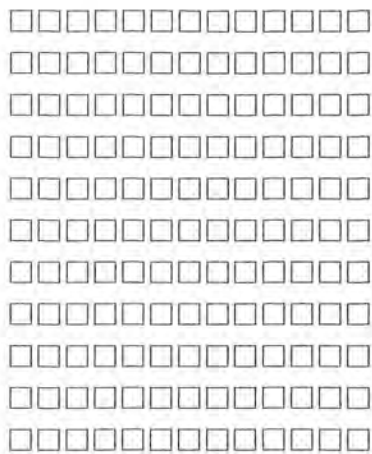
1985年以后,天坛也意识到深挖文化内涵,走具有天坛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先后恢复了斋宫、皇穹宇、祈年殿的历史原貌,并举办祭天文物展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天坛文化的深刻内涵也引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天坛声誉获得显著提高。

天坛的优势在于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杰作,它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现今已形成的科学管理基础上,怎样才能进一步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只有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向更深层次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为公园向更高层次发展积蓄后劲,将天坛事业推向新高度。

(作者为天坛公园管理处文物科科长)

《北京文博》 的选题思路

张 岩



《北京文博》是新刊物,创办此刊的目的、宗旨是为首都北京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史地民俗、民族宗教专业科研工作者提供科研、学术交流的舞台;促进北京社会科学的发展;业务范围以北京地方为主,兼顾周边省市和中央在京文博单位。刊物要反映文博领域里的新发现、新观点、新材料,成为学术观摩、信息采编的园地。

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都有自己的文博期刊。众多刊物有着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要求。面对门类众多、功能不同的文博刊物,《北京文博》作为后起期刊,如何在这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找准定位是首要任务,其中的关键是把杂志办出特色,并将这种特色贯穿于刊物的全过程,表现出刊物特色的一贯性。《北京文博》从办刊一开始,就在学习、吸收同类刊物办刊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自己的办刊路子,在办刊宗旨上下功夫,并在此基础上,以专业人员为主要读者群制定选题和栏目。而办出特色,提高质量的关键是围绕办刊宗旨做好刊物内容的选题。选题的规划是办刊物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编辑部的经常性的的重要工作。把好“选题关”,是保证刊物质量的基础。选题的

好坏,关系到刊物的成败,纵观成功刊物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编辑精心选题的结果。要使《北京文博》办得有品位,又有生命力,编辑部要深入研究读者的需要和存在的问题,使自己编辑的刊物在刊物之海中富有自己的特色,适合特定读者对象的需要。要从办刊宗旨、选题、栏目的编排、文章的选择、形式的变化和组稿的各个环节都进行认真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以坚持本刊的正确方向,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

《北京文博》创刊至今已出版十四期,透过十四期总目,读者可以了解《北京文博》选题的基本范围、专业特色和编辑风格。本文拟就《北京文博》编辑中关于选题问题,谈些体会,以便能更科学地做好选题工作。

一、《北京文博》选题的特色和风格

选题是指一个刊物准备组织的文章的题目。一个刊物的选题,是这个刊物方针、任务、宗旨的基本体现。选题的制定也是宗旨确定之后,体现宗旨的基本方针,不使刊物出现方向上的偏差的保证。宗旨是纲,选题是目,选题是宗旨的执行过程,也是衡量

一个编辑部和编辑贯彻办刊方针的关键。选题是保证特色的基础,目前,各个地区基本都办有文博类刊物,并有同一类刊物在一个省办几种的现象,同《北京文博》编辑部保持交换联系的各省文博期刊就有几十种,这些刊物内容相似,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文博》作为后起之秀,办刊难度就难在选题与特色方面。

既然选题的好坏,关系到刊物的成功,《北京文博》是在一开始就把选题问题放在首位,广征博引,把握标准,已经刊用的300多篇论文无一不是编辑人员在博采精选题材的前提下的成果。《北京文博》为此,从三个方面入手,保证选题的科学水准。首先,为体现宗旨,办出特色,《北京文博》的内容定位充分体现地方文博刊物的特点,形成了研究北京文物考古,博物馆方面权威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见诸于其它报刊的北京文博方面的零星稿件不少,与文博专业相关的专业比如宗教、园林、北京史等等,研究文章中涉及到文物、考古方面的著述也很多,但是,就文博这一综合课题的专刊,仅有《北京文博》一家。《北京文博》的内容定位于北京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背景下,根据这个定位,选题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尽可能把已经形成了北京文博的内部专业分工和各个学术支脉确定为自己刊物的基本选题,文物工作从机构设置看,分:考古、古建博物馆、文物商业;从实际工作内容,则是北京史志、皇家宫廷、文物建筑、地下考古、宗教寺庙、古都风貌等方面更能体现北京的特点。因而,这些成了刊物的固定的基本的选题。

《北京文博》另一类的选题是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的临时选题,比如,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结合此选题,刊物编辑部约了赵光贤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载的文章水平高,专题性强,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资料含量。还有《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配合北京市第五次文物工作会议发了一期专刊,这一选题又体现了《北京文博》作为综合

类文博刊物政策法规方面的职能。

《北京文博》选题中严格摒弃那些与北京地方特色无关的内容,尽管有的作者名气很大,有的文章写的很好,编辑部都只能忍痛割爱。按照“宁缺勿滥”的原则,不能松选题标准,超出选题范围的稿件一概不用。选题成了保证刊物特色的第一关。

其次,从栏目设置上,也在选题确定的前提下服从于宗旨和特色的要求。设置燕文化、辽、金、元、明、清古都、皇家园林、北京民俗及近现代革命史迹等专栏。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博物馆众多,而且博物馆又是文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博物馆的内容也作为《北京文博》的主要栏目之一。

通过上述栏目的设置,形成了体现《北京文博》宗旨的框架结构。另外,《北京文博》还开辟固定栏目有,“文物与考古”、“文物工作”、“博物馆学”、“古都风貌”。经过探索,使栏目设置找准了自己准确的定位,树立起自己鲜明的特色,真实、准确地反映北京文博事业的发展和学术动态,展示北京社会科学事业的成果,由于它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京味”,不仅在北京文博行业内有一定影响,许多人还把《北京文博》作为了解古都北京的窗口。

确保选题质量的第三个方面是编辑部严格把关。《北京文博》编委会专家多次强调要“出精品”,多采用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文章。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论文,传播学术新动态、新趋势、新信息,报道新知识、新成果。“出精品”就是发表的文章应是同专业中的佼佼者,所报道的信息、知识、文章以质量取胜,求精不求全。另外,注重“首发稿”,已经在其它报刊上刊登过的稿件;一律不发。旧题材也要有新见解,新角度,新材料,不炒冷饭。

在选题质量中还有一个可读性问题。近年来信息业发展很快,读者可以从许多方面获取所需材料。《北京文博》从选题到文章质量都注意读者的认同,尽力做到有阅读价值,内容层次分明,文字流畅,版式精美。

不以俗媚人,也不搞曲高和寡,选择品位适中的文章。从已编发的14期《北京文博》刊载的内容看,基本可以看出:1.文章内容有创见,能代表北京地区文博界的学术水平;2.信息量大,报道快,时效性强;3.已初步获得社会公认的荣誉和地位(如近三年中北京市文博系统评定中高级职称的论文中多以《北京文博》刊登为主体)。这一客观的评判基本可以概括了《北京文博》编辑选题的水平。

二、《北京文博》的选题基本对象和范围

要把《北京文博》办成富有生命力,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办成有特色,高质量的刊物,《北京文博》编辑部认真地遵守办刊宗旨,把握办刊方向,在办刊宗旨范围之内确定选题标准。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性刊物已从综合性向专业性,特定的专题的专门化发展,把读者对象划分得很细,以便使内容更能适合特定层次读者的需要。《北京文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基本上就是一个群体,业务范围也早已划定,这是《北京文博》的选题标准和范围基础。并依此做为制定《北京文博》选题范围和标准的依据。

一个刊物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应该成为这个刊物的基础,也应该成为这个刊物选题的基础对象和范围。北京历史积淀丰富,对北京文物和博物馆感兴趣的专业人员、业余人员为数众多,这些都是《北京文博》的选题来源。

《北京文博》选题来源一般有三种,自行投稿、定向组稿和单位推荐。三类稿中切合选题,有份量的稿件一般都是定向组稿。但目前,《北京文博》的自投稿比例比较大,选题分散,采用的难度较大。而组稿是由编辑部构思主题,确定选题后,再确定合适的专业人员撰写,这样的好处是,稿件对刊物的选题针对性强,文章水平高,往往是每期刊物的核心文章。《北京文博》定向组稿带动

一般类自行投稿的作法既培养了自己的作者队伍又提高了刊物的质量。从前几年的作法看,名家名作的稿件,比如赵光贤、曹子西等著名教授的来稿,都是编辑部定向约来的。

正确的选题是哪里来的呢?它不是编辑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分析评判,研究学术动态及专家的建议分析论证,又经专家审核才能确定的。任何一个选题除了科学性和现实意义之外,还有一个可行性的问题。即能否完成这个选题。由于选题执行困难或难度较大,选题执行人不利等原因,有些选题可能无法实现。我们在编辑工作中就曾遇到过。在当今,文物市场异常活跃,《北京文博》编辑部曾设想确立一个文物市场的选题,组织一批文物市场政策、动态、鉴赏类的文章,但组稿中却发现作者对撰写这类稿件不积极或对政策把握不准,不敢下笔,因此,这个选题最终没有实现。

这份刊物之所以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是同编辑选题的明确和编辑方针分不开的。为了保持学术性,增强实用性和普及性,在落实选题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北京文博》的几个基本栏目,如“考古与文物”、“北京史地”、“古建园林”、“博物馆学”等都有本栏目的主要撰稿提供者,保证此栏目的权威地位和学术水平。还有一条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北京文博》以广大文博工作者为发行对象,又以广大文博工作者为选题的基本力量办刊,两者互为动力。也可以说明,《北京文博》创办顺乎了北京文博界的民情需求,从已刊出的文章的作者就可以看出,它的作者队伍基本上就是文博界的同行和文博之友。编辑部确定的选题与作者、读者的研究课题、社会学术的动态是一致的。所以出成果,培育新人,办出有文博的特色和风格。

三、选题的多样和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的方针,一个学术刊物要办得有生气,(下转12页)

山戎文化动物纹的 分布地域与年代分期

王继红

一、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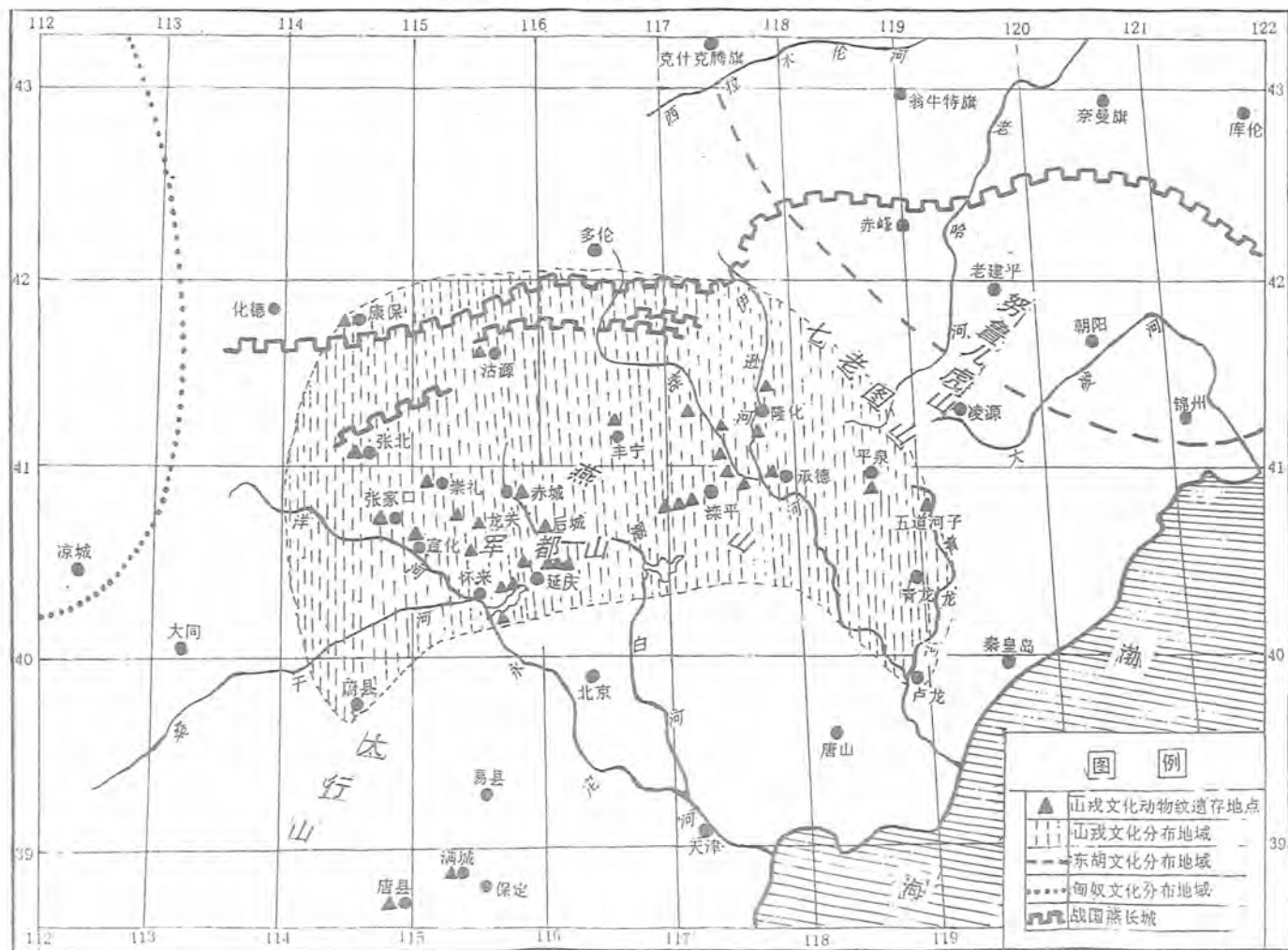
动物纹,外国学者多称为“野兽纹”,是欧亚草原地带处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诸多畜牧和游牧部族普遍习惯用的装饰艺术题材。装饰动物纹的青铜器物,种类繁多,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构图新奇别致。各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面貌与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可谓各具特色,异彩纷呈。毫无疑问,关于古代动物纹的研究是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的,因此国际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领域,一向特别关注和重视。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一批欧洲的传教士和日本的文化人,涉足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旧绥远地区)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专意搜集过那里出土的散落于民间的大量的装饰动物纹的青铜器制品,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文物予以整理、刊布^{①②③④⑤}。

中国长城地带装饰动物纹器物的古代文化遗存,含盖北方地域也相当广阔,它至

少包括辽西丘陵、燕山南北、太行山东西、黄河河套、阴山至陇山一带,即以辽宁西部、河北和北京北部,到内蒙东南部和中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甘肃以及青海东部等地。(见图一)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自商周以降,至两汉之间,上下约1600余年,土生土长过诸多部族的文化,它们都曾拥有过以各种动物纹为特色的绚烂多姿的文化艺术。限于历史和资料条件,我国学者涉足此项领域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一直迟至本世纪80年代初,方有乌恩先生和田广金先生的论著问世^{⑥⑦},开启了国内学术界研究这一课题的先河。

山戎是中国北方一支古老的畜牧和游牧部族,这支部族也以丰富的、独具特色的动物纹为其文化主要特征之一,她是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含动物纹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关于这支文化成批的考古发掘资料,主要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经考古工作者调查和发掘获得的。这几批考古资料对探寻山戎部族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内涵,

图一、山戎文化动物纹分布图



及其动物纹特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山戎文化的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以东、燕山南北地带,涵盖了滦河、青龙河、潮白河、洋河、桑干河流域及其附近一带地域,即中国地质学上所谓的冀北山地。这支文化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以目前掌握的有序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至少应上启两周晚期或两周之际,中间历经整个春秋时代,往后延续到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晚期,即从公元前9世纪末叶或8世纪初,一直发展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末叶或3世纪初,前后经历了约500年时间。诚然,迄今为止在冀北山地发现的山戎文物中,并未见到任何文字材料可用以证明这些发现确属山戎部族的遗存,但发掘者根据这些遗存的地望、年代和文化内涵特征、殉牲种类所反映的经济类型,以及埋葬习俗的特点,还有它们与燕和中原文化的明显区别及双边关系,以及与同时期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和时代略晚、分布于蒙古草原地带的匈奴文化的差异,并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推论这些没有文字的物质文化,应属中国历史上古老的山戎部族文化。目前,将冀北山地一带发现的以含直刃匕首或青铜短剑和动物纹器物为其主要文化特征之一的遗存,推定为山戎文化的观点,已为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所接受和赞同。

笔者就已经发表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考古发掘资料,结合有出土地点的征集资料,对冀北山地山戎文化动物纹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初步探讨其分布地域与年代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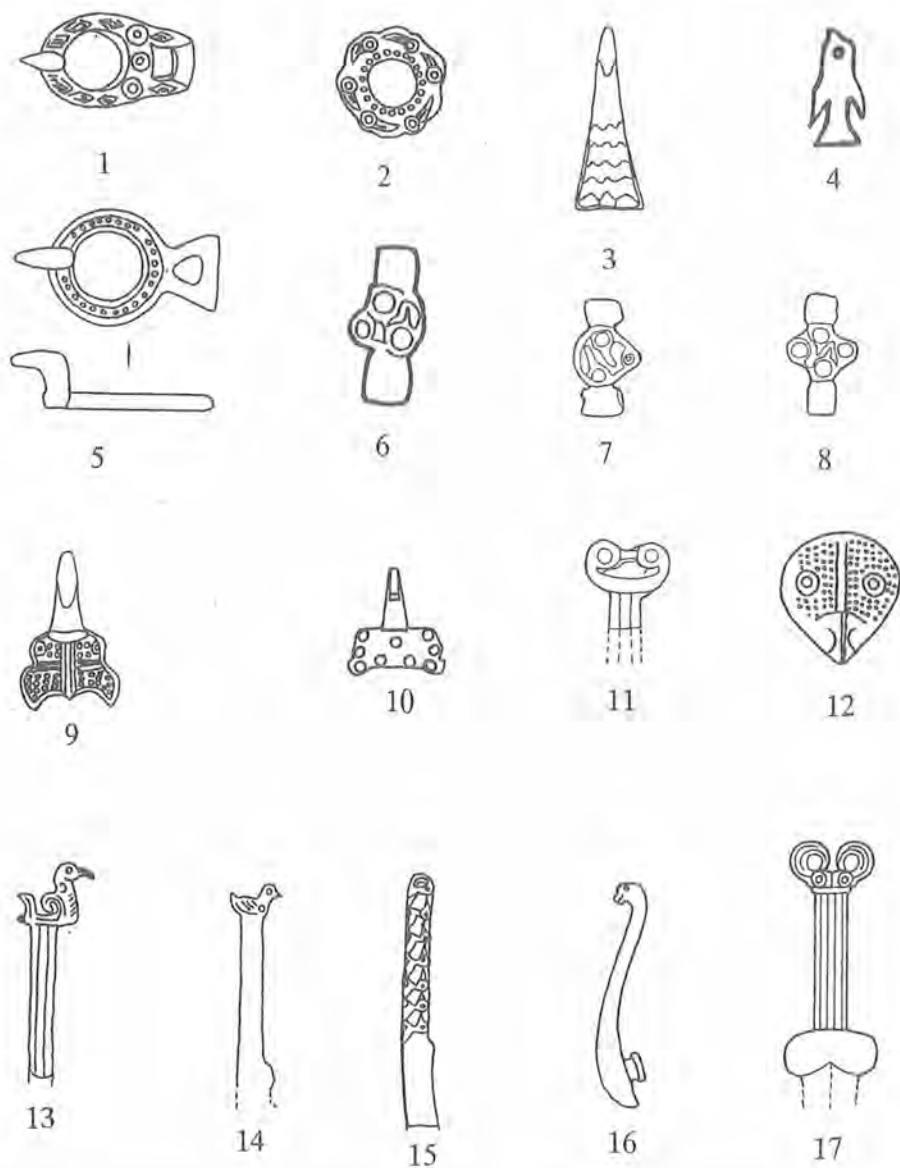
二、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分布地域与年代分期

1. 分布地域:

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分布地点,绝大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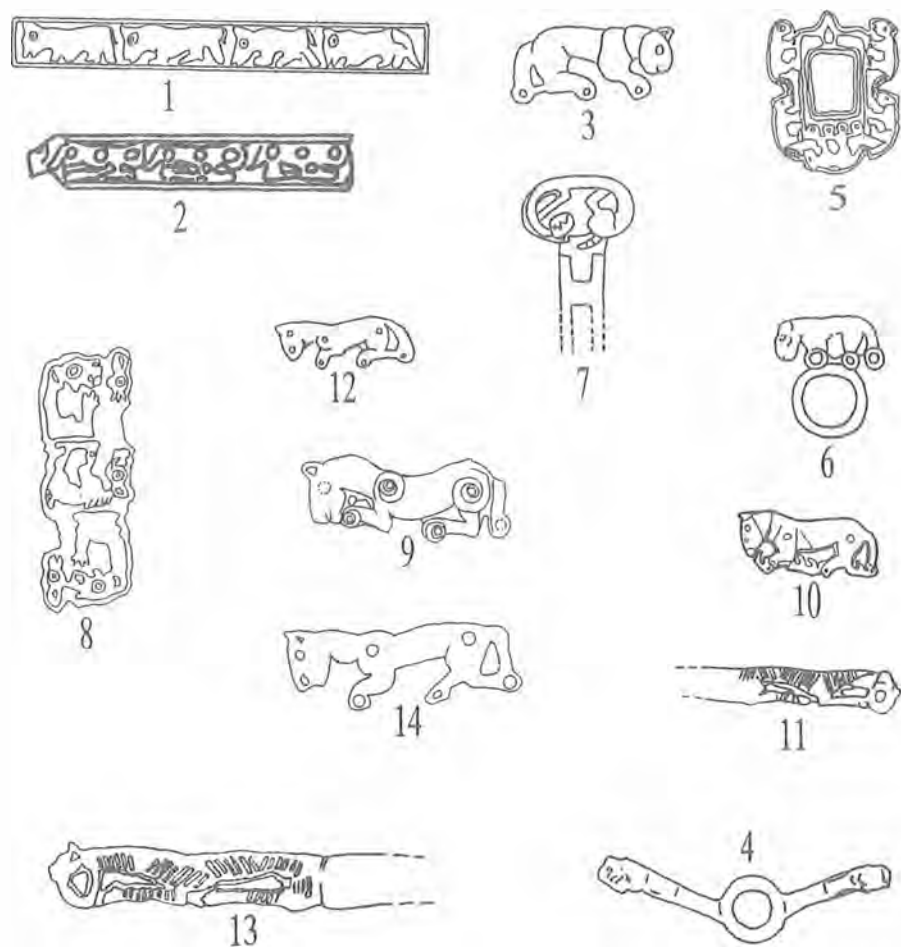
数都集中在已发现的冀北山地山戎文化遗存地域内,仅有个别地点分布在河北省保定地区。根据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考古调查和发掘简报所提供的田野资料,以及以往刊布的零散的有出土地点的征集资料,经统计含动物纹的山戎文化遗存地点共有27处,包括河北省承德地区9处:承德市,平泉县东南沟黄窝子山,隆化县下甸子,三道营骆驼梁,滦平县梨树沟门、苜子沟、虎什哈炮台山、窑上营房、金沟屯后台子;张家口地区12处:张家口市,宣化县李家堡小白阳,庞家堡白庙,怀来县北辛堡、甘子堡、大古城,赤城县及龙关,沽源县,丰宁县四岔口土坎子,蔚县,康保县;保定地区2处:唐县钓鱼台,满城采石场;辽宁省朝阳地区1处:凌源县五道河子;北京市延庆县3处:古城村葫芦沟,西梁堽墓地别墅区,靳家堡玉皇庙。

上述27处地点,以张家口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其次是承德地区,再次为北京市北郊延庆县,最少的零星分布地点是河北保定地区和辽宁省与河北省北部交界的凌源县。这些地点明确昭示出山戎文化动物纹的主要分布地域,确实集中在冀北山地,即在燕山南北,滦河、青龙河、伊逊河、洋河、桑干河、潮河、白河、妫水河及延庆——怀来盆地一带。其地理座标大致在北纬 $40^{\circ}28'$ 至北纬 42° ,东经 114° 至 119° 之间,面积约6至7万平方公里。这一带地域,北靠内蒙古高原,南临华北大平原。其地貌特征,自北向南可划分为两个较大的地貌单元。一是张家口——丰宁——围场一线以北,为“坝上”,属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海拔高度在1500—2000米,地势以东南向北西倾斜,夹在其南部和北部丘陵之间的中部波状平原是广阔的草原;此线以南为燕山中低山区,这一带山势陡峻,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海拔高度在500—1500米,地势大致以西北向东南倾斜,在桑干河、洋河、白河、潮河、滦河与周围山谷间,分布有阳原——蔚县、怀安——宣化、怀来——延庆、滦平——承德等4个较大的山间盆地。



图二、鸟纹

1. 甘子堡 M14 : 10, 第 3 期。2. 龙关 C1825, 第 4 期。3. 梨树沟门 L1689, 第 3 期。4. 梨树沟门 M1 : 30, 第 3 期。5. 玉皇庙 M13 : 7, 第 1 期。6. 小白阳 M20 : 3, 第 3 期。7. 别墅区 M36 : 24, 第 2 期。8. 别墅区 M36 : 25, 第 2 期。9. 梨树沟门 L1671, 第 3 期。10. 小白阳 M39 : 3, 第 3 期。11. 旧绶远 D20, 第 5 期。12. 北辛堡 M2 : 15, 第 4 期。13. 甘子堡 M19 : 7, 第 2 期。14. 甘子堡 M12 : 3, 第 2 期。15. 甘子堡 M18 : 4, 第 2 期。16. 炮台山 M6, 第 4 期。17. 北辛堡 M1 : 76, 第 4 期。



图三、虎纹

1. 梨树沟门 L : 1823, 第 3 期。2. 甘子堡 M20 : 11, 第 3 期。3. 玉皇庙 YYM18, 第 1 期。4. 甘子堡 M5 : 19, 第 3 期。5. 旧绥远 G47, 第 5 期。6. 甘子堡 M8 : 32, 第 2 期。7. 别墅区 M36 : 2, 第 2 期。8. 旧绥远 G31, 第 3 期。9. 玉皇庙 YYM129 : 2, 第 3 期。10. 满城采矿, 第 3 期。11. 旧绥远 C12, 第 1 期。12. 小向阳 M41 : 9, 第 3 期。13. 旧绥远 G15, 第 1 期。14. 唐县钓鱼

这里气候适宜,水草丰茂。山戎部族正是选择了这样一处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并在这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山戎文化动物纹艺术。

2. 年代分期:

山戎动物纹,大都装饰在青铜兵器、工具、马具、带具和装饰品等器物上,因此动物纹的年代,应与其所装饰的器物的年代是一致的。所以对动物纹的断代,实际上是对其所在文化遗存的断代。本文以考古发掘资料中,与装饰动物纹的标本相伴存的器物群中具有断代标准意义的器物的相对年代,作为断代依据。对于那些未见有断代标准意义共存器物的动物纹标本,则以同类器物在其它具有断代标准、并已明确其年代界限的遗存中所得到的年代概念,加以参照推定。对于一些曾有出土地点,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零散的动物纹征集资料,则以已经解决了相对年代问题的考古发掘资料中的同类制品进行衡量、断代。根据迄今所掌握的动物纹在山戎文化遗存中的分布资料,本文将之划分为五期:上起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下迄战国中期至中晚期。

第一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此期含动物纹的文化遗存,在已发表的山戎考古资料中为数较少。出土地点主要有以下几处:河北省承德地区平泉县东南沟黄窝子山,北京市延庆县靳家堡乡玉皇庙,这两处是经正式发掘的地点;零散遗存地点有:河北省隆化县下甸子、三道营骆驼梁、张家口地区沽源县;征集品地点,主要是解放前旧绥远地区。

平泉县东南沟黄窝子山 M6 出土装饰写实群马纹柄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 件(黄 M6:5)(图五:4)和写实的鸭形铜饰 1 件(黄 M4:1)(图十:13)。根据此墓出土的一件中原式三穿铜戈的形制特点,原发掘简报推断其年代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⑧,较为恰当。至于文化性质,发掘者认

为此墓地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笔者根据这里的地望已超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之南限,处于七老图山以南,所出兵器中未见曲刃青铜短剑,而只有直刃匕首式短剑,故初步认为此处墓地应属于山戎文化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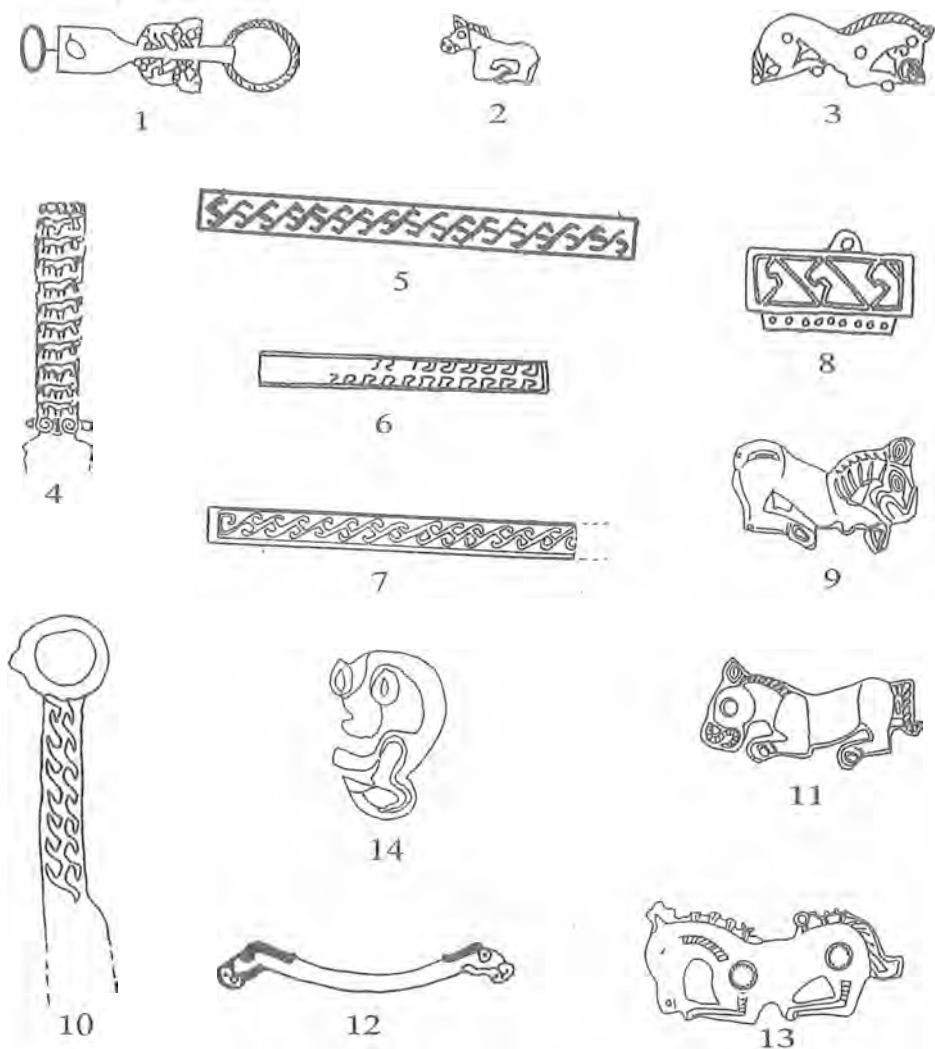
延庆县玉皇庙山戎墓地^⑨北 I 区墓葬 YYM18 出土写实金虎饰牌 1 件(图三:3)^⑩,豹纹铜鹿 2 件(图十一:4)^⑪,YYM48 和 YYM102 出土不明种属的兽形和瑞兽形青铜带钩各 1 件(图四:2、3),YYM32 出土几何形马纹铜锥管 1 件,YYM22 出土几何形羊眼圈纹青铜短剑 1 件(图六:1),YYM13 出土象征性鸟形铜带扣 1 件^⑫(图二:5)。玉皇庙墓地规模宏大,共发掘墓葬 400 座。这些墓葬以北而南,由高而低顺序埋葬。年代以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其中北 I 区墓葬年代最早,基本上属于春秋早期。此区墓葬皆分布于墓地北部地势偏高的山坡上;均在当地第一期泥石流来临之前下葬的,整个墓圪均打在生黄土层中,填土中不见晚期泥石流的裹挟物(如沙石鹅卵石等);此墓区各类器物的特征,与距该墓地 12 公里同类同时期的延庆县古城村西梁坑 25 号墓(YXM25)的器物特征相似或一致,有的器类在形制上甚至更显得偏早一些,如 YYM18 和 YYM32 出土的陶器和铜戈的形制,均比 YXM25 显得偏早。根据 YXM25 的碳十四年代测试数据(距今 2800±80 年)^⑬作参照,发掘者将此区墓葬的年代推定在春秋早期,较为妥当。

河北省承德地区隆化县下甸子墓出土虎纹首青铜短剑 1 件(标本 10),隆化县三道营骆驼梁 M8 出土熊纹首青铜短剑 1 件(标本 14)^⑭。下甸子墓所出虎纹首短剑,剑身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流行的曲刃短剑形制,而与剑身连铸一体的剑柄,则属冀北山地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铸作风,所以这是一件集东胡文化与山戎文化为一身的糅合型短剑。与此剑相类的标本,仅见于宁城县南山根 M101 石椁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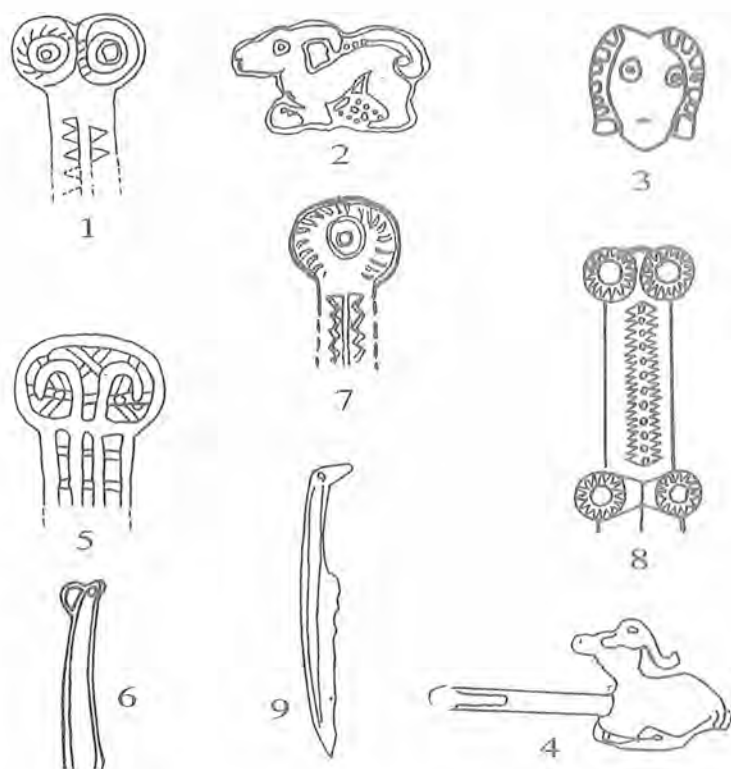
图四、兽纹

1. 北辛堡 M2.8, 第 4 期。2. 玉皇庙 YYM102.11, 第 1 期。3. 玉皇庙 YYM48.7, 第 1 期。4. 窑上营房标本 15, 第 3 期。5. 旧绛远 F39, 第 1 期。6. 甘子堡 9 : 13, 第 3 期。7. 梨树沟门 L1671, 第 3 期。8. 玉皇庙 YYM224, 第 3 期。9. 甘子堡 M8 : 34, 第 2 期。10. 承德 C539, 第 3 期。



图五、马纹

1. 甘子堡 M20 : 13, 第3期。2. 别墅区 M32 : 10, 第3期。3. 小白阳 M22 : 1, 第3期。4. 东南沟 M6 : 5, 第1期。5. 甘子堡 M8 : 9, 第2期。6. 小白阳 M30 : 5, 第3期。7. 别墅区 M36 : 4, 第3期。8. 别墅区 M36 : 7, 第2期。9. 别墅区 M32 : 4, 第3期。10. 大古城 C3176, 第4期。11. 别墅区 M32 : 3, 第3期。12. 甘子堡 M5 : 8, 第3期。13. 五道河子 M8 : 3, 第5期。14. 旧绥远 G65, 第5期。



图六、羊纹

1. 玉皇庙 YYM22 : 6, 第 1 期。2. 张家口 C2279, 第 4 期。3. 别墅区 M36 : 19, 第 2 期。4. 五道河子 M9 : 14, 第 5 期。5. 玉皇庙 YYM257, 第 2 期。6. 旧绥远 F35, 第 1 期。7. 骆驼梁标本 22, 第 3 期。8. 别墅区 M36 : 1, 第 2 期。9. 甘子堡 M7 : 3, 第 2 期。

的一件虎纹柄匕首式曲刃青铜短剑^⑤。二者在形制与铸造工艺作风上颇为接近。南山根 M101 石椁墓因出有中原式铜戈和一套青铜礼器, 故所定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较为可靠, 那么我们据此将隆化县下甸子墓所出的这件虎纹首短剑的年代, 推定在春秋早期, 估计不会有太大偏差。隆化县三道营骆驼梁 M8 出土的熊纹首短剑, 其铸造风格及工艺与下甸子墓的虎纹首短剑一致, 同属糅合型, 因此其年代亦可

定为春秋早期。本文还收入征集品 12 件, 出自河北省沽源县兽首铜刀 1 件(C1771); 还有旧绥远地区出土的各种动物纹铜刀 11 件, 即虎纹刀 4 件(G10、G15)^⑥(C12、C13)(图三: 11、13)^⑦, 鸟纹首虎纹柄刀 1 件(G14), 三鹿纹柄刀 1 件(G12)(图八: 1)^⑧, 几何纹兽头刀 2 件(P39(图四: 5)、P40), 几何形鸟纹刀 1 件(G46), 几何形羊纹刀 1 件(P35)(图六: 6), 蛇纹刀 1 件(E31)(图七: 3)^⑨。上述 12 件征集铜刀标

本,其形制和动物纹样,与1985年发现的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者^④,以及怀来县甘子堡山戎墓地M12:3号铜刀标本,作风相近似^⑤。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的年代,以该墓所出中原式青铜礼器和铜戈的形制,可确定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故据此推测上述装饰动物纹的铜刀标本的年代,大致不会晚于春秋早期。

第二期——春秋早中期至春秋中期

此期含动物纹的文化遗存,在总的数量上较第一期有所增加。出土地点主要有:北京市延庆县靳家堡乡玉皇庙,古城村西梁坨别墅区,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张家口,怀来县甘子堡,滦平县苟子沟。

属春秋早中期阶段的遗存有:延庆县玉皇庙墓地YYM95出土写实双熊对吻纹青铜短剑1件(YYM95:8)(图十:11)^⑥;延庆县古城村西梁坨别墅区山戎墓地M36出土虎纹首复合式铜刀1件(M36:2)(图三:7)^⑦,写实羊头纹铜扣饰1件(M36:19)(图六:3),象形铜带钩1件(M36:6)(图十一:7),几何形虺龙纹铜带钩1件(M36:5)(图九:1),几何形羊眼圈纹青铜短剑1件(M36:1)(图六:8),几何形变体马纹铜锥管(M36:4)(图五:7)和铜尊(M36:7)(图五:8)各1件,此墓还出土马形铜带饰69件,鸟形饰82件(M36:24、25)^⑧(图二:7、8)。

属春秋早中期至春秋中期阶段的遗存有:玉皇庙墓地YYM229所出写实鸟纹铜带钩1件^⑨,YYM226所出写实马形铜饰牌1件^⑩,YYM70所出几何形羊眼圈纹青铜短剑1件^⑪,YYM257所出几何形透雕羊头纹青铜短剑1件(图六:5)^⑫。

怀来县甘子堡墓地有一部分装饰动物纹的器物,年代当属春秋中期阶段。甘子堡墓地共发现山戎墓葬21座,因先期遭严重破坏,全部文物均系事后收缴所获,虽作过回忆复原工作,但不能排除某些器物归错墓号的情况,故经回忆复原的各墓器物的组合关系,不能作为判断各墓具体年代

的可靠依据。因此,对于墓地的年代,只能根据出土器物总体面貌,选取有代表意义的器物,推断其早、晚相对年代。原简报称该墓地的“年代上限可以定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下限不会晚到战国早期。”^⑬以该墓地出土的一批中原式青铜礼器中,有M1:1号鼎,M15:1号鬲,M1:5号盘,M1:4号豆和I式铜戈,以及M4:2、M4:3、M8:5这三件青铜短剑的形制,以及M8:26这种两端作圆角三角孔铜马衔的形制作风考察,至少这些器物所代表的年代应不晚于春秋中期;当然,也有不少年代明显偏晚的器物,如M2:8带盖铜鼎、M8:7重环孔铜马衔,M1:23兽面纹铜带钩等,其年代则将晚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因此推定甘子堡墓地这21座墓的年代,应在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据此,该墓地简报中下述器物,可认定为春秋中期的制品:M18:4写实群鸟纹铜刀1件(图2:15),M18:11几何形豹纹铜镞1件(图十一:2),M18:5几何蛇纹铜镞6件(图七:2);M7:3几何羊头纹铜刀1件(图六:9);M1:8写实龟形铜饰46件(图十一:11),M1:21金虎饰牌1件,M1:16几何形鸟纹铜镞2件,M1:13几何形虺龙纹铜镞2件;M4:2几何形羊眼圈纹青铜短剑1件;M8:24写实虎纹铜饰牌3件;M8:32虎踏单环铜饰1件(图三:6);M8:15蜷曲兽纹铜泡4件;M8:34几何纹兽形铜带钩1件;M8:9几何形马纹铜锥管4件(图五:5);M12:3写实圆雕鸟纹铜刀1件(图二:14);M12:1双熊对吻纹青铜短剑1件(图十:10);M19:7写实圆雕鸟纹铜刀1件等^⑭。(图二:13)

滦平县苟子沟山戎墓地,发掘资料仅见零星报导^{⑮⑯}。属于春秋早中期至春秋中期阶段的装饰动物纹的器物有:苟子沟M18盘羊角纹青铜短剑1件(78M18:1),虎纹铜饰牌2件(苟子沟76M16,78M18)^⑰。

此外,还有9件征集品,也属此期遗存。包括装饰羊眼圈纹的青铜短剑5件,

分别出自承德、隆化县三道营骆驼梁 M8 和 M4、滦平县营房西山墓及蔚县(标本 20、22、25、26、29)^④;装饰几何形透雕羊头纹的青铜短剑 2 件,分别出自滦平县营房大腰子墓、丰宁县四岔口土坎子墓(标本 32、33)^⑤;装饰双蛇纹柄铜刀 1 件,出自张家口(C78)(图七:4)^⑥;还有出自旧绥远的写实虎形铜饰牌 1 件(G43)^⑦。参照延庆县玉皇庙墓地同类器物的年代,上述 9 件标本的年代可推定在春秋早中期至春秋中期。

第三期——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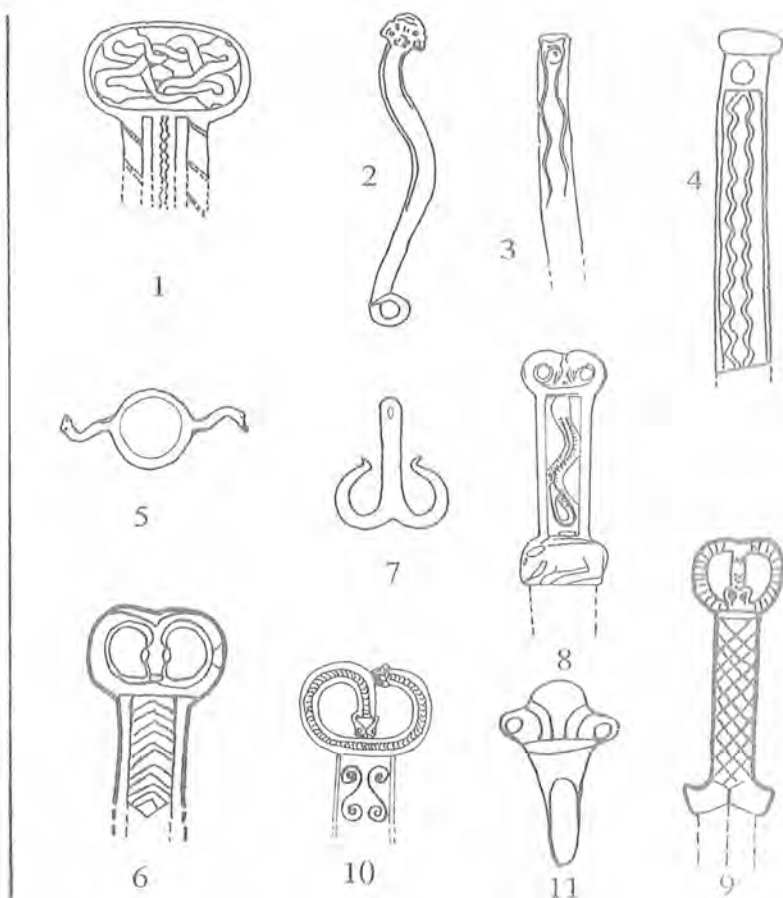
此期含动物纹的文化遗存,在装饰动物种类和数量,以及装饰器类上,较前两期都显著增多,是五期遗存中,最为丰富和繁

盛的时期。出土动物纹器物的地点主要有:北京市延庆县靳家堡乡玉皇庙,旧县乡古城村西梁坨别墅区;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张家口、怀来县甘子堡、大古城,宣化县宣化、小白阳,赤城县龙关,丰宁县四岔口土坎子;沽源县,蔚县;承德地区承德,滦平县梨树沟门、苟子沟,窑上营房,隆化县三道营骆驼梁,旧绥远地区和满城采石场。

北京市延庆县玉皇庙墓地 YYM224 出土兽形首青铜短剑 1 件(图四:8)^⑧,YYM209 出土剑首装饰动物纹的青铜短剑 1 件(一面浮雕牛纹,另一面浮雕四蛇盘绕纹)(图七:3,图十:14)^{⑨⑩},YYM158 出土螭龙纹铜带钩 1 件^⑪,YYM164 出土双蛇纹青铜短剑 1 件(图七:6)^⑫,YYM129 出土双蛇首、犬纹柄青铜短剑 1 件,虎纹铜饰牌 1 件(图三:9)^⑬。上述 5 件装饰动物纹

图七、蛇纹

1. 玉皇庙 YYM209, 第 3 期。
2. 甘子堡 18:5, 第 2 期。
3. 旧绥远 B31, 第 1 期。
4. 张家口 G78, 第 2 期。
5. 丰宁 C2028, 第 3 期。
6. 玉皇庙 YYM164, 第 3 期。
7. 五道河子 M1:15, 第 5 期。
8. 旧绥远 D15, 第 5 期。
9. 小白阳 M44:1, 第 3 期。
10. 梨树沟门 L1797, 第 3 期。
11. 梨树沟门 M8:14, 第 3 期。



标本中,前3件的年代约当春秋中晚期,后2件的年代约当春秋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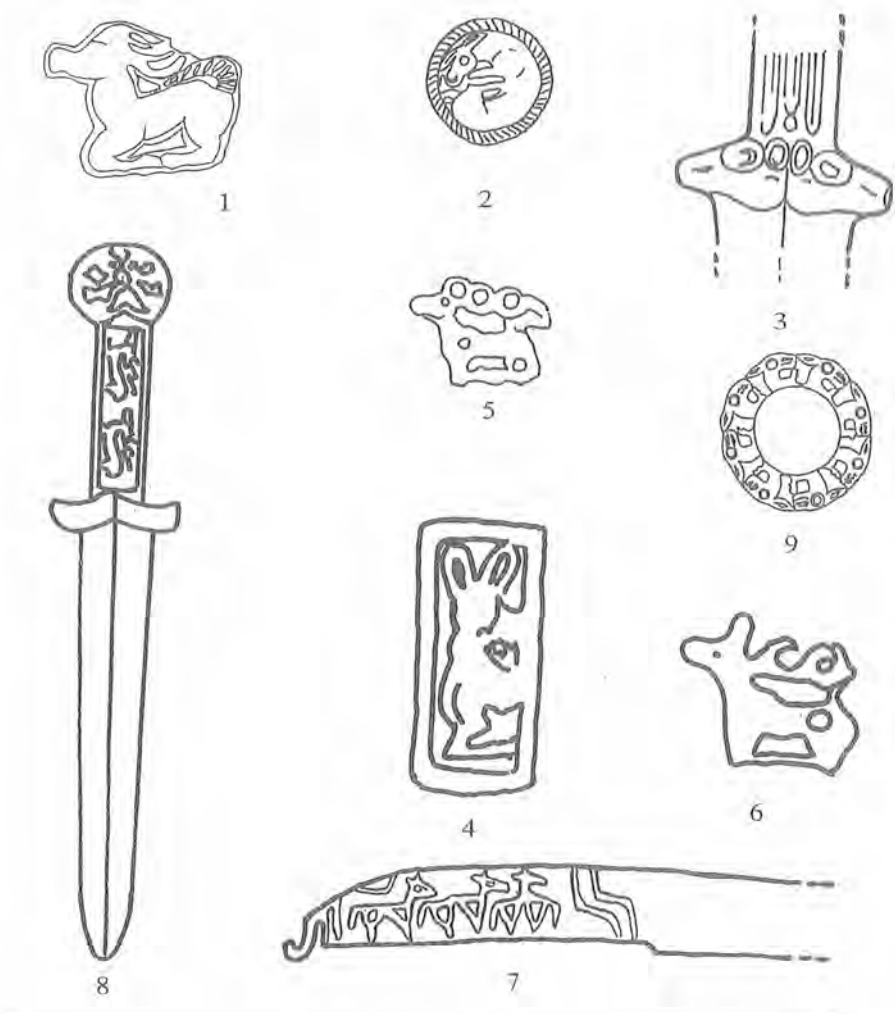
延庆县西梁垵别墅区 M30 出土螭龙纹铜饰 2 件(M30:7)(图九:5),兽面纹铜马面饰 2 件(M30:12),野猪纹铜铃形坠饰 1 件(M30:13)(图十:6),M32 出土金马饰牌 1 件(M32:4)(图五:9),铜马饰牌 1 件(M32:3)(图五:11),马形铜带饰 56 件(M32:10)(图五:2),八鹿头团转纹铜扣饰 2 件(M32:8)(图八:9),蜷曲鹿纹铜扣饰 14 件(M32:5)(图八:2),野猪纹铜铃形坠饰 12 件(M32:11—22)(图十:七)^④,M30 出有春秋晚期的带盖铜鼎和铜舟,M32 的随葬器物特点同于 M30,故这两座墓所出的装饰动物纹标本,年代可推定在春秋晚期。

怀来县甘子堡墓地出土的下述装饰动物纹的各类器物,参照玉皇庙墓地出土的同一个时期的相同器物,其年代大体可推定在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阶段。有关标本如次:M11:5 双豹首螭龙柄青铜短剑 1 件;M2:22 鹿纹铜竿头饰 2 件,M2:11 几何鸟纹铜饰 362 件;M3:17 虎形铜带饰 6 件,M3:26 卧鹿形铜带饰 27 件(图八:4),M3:19 卧鹿形铜饰 71 件(图八:5);M5:8 马纹铜镞 6 件(图五:12),M5:9 虎纹铜镞 3 件(图三:4),M5:12 马形铜带饰 24 件,M5:13 双犬纹铜带饰 2 件(图十一:8);M6:8 虎纹铜泡 13 件;M9:13 兽形铜带钩 1 件(图四:6);M10:2 马形铜带饰 20 件;M4:10 鸟形铜带扣 3 件(图 2:1);M20:11 虎纹铜锥管 3 件(图三:2),M20:12 一面铸饰虎纹,另一面铸饰几何形变体马纹 4 件,M20:13 对马纹铜竿头饰 2 件(图五:1),M20:3 蜷曲兽纹铜泡 11 件。

宣化县小白阳墓地,经正式清理发掘,共发现小型山戎墓葬 48 座,除 5 座墓无随葬品外,其它 43 座都有多少不等的各类随葬器物。墓地年代原简报推定为“上限可能早到春秋,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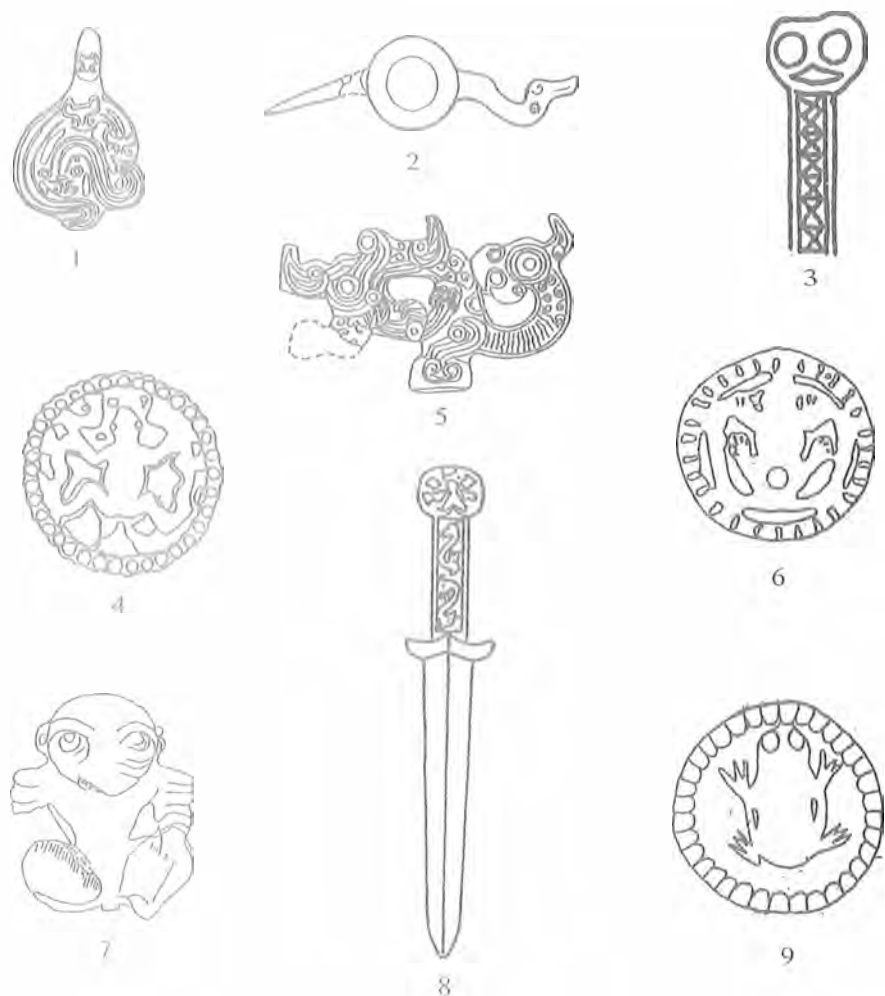
照延庆县玉皇庙墓地的器物分期序列,笔者认为小白阳墓地的年代应定在春秋中期以后,即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形象清楚、可供选择的装饰动物纹的器物有:M12 出土几何形羊眼圈纹青铜短剑 1 件(M12:4),M20 和 M41 各出写实虎形铜饰牌 1 件(M20:1,M41:9)(图三,12),M32 出土写实鹿形饰牌 1 件(M32:7)(图八:6),M2、M18、M22 和 M31 各出土写实马形铜饰牌 1 件(M2:6,M18:2,M22:1,(图五:3)(M31:4),M13 出土蛙形透雕铜饰牌 1 件(M13:3)(图九:6),M39 出土几何形鸟纹铜带钩 1 件(M39:3)(图二:10),M30 出土几何形透雕羊头纹青铜短剑 1 件(M30:13),M37 出土 1 件青铜短剑(M37:1),柄部一面浮雕双鹿纹,另一面浮雕 2 条螭龙纹(图八:8,图九:8),M44 出土双蛇纹青铜短剑 1 件(M44:1)(图七:9)^⑤。M29 出土连体鸟形饰 1 件(M20:3)(图二:6),M32 出土几何形马纹铜锥管 1 件(M32:5)(图六:5)。

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先后作过两次抢救性清理,共发现山戎小型墓葬 100 余座。第一次在 1989 年,因植树破坏山戎墓葬七八十座,经文物部门清理 26 座,其中完整墓葬 8 座,共出土各类文物 840 余件,其年代原简报认为“当为春秋前期,下限到战国早期”^⑥;第二次在 1993 年,清理墓葬 30 余座,出土各类文物 400 余件,其年代原简报推定在“上限可能至西周初或两周之际,下限不会晚于春秋、战国之际”^⑦。综观此处墓地两批出土器物的形制特点,参考玉皇庙墓地和甘子堡墓地同类器物的编年情况,认为梨树沟门墓地的年代与宣化县小白阳墓地的年代接近,上限不会早到西周初或两周之际,而应定在春秋中期或中晚期,下限当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有关动物纹标本如次:剑首装饰羊眼圈纹的青铜短剑 1 件(L:1805)(图六:3);双蛇首青铜短剑 1 件(L:1797)(图七:10)^⑧;93 年 M8 出土牛头纹青铜短剑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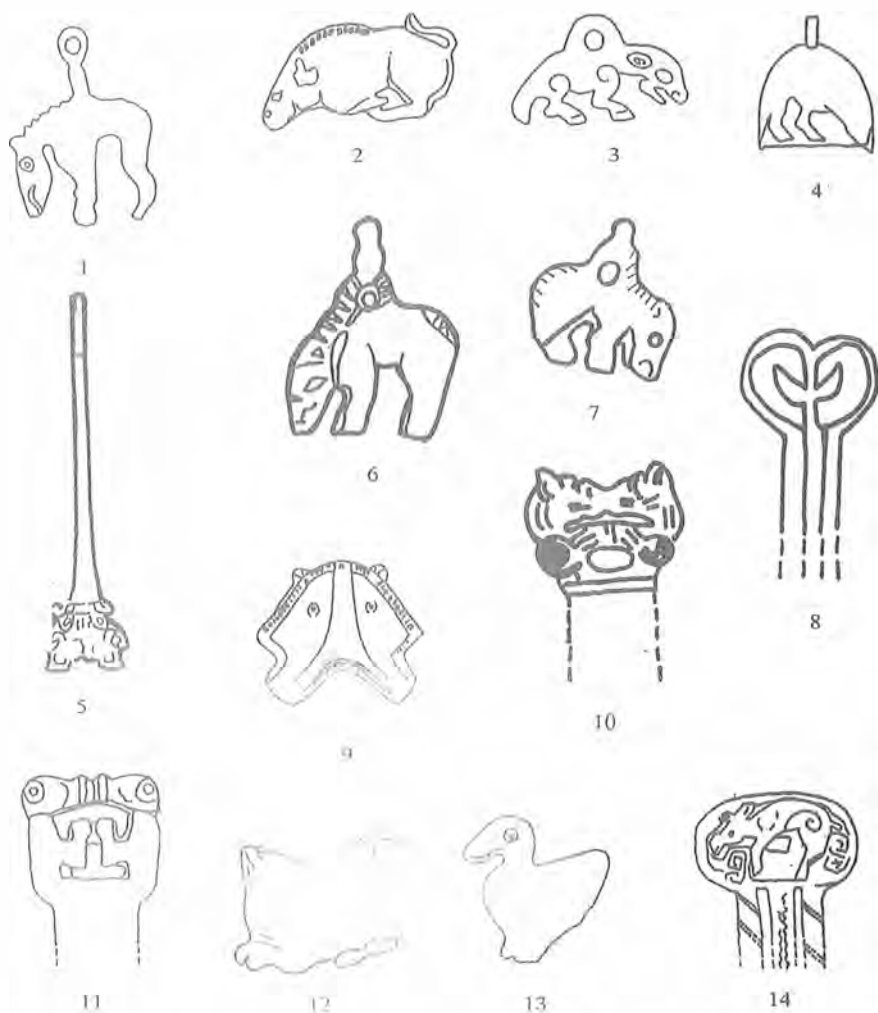
图八、鹿纹

1. 大古城 C101, 第 3 期。2. 别墅区 M32 : 5, 第 3 期。3. 旧绥远 C14, 第 5 期。4. 甘子堡 M3 : 26, 第 3 期。5. 甘子堡 M3 : 19, 第 3 期。6. 小白阳 M32 : 7, 第 3 期。7. 旧绥远 G12, 第 1 期。8. 小白阳 M37 : 1, 第 3 期。9. 别墅区 M32 : 8, 第 3 期。



图九、龙纹和蛙纹

1. 别墅区 M36 : 5, 第 2 期。2. 北辛堡 M1 : 70, 第 4 期。3. 大古城标本 35, 第 3 期。4. 龙关 C1819, 第 3 期。5. 别墅区 M30 : 7, 第 3 期。6. 小白阳 M13 : 3, 第 3 期。7. 金沟屯, 第 5 期。8. 小白阳 M37 : 1, 第 3 期。9. 梨树沟门 L1838, 第 3 期。



图十、野猪纹、熊纹、鱼纹、牛纹、鸡纹、鸭纹

1. 旧绶远 G64, 第 4 期。2. 五道河子 M1 : 39, 第 5 期。3. 北辛堡 M2 : 2, 第 4 期。4. 北辛堡 M1 : 16, 第 4 期。5. 北辛堡 M1 : 82, 第 4 期。6. 别墅区 M30 : 13, 第 3 期。7. 别墅区 M32 : 11, 第 3 期。8. 梨树沟门 M8 : 3, 第 3 期。9. 五道河子 M1 : 18, 第 5 期。10. 甘子堡 M12 : 1, 第 2 期。11. 玉皇庙 YYM95, 第 2 期。12. 五道河子 M8 : 7, 第 5 期。13. 东南沟 M4 : 1, 第 1 期。14. 玉皇庙 YYM209, 第 3 期。

件(93M8:3)(图十:8),几何形蛇纹铜带钩1件(93M8:14)(图七:11);93年M28出土几何形鸟纹铜带钩1件(93M28:1)^④;93年M33出土马形铜带饰1件(93M33:15)。1989年还曾征集到龟形铜带钩1件(L:1799)(图十一:10),象形铜带钩1件(L:1840)(图十一:6),螭龙纹铜带钩1件(L:1836),鸟纹铜带钩2件(L:1689)(图二:3),蛤蚧纹铜带钩1件(L:1671)(图十一:5),以及未名几何兽纹铜带钩4件(L:1796,1671(图四:7),1735,1824),马形铜饰牌3件(L:1826),透雕蛙形铜饰牌3件(L:1838)(图九:9),马形铜带饰44件(L:1831),虎纹铜锥管2件(L:1823(图三:1),1675)^⑤,鸟形饰(M1:30)(图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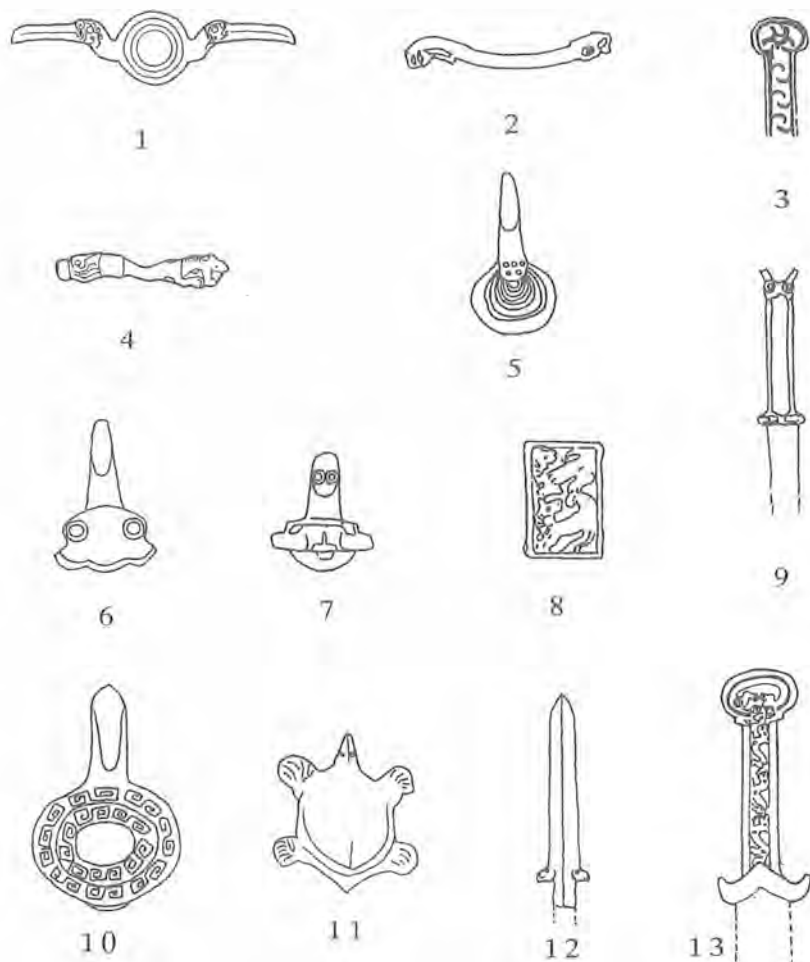
属于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其它零散装饰动物纹的器物有:出于旧绥远地区铸饰奔犬纹柄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2件(C12)(图十一:13)(C13);剑首装饰几何形变体羊眼圈纹青铜短剑1件(E28);剑首铸饰蛇纹的青铜短剑4件(E23,24,25,26)^⑥;出自承德的剑首铸饰三蛇纹青铜短剑1件(标本40);出自怀来县大古城村、剑首铸饰双蛇纹的短剑1件(标本41),蛙面纹短剑1件(标本35)(图九:3),在怀来县大古城村和沽源县,曾征集到双兽螭曲相对纹首青铜短剑2件(标本39,图四:5,标本38);滦平县窑上营房出土触角纹首青铜短剑1件(标本15)(图四:4),荷子沟出土龟纹首青铜短剑1件(标本31)(图十一:3)^⑦,荷子沟还出土写实蛙形铜饰牌1件^⑧;赤城县龙关出土蛙形铜饰牌2件(C1819)(图九:4), (1820);宣化县出土蛙形铜饰牌1件(C1821),还出土双马螭曲对卧纹铜饰1件(C1822);怀来县大古城出土卧鹿纹铜饰牌1件(C101)(图八:1);张家口出土虎纹铜饰牌1件(C2405),还出土鸟纹铜带扣1件(C1812);旧绥远出土虎踏双环纹铜饰牌1件(G59),虎叼食纹铜饰牌2件(G45、G58),虎食鹿纹铜带饰1件(G31)(图三:8);满城县采石场出土四虎哺乳嘻戏纹金

虎饰牌1件(图三:10);丰宁县出土写实双蛇纹铜环1件(C2028)(图七:5),承德出土瑞兽带钩(C539)(图四:10)^⑨,骆驼梁出土单羊眼圈首青铜短剑(标本22)(图六:7)^⑩。

第四期——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

此期装饰动物纹器物的出土地点及数量,比第三期明显递减。主要出土地点有: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怀来县北辛堡,承德地区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这两处地点所获考古资料,对于研究晚期阶段山戎文化具有较重要学术价值。此外还有几处零散的,但比较重要的征集品出土地点,大多在河北省,如张家口、宣化、赤城龙关、康保、丰宁、怀来县大古城、滦平县营房村、旧绥远,以及唐县钓鱼台等。

怀来县北辛堡墓地,经正式清理发掘的墓葬共2座,均属山戎部落首领级的大型墓(M1、M2)。其中M1出土遗物较丰富,但先期已遭扰乱;M2随葬品较少,但资料完整。装饰动物纹的山戎器物数量不多。M1出有几何形双鸟喙相对纹青铜短剑1件(M1:76)(图二:17),熊纹长条铜带钩1件(M1:82)(图十:5),野猪纹铜铃形坠饰78件(M1:6,图十:4,M1:31),螭龙形铜镞1件(M1:70)(图九:2);M2出有兽形铜竿头饰2件(M2:8、9)(图四:1),野猪纹铜铃形坠饰23件(M2:2)(图十:3),鸟头纹金箔泡饰8件(M2:1,M2:15)(图二:12)^⑪。M1随葬有形制偏晚的鼎、壶、鉴、缶等一套中原式青铜礼器,还有长胡三穿、援、内略显上翘的铜戈,以及蟠螭纹铜车辖等,标志其年代应属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阶段;M2所出铜戈和铜车饰(如杆首饰、盖弓帽等)。以及其它小件器物,形制特点与M1基本一致,故此二墓年代当属同一时期。原简报推定“两墓的时代应为战国早期”,较为适当。至于文化性质问题,发掘者因受当时资料的局限,认为北辛堡的动物纹短剑和殉牲习俗等,是受到西北边陲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和札赉诺尔地区影响,



图十一、鹤纹、豹纹、龟纹、狗纹、象纹、狼纹、蛤蜊纹

1. 炮台山, 第 4 期。2. 甘子堡 M18:11, 第 2 期。3. 荷子沟标本 31, 第 3 期。4. 玉皇庙 YYM18, 第 1 期。5. 梨树沟门 L1671, 第 3 期。6. 梨树沟门 L1840, 第 3 期。7. 别墅区 M36:6, 第 2 期。8. 甘子堡 M5:13, 第 3 期。9. 龙关标本 42, 第 4 期。10. 梨树沟门 L1799, 第 3 期。11. 甘子堡 M1:8, 第 2 期。12. 丰宁标本 44, 第 4 期。13. 旧绶远 C12, 第 3 期。

或是“由那些地方传入的”，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由冀北山地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自成体系、且年代多早于范家窑子和札赉诺尔遗存的山戎物质遗存本身得到解决。

虎什哈炮台山墓地^⑤，共发掘中、小型墓葬 35 座，其中 25 座作东西向，10 座为南北向，杀牲殉葬的墓有 5 座，以埋葬习俗考察，这里是经历了与燕和中原文化长时间融合之后的一处山戎氏族墓地。随葬品中吸收有相当多的燕和中原文化器物，同时也保留着若干山戎文化固有因素。发掘简报仅发表了 M6 和 M8 两座墓地的有限材料，因此可供研究的装饰动物纹的器物仅有：M6 出土的鹤嘴铜镞 2 件（图十一：1）、鸭嘴铜策辖 2 件，以及 M28 和 M28 以北两座墓葬内出土的鸟形长身铜带钩 8 件（图二：16）。因 M6 出有中原式三角勾云纹铜敦，与该墓紧相毗邻的 M21 随葬有尖首刀币，还有 M28 以北墓葬中出土三穿翘援长胡铜戈，故原简报推定该地年代“当在春秋末到战国初年”，这一推论是合适的。

此期装饰动物纹的征集资料有：张家口出土双鸟弯颈勾首纹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 件（标本 45），双狼头相背纹（剑格）青铜短剑 1 件（标本 43）^⑥，卧羊形铜饰牌 1 件（C2279）（图六：2）；宣化出土阴刻几何纹螭曲动物形铜饰牌 1 件（C1816）；赤城县龙关出土几何形六鸟喙纹圆形铜扣饰 1 件（C1825）（图二：2），单狼首青铜短剑 1 件（标本 42）（图十一：9）；康保出土螭曲马纹铜饰牌 1 件（C1818）；^⑦丰宁出土双狼头相背纹（剑格）青铜短剑 1 件（标本 44）（图十一：12）^⑧；怀来县大古城出土几何形变体马纹柄铜刀 1 件（C3176、A15）（图五：10）^⑨；滦平县营房村遗址出土蛙面石人雕像 1 件^⑩；旧绥远出土单体虎纹铜饰牌 1 件（G60），野猪纹铜坠饰 1 件（G64）（图十：1）；唐县钓鱼台墓葬出土金虎饰牌 6 件（C1368）（图三：14）^⑪。

第五期——战国中期至战国中晚期

此期含动物纹的资料，较第四期又明

显衰减。经正式发掘的考古遗存，仅有辽宁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一处。征集资料具体地点也很少，仅有河北省承德地区滦平县金沟屯后台子及解放前的旧绥远。

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位于青龙河上游右岸，紧邻河北省平泉县和青龙县。该墓地有山戎晚期中、小型墓葬 11 座，出土 431 件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金、铜遗物，其中有一组特色鲜明的装饰动物纹器物^⑫，从而为我们研究山戎文化晚期阶段动物纹的种类和基本特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装饰动物纹的器物有：M1 出土金野猪饰牌 1 件（M1:39）（图十：2）^⑬，双蛇相背纹铜钺 1 件（M1:15）（图七：7），写实鱼形铜当卢 3 件（M1:18）（图十：9），写实圆雕羊形铜车辖 2 件（M1:1）；M8、M9、M10 各出马形铜饰牌 1 件（M8:3）（图五：13）（M9:7、M10:4）；M8 出土鸡形铜饰牌 6 件（M8:7）（图十：12）；M9 出土鹿形铜带钩 1 件（M9:14）^⑭。

属于这一期的征集品包括：滦平县金沟屯后台子遗址出土蛙身石人雕像 1 件（图九：7）^⑮；旧绥远所出双兽相对剑首、双鹿相背剑格青铜短剑 1 件（C14）（图八：3），双鸟对首青铜短剑 2 件（D20）（图二：11）（D21），双鸟对首、蛇纹柄、羊纹格青铜短剑 1 件（D15）（图七：8），单体虎形铜饰牌 2 件（G57、G61），虎踏三环铜饰牌 1 件（G63），曲颈卧马铜饰 1 件（G65）（图五：14），饰同心圆纹马形铜饰 1 件（G62），五虎对围纹长方形铜饰 1 件（G47）（图三：5）^⑯。

五道河子墓地的年代，根据 M1 和 M8 出土的中原式长胡三穿铜戈及 M1 出土的中原式细密的蟠螭纹铜钟的形制特点，可以断其年代大约已进入战国中期以后至战国中晚期。关于其文化性质，原简报已认定为“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宏观概念，无疑是正确的。唯现在有关山戎文化的考古资料已日益丰富，依据该墓地出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上述动物纹器物，特别是其中的金野猪形饰牌、马形铜饰牌和鹿形铜带钩，还有金璜形项饰，以及总的



图十二、中国北方早期
青铜文化动物纹饰

1. 白浮村 M3:22。
2. 旧绶远 C16。
3. 白浮村 M3:22。
4. 张北。
5. 张家口。
6. 兴隆小河南 S1。
7. 白浮村 M2:40。
8. 旧绶远 C17。
9. 旧绶远 A1。
10. 青龙抄道沟。
11. 青龙抄道沟。

埋葬习俗特点等情况,笔者倾向进一步认定这里应是一处经历了与燕和中原文化长时间融合的山戎晚期阶段的氏族墓地。

①萨里莫尼:《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A. Salmony, Sino - 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巴黎,1933年。

②安特生:《鄂尔多斯青铜器选集》(J. G. Andersson, Selected Ordes Bronzes),《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3年第5期。

③安特生:《动物纹中狩猎巫术的含义》(J. G. Andersson,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2年4期。

④⑦⑩⑪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

⑤阿尔涅:《滦平和宣化的发现》(T. J. Arne Die Funde Von Luan P'ing und Hsuan Hua),《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斯德哥尔摩,1933年5期。⑥⑬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1期。

⑦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⑧郑绍宗:《河北平家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977年1期。

⑨⑫⑭⑮⑯⑰⑱靳枫毅:《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⑩靳枫毅:《追寻一个消逝民族的踪迹》,《中国》画报,1987年8期。

⑪靳枫毅:《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葬制及主要文化特征》,《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1期。

⑬原思训、陈铁梅等《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九)》,《文物》1994年4期。

⑭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2期。

⑮安志敏、郑乃武:《宁城南山根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

⑯⑰⑱郑绍宗:《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青铜刀

子及有关问题》,《文物春秋》1994年4期。

㉚㉛㉜《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中国美术分类全集·15)图版四四——四七,图版七七,文物出版社,1995年。

㉝㉞㉟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1993年2期,图版十四。

㊱㊲㊳王武钰、王策:《延庆龙庆峡别墅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

㊴原简报称环孔图案带饰,其图解中称镂空形带饰。

㊵㊶㊷㊸沈军山:《谈山戎族蛙崇拜》,《北京史研究通讯》1993年1期。

㊹㊺㊻㊼㊽郑绍宗:《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文物春秋》1991年4期。

㊾㊿㊰㊱《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图三六,图版22,图版三六。

㊲陶宗冶:《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㊳㊴㊵石砚枢、赵志厚:《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4年2期。

㊶㊷马清鹏、赵志厚:《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

㊸刘来成:《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

㊹郑绍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㊺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2期。

㊻原简报称作“牛”。仔细观察这件饰牌,发现此兽吻部较长,后颈及背部有鬃,尾上卷,蹄也不大,不象牛,而象是野猪。

㊼原简报称作“羊”。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圆明园之藻园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

王有泉

一、前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圆明园遗址是1988年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图一)。1994年,北京市政府计划在圆明园遗址上兴建“圆明园微缩景观工程”。(后此工程未上马)。该工程将涉及圆明园中的“藻园”、“十三所”及“山高水长”三处遗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圆明园遗址微缩景观工程占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

同年的8月31日,开始对“藻园”、“十三所”、“山高水长”三处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圆明园微缩景观工程占地面积200亩,约合13万平方米,除了受地表上的现代建筑、树木和地下军事电缆等限制而不能进行考

古勘探的区域外,实际完成考古勘探面积11万平方米,其中,重点勘探了“藻园”、“十三所”、“山高水长”等三处遗址。

藻园遗址勘探结果如下:经勘探,藻园遗址建筑环船坞分布,平面呈曲尺形,南北长约105米,东西约95米。初步掌握了遗址内建筑遗迹分布的范围和布局,为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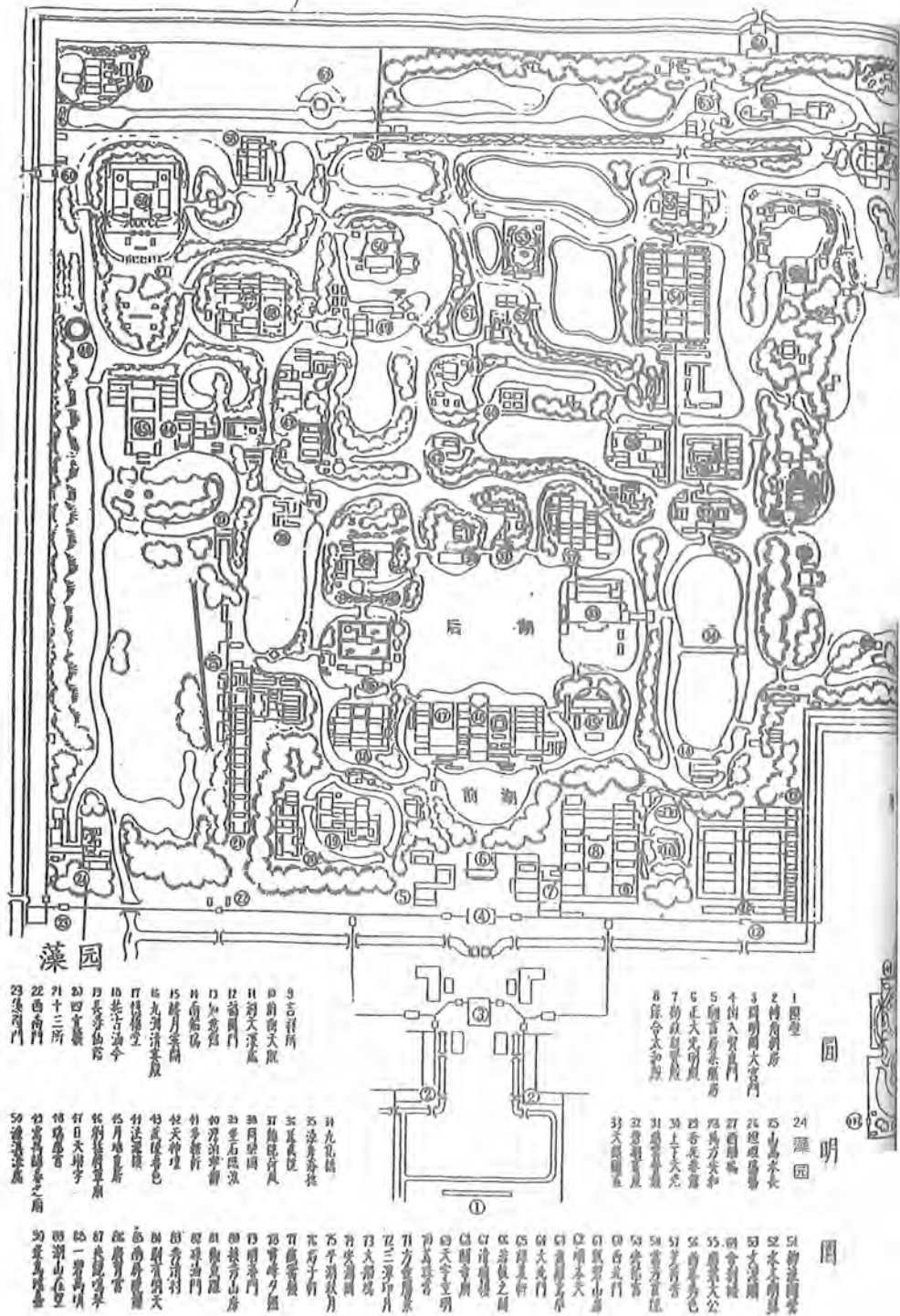
二、考古发掘

(一)发掘简况

藻园遗址位于圆明园遗址的西南隅,今海淀区大有环岛以东(图二)。1994年9月至12月对藻园遗址进行部分发掘,共布探方35个,其中10×9米探方1个,10×10米探方31个,10×20米探方2个,20×50米探方1个(船坞),发掘面积4600余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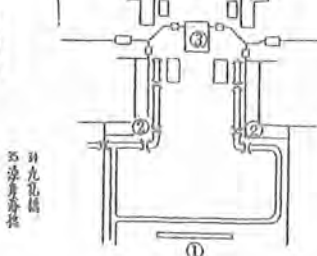


图一 圆明园位置图



藻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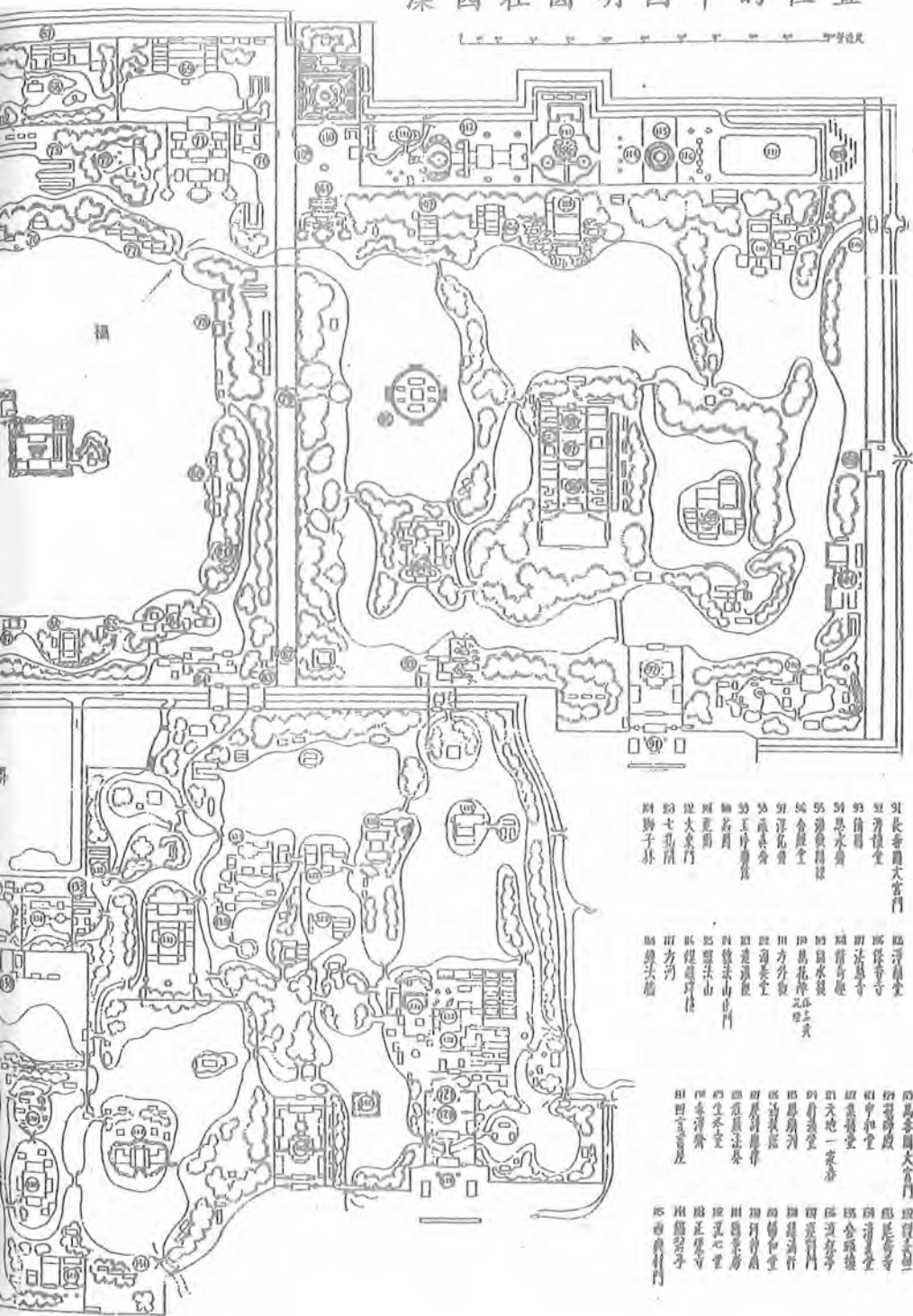
- 23 东河門
- 22 西南門
- 21 西門
- 20 四宜樓
- 19 卷云仙館
- 18 卷云仙館
- 17 卷云仙館
- 16 卷云仙館
- 15 卷云仙館
- 14 卷云仙館
- 13 卷云仙館
- 12 卷云仙館
- 11 卷云仙館
- 10 卷云仙館
- 9 卷云仙館
- 8 卷云仙館
- 7 卷云仙館
- 6 卷云仙館
- 5 卷云仙館
- 4 卷云仙館
- 3 卷云仙館
- 2 卷云仙館
- 1 卷云仙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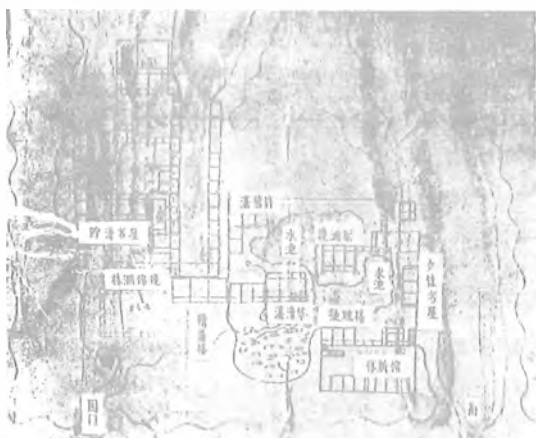
- 24 藻園
- 25 藻園
- 26 藻園
- 27 藻園
- 28 藻園
- 29 藻園
- 30 藻園
- 31 藻園
- 32 藻園
- 33 藻園
- 34 藻園
- 35 藻園
- 36 藻園
- 37 藻園
- 38 藻園
- 39 藻園
- 40 藻園
- 41 藻園
- 42 藻園
- 43 藻園
- 44 藻園
- 45 藻園
- 46 藻園
- 47 藻園
- 48 藻園
- 49 藻園
- 50 藻園
- 51 藻園
- 52 藻園
- 53 藻園
- 54 藻園
- 55 藻園
- 56 藻園
- 57 藻園
- 58 藻園
- 59 藻園

明園

藻園在圓明園中的位置



- 91 北新園大宮門
- 92 芳林堂
- 93 佛香閣
- 94 恩水齋
- 95 澗泉閣
- 96 金鏡堂
- 97 浮嵐閣
- 98 藻園
- 99 玉簫樓
- 100 芙蓉閣
- 101 大宮門
- 102 七北門
- 103 獅子林
- 104 浮鏡堂
- 105 保赤寺
- 106 法華寺
- 107 佛香閣
- 108 圓水鏡
- 109 萬花陣
- 110 方外樓
- 111 澗泉閣
- 112 澗泉閣
- 113 雲山門
- 114 雲山
- 115 佛香閣
- 116 方外
- 117 藻園
- 118 雲山
- 119 雲山
- 120 雲山
- 121 雲山
- 122 雲山
- 123 雲山
- 124 雲山
- 125 雲山
- 126 雲山
- 127 雲山
- 128 雲山
- 129 雲山
- 130 雲山
- 131 雲山
- 132 雲山
- 133 雲山
- 134 雲山
- 135 雲山
- 136 雲山
- 137 雲山
- 138 雲山
- 139 雲山
- 140 雲山
- 141 雲山
- 142 雲山
- 143 雲山
- 144 雲山
- 145 雲山
- 146 雲山
- 147 雲山
- 148 雲山
- 149 雲山
- 150 雲山
- 151 雲山
- 152 雲山
- 153 雲山
- 154 雲山
- 155 雲山
- 156 雲山
- 157 雲山
- 158 雲山
- 159 雲山
- 160 雲山
- 161 雲山
- 162 雲山
- 163 雲山
- 164 雲山
- 165 雲山
- 166 雲山
- 167 雲山
- 168 雲山
- 169 雲山
- 170 雲山
- 171 雲山
- 172 雲山
- 173 雲山
- 174 雲山
- 175 雲山
- 176 雲山
- 177 雲山
- 178 雲山
- 179 雲山
- 180 雲山
- 181 雲山
- 182 雲山
- 183 雲山
- 184 雲山
- 185 雲山
- 186 雲山
- 187 雲山
- 188 雲山
- 189 雲山
- 190 雲山
- 191 雲山
- 192 雲山
- 193 雲山
- 194 雲山
- 195 雲山
- 196 雲山
- 197 雲山
- 198 雲山
- 199 雲山
- 200 雲山



图三“样式雷”的藻园平面图(选自《刘敦楨文集》)

揭露出藻园遗址西部建筑群之全部和东部之一部。对已发掘部分的建筑布局和结构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藻园”遗址西部保存比较完整,东部破坏严重。遗址的地上建筑已全部被毁,现揭露出的是其建筑的基础部分及院内残存的石子甬路、水池等。

(二)地层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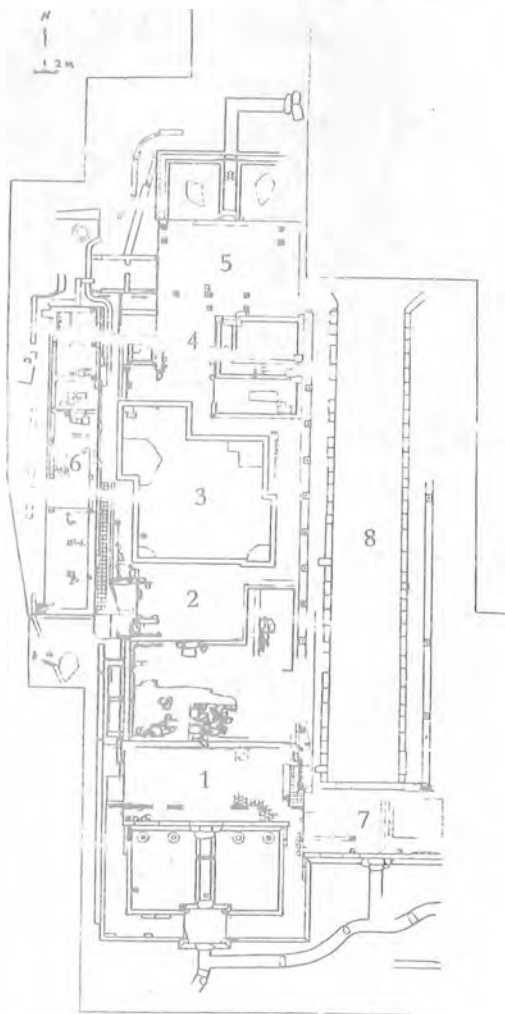
藻园遗址的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基本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近现代渣土和垃圾堆积地层,厚度一般在1米左右,下层为藻园建筑被破坏时的废墟堆积层,厚度一般10—20厘米。

(三)建筑遗迹与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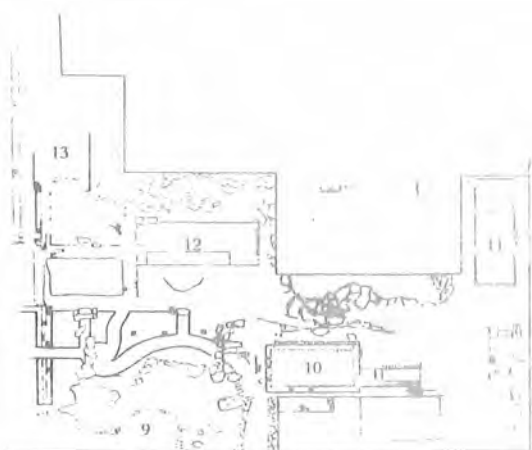
这次考古发掘所揭露出的藻园建筑遗迹有:1. 林渊锦镜,2. 贮清书屋,3. 自远轩,4. 履吉斋,5. 精藻楼,6. 船坞,7. 湛清华,8. 夕佳书屋,9. 凝眺楼,10. 湛碧轩的一部分,11. 溜琴亭的一部分,12. 临众芳,13. 水池。其中,《刘敦楨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所载“样式雷”的“藻园平面图”上明确标注的有“林渊锦镜殿”、“贮清书屋”、“湛碧轩”、“精藻楼”、“湛清华”、“凝眺楼”、“夕佳书屋”七项(图三)。余者“样式雷”图上虽没注明,但其他文献中均有文字记载。

下面仅将此次考古发掘中揭露出的藻

- 1 林渊锦镜
- 2 贮清书屋
- 3 水池
- 4 自远轩
- 5 履吉斋
- 6 临众芳
- 7 精藻楼
- 8 船坞



图四(d) 藻园遗址考古发掘平面图



图四(2)藻园遗址考古发掘平面图

- 9 澹琴亭
- 10 镜耽楼
- 11 夕佳书屋
- 12 贮清书屋
- 13 世碧轩

- 1 林渊锦镜
- 2 贮清书屋
- 3 水池
- 4 自远轩
- 5 履吉斋
- 6 临众芳
- 7 精藻楼
- 8 船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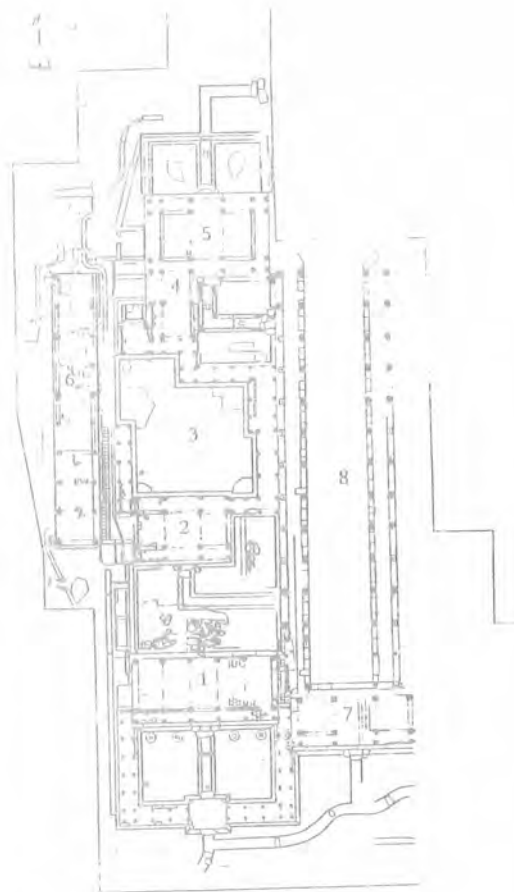
园遗址各建筑遗址状况逐一介绍(图四)。并将文献中有关藻园建筑的记述与此次发掘所获藻园建筑遗迹实际情况,对比考证,复原如下:(图五)

1、林渊锦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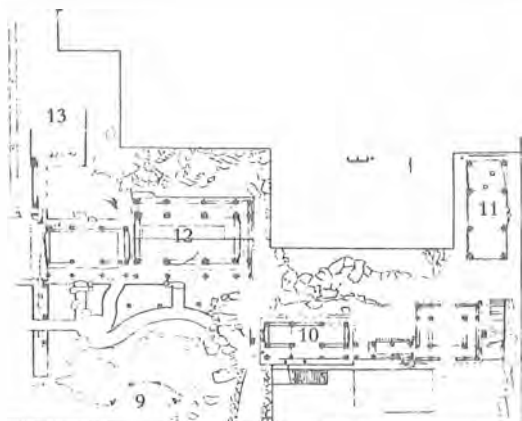
位置:林渊锦镜又名旷然堂,为藻园主要建筑之一,位于园内西南,南临园门,北为贮清书屋,东临精藻楼。(图四.1)

平面布局及结构:林渊锦镜殿南有院,院阔 15.15 米,进深 8.55 米。院四周有回廊,廊宽 2.2 米,两厢回廊各长 13.05 米。北与林渊锦镜殿之檐廊相接。南厢回廊中部建有院门(推测应为垂花门),门位于中轴线上,现仅存台基部分,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4.12 米,南北 3.30 米,残高 0.17 米,阶条石已去,四角有角柱石,角柱石平面略呈三角形,外侧边缘凿刻整齐,边长 40—50 厘米,顶部有榫槽,直径 8 厘米,高 2.5 厘米。台基四周环有卵石散水,散水宽 0.5 米。

门南侧有一阶如意踏步,高 0.17 米。踏步前有卵石小径往西南通向藻园门,踏步前 0.6 米处有一岔路向东去精藻楼,小径宽 1.2 米。门北侧亦有一阶如意踏步。踏步下有甬道直抵林渊锦镜殿,甬道宽 1.92 米,道中铺 3 列方砖,两侧铺卵石,方砖规格为 33×33 厘米,厚 5 厘米。垂花门



图五(1)藻园遗址建筑遗迹复原图



图五(2) 藻园遗址建筑遗迹复原图


9 溜琴亭


10 凝眺楼

11 夕佳书屋

12 湛清华

13 湛碧轩

图注:  表示后补的柱顶石

 表示原有的柱顶石

北约 4.30 米处,有砖列将甬道分为南北两段。

垂花门东西两侧的南厢回廊各长 5.55 米,残存少许阶条石,阶条石长 0.7—1.6 米不等,宽 0.35 米,厚 0.13 米,距地表 0.3 米。回廊转角与林渊锦镜殿结合部均有角柱石,其规格为宽 0.3 或 0.4 米,厚 0.1 米。

东厢回廊最北端保存 3 个柱顶石和少量铺地砖,砖的规格为 35×35 厘米,厚 5 厘米,错缝排布。柱顶石规格 33×33 厘米,厚 11 厘米,上皮凸出部分为 23.5×23.5 厘米,厚 2 厘米。中心圆孔直径 6 厘米,深 3.3 厘米,其中最北第 1、2 柱顶石的中心相距 1.15 米,与正殿檐柱和内柱之进深相合。第 2 与第 3 柱顶石相距 1.95 米,是为回廊之开间。西厢回廊北端存有北墙及其两侧柱顶石,墙宽 33 厘米,磨砖对缝,砖的规格为 24×11 厘米,厚 4 厘米,两柱顶石中心间距 1.15 米,是为回廊之进深,回廊台基四周环以散水,散水宽 0.4 米。

林渊锦镜殿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 16.15 米,南北宽 8.13 米。西北角残缺,东北距南界 3.52 米处有回廊与精藻楼后船坞回廊相接,前檐与东西两厢回廊相通。台基高出南侧院面 40 厘米,土衬石上直接铺条石,石宽 40 厘米,厚 13 厘米。殿后身高出贮清书屋院面 0.62 米,台基后身土衬石宽 57 厘米,高 12 厘米,内侧又有一层土衬石,外侧土衬石上原有数层侧塘石,现仅存一块,长 2.63 米,宽 0.45 米,厚 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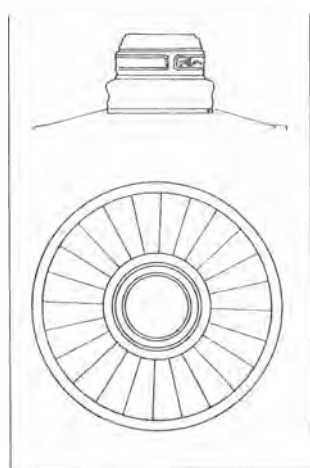
米。台基东侧土衬石宽 68 厘米,其上直接砌山墙,墙宽 48 厘米,磨砖对缝,砖之规格为 45×22 厘米,高 9 厘米。

林渊锦镜殿基础前部残存较多,殿基西南角存有一檐柱柱顶石和一内柱柱顶石,两者中心间距 1.15 米,是为林渊锦镜殿前檐之进深,此外,殿基前部残存有四段槛墙裙肩,宽 33 厘米,高 15 厘米。台基上错缝平铺方砖,前檐廊内的砖之规格为 35×35 厘米,厚 5 厘米,殿内的砖之规格为 40×40 厘米,厚 5 厘米。

台基前有如意踏步,高 23 厘米,连接垂花门内的甬道,林渊锦镜殿台基南侧东西方向排列有 4 个石墩(通道两侧各有两个),石墩中心间距 2.95 米,通高 34 厘米,其上半部半径 19 厘米,下半部半径 23 厘米,最东侧石墩上下两部分可分开,石墩座于楔形条砖铺成的圆形底座上,底座半径 55 厘米,楔形条砖长 26 厘米,内端宽 7.5 厘米,外端宽 13.5 厘米。

台基四周环布有散水,散水宽 45 厘米,台基后部一段散水较高。

复原:据《文集》记载“(藻园)门内为林渊锦镜殿五间,原名旷然堂,庚申劫后犹存。前有院落,周以回廊,……”。《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长春仙馆由西南门迤西为藻园,内为旷然堂,五楹,……”。这些记录及“样式雷”图示与考古发掘结果相合。据此复原,林渊锦镜殿有 5 个开间。东西两厢回廊各 5 开间,垂花门两侧南厢



林渊锦镜殿前
石墩

回廊各3开间,另有回廊四个稍小的转角开间。(图五.1)

2. 贮清书屋

位置:贮清书屋位于藻园西侧轴线上,其南距林渊锦镜9.78米,北临水池,东临船坞。(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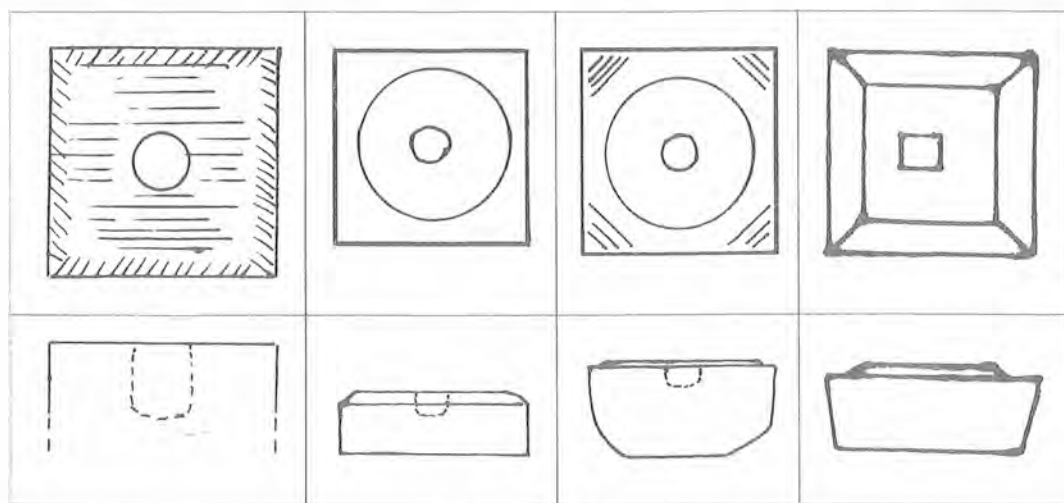
布局与结构:贮清书屋与林渊锦镜殿西侧有围墙相接,东连水池的南岸回廊,回廊与船坞衔接,构成一个封闭的建筑空间。

贮清书屋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0.98米,南北约7.4米,高于院面32厘

米,土衬石上有一层阶条石,石厚16厘米,宽44厘米。台基屋面破坏严重,以至看不出开间的情况,所幸台基西侧保存下来一列柱顶石(一个檐柱柱顶石,两个内柱柱顶石)及部分屋面,为我们了解该建筑的进深提供了线索。南侧檐柱与内柱柱顶石中心相距1.3米,后者与台基后部内柱柱顶石中心相距3.8米,两者之间铺地砖保存较完好。后部之内柱柱顶石以北,台基北留有一部分空地,当有一檐柱存在。又该柱顶石与台基西侧水池西南回廊之南侧檐柱顶石在一线上,故殿之北侧檐柱与回廊之北檐柱在一线,参照回廊之进深,殿之后檐廊进深为1.3米,亦即与前檐廊进深相同。

前檐廊柱顶石规格为 45×45 厘米,上皮凸出部直径36厘米,中孔直径8厘米,前檐内柱顶石规格 52×52 厘米,顶皮凸出部直径40厘米,殿后内柱顶石规格 57×48 厘米,顶皮凸出部36厘米,中孔直径9厘米。

两内柱东侧南北各保留一小段槛墙,墙宽分别为42厘米,37厘米,前檐廊内铺地砖规格 35×40 厘米,殿内 40×40 厘米,殿台基南侧有两层如意踏步,其分别高于地表10,15厘米,踏步南原有卵石小径,南



(从左至右)藏舟坞西岸两侧柱顶石;精藻楼檐柱柱顶石;船坞西侧栏土上南数第一、二个柱顶石;藏舟坞与临渊锦镜相通小廊檐柱顶石。



藻园遗址东部

藻园遗址西部南段
(林渊锦镜,精藻楼)



藻园遗址西部中段
(贮清书屋,临众芳)

藻园遗址西部北段
(自远轩,履吉斋,临众芳局部)





临众芳

考古发掘现场



临渊锦镜殿前石墩

湛清华前卵石小径



行约北距殿基 2.83 米东转抵达船坞, (因在近船坞处出现一段东西向小径残迹)。

殿基东北有水池, 池南应有回廊, 回廊现仅存夯土台基, 南北宽 1.1 米, 东接船坞, 其夯土台基实与贮清书屋连为一体, 平面构成曲尺形, 两者相接之转角有角柱石, 宽 30 厘米。

回廊南散水下压一列土衬石, 为南北向, 残长约 5.8 米, 宽 0.5 米。西距贮清书屋 1.07 米。按“样式雷”图样所示, 应为一条通向船坞的走廊, 且回廊靠近船坞西侧为向北延伸, 但发掘中未发现回廊柱顶石遗迹。土衬石东有夯土, 其上叠压有假山石。

贮清书屋殿基西端有南延之围墙与林渊锦镜殿后身相接, 使贮清书屋前形成一封闭的院落, 墙之裙肩宽 0.54 米, 高 33 厘米, 下部为虎皮墙, 上有腰线砖, 砖之规格为 42×20 厘米, 厚 8.5 厘米。裙肩上砌墙身, 墙身西侧与裙肩上下平齐, 东侧收分 5 厘米, 磨砖对缝, 残高 20 厘米。墙距林渊锦镜殿后身 88 厘米处腰线砖下有一过水石作, 宽 33 厘米, 高 20 厘米, 凿有两个涵洞, 涵洞宽 6 厘米, 高 11—15 厘米。

复原:《文集》和《日下旧闻考》等文献只记载贮清书屋在林渊锦镜殿后, 没有具体记述。根据“样式雷”和发掘情况复原: 贮清书屋面阔三间, 进深一间, 前后有檐廊。屋前有卵石径通船坞。(图五.2)

3. 水池及周围建筑

位置:水池位于藻园西部南北向的轴线上, 南接贮清书屋, 北连自远轩, 西北有小亭, 其岸界除西岸北段外, 皆有回廊等建筑环护。(图四.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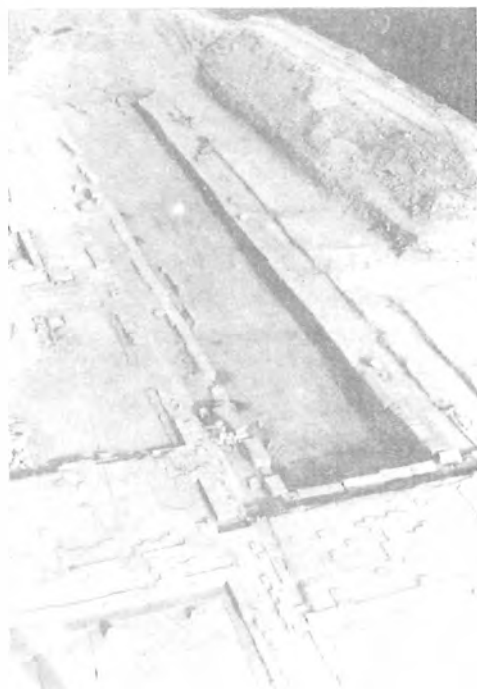
平面布局及结构:水池平面曲奇雅致, 记述以西南角为起点, 向北 7.9 米, 西折 1.7 米, 再向北 6.65 米, 是为池之西岸; 又向东 6.15 米, 南转 3.25 米, 继续向东 7.55 米, 是为池北岸; 又南行 5.6 米, 东延 0.85 米, 再在转向南 5.92 米, 是为池东岸; 自东岸向西 2.33 米, 北凸 0.22 米, 再向西 10.55

米, 回至西南起点, 是为南岸。周边砌有石条护岸, 其上部已毁弃, 目前可见的只有一层石条, 宽 0.4 米, 厚 0.5 米, 长度在 0.85 米, 1.4 米, 1.7 米等几种规格, 石条之间平面以“银锭”形的铁锁相连, 银锭锁之规格为通长 19 厘米, 腰宽 6 厘米, 尾宽 13 厘米。池内近岸处点缀多处假山石并有古树遗迹。

池南岸东段的回廊见贮清书屋一节记述。

池北岸有小亭、自远轩。轩往东有回廊接船坞西侧水池回廊。东岸回廊东依船坞, 且回廊与北、南两岸回廊连接。按雷氏原图东岸南段为不同于回廊形式的建筑, 在北段较宽敞处, 图上亦未绘开间。

上述北岸、东岸之建筑除自远轩、小亭等处, 仅余夯土台基, 不见柱顶石及铺地, 从发掘现场看, 其回廊地面应与贮清书屋平。池西岸南段建筑保存较完整, 台基东西宽 1.9 米, 南北长 10 米, 南端东与贮清书屋相接。最南 4 个柱顶石均保留下来, 其相互间中心间距均为 1.3 米, 是为建



船坞全景

筑之进深,其中西侧南数第二柱顶石与其北相邻近之两柱顶石,三者间距为 2.10 米,是为建筑的开间,由开间及间距知其应为回廊。南面 5 个柱顶石规格为 33×33 厘米,上皮凸出部分 22×22 厘米,中孔直径 6 厘米。余下最北的那个柱顶石为 45×45 厘米,上皮凸出部分 30×30 厘米,中孔直径 6 厘米,据此柱顶石推断,水池西岸北半部应有亭、榭一类较大型建筑。按样式雷图,此处确有一方形建筑,但发掘现场未发现其他柱础并且水池西岸平直,没有依建筑而出现曲折现象。

此建筑西侧做有排水沟,宽 25 厘米,深 17 厘米,向北入池,南端向东南延伸。

水池北岸西段有小亭,亭基础东西 3.16 米,南北 3.55 米。亭屋与自远轩及贮清书屋相平,东连自远轩,北边留有阶条石及角柱石,阶条石宽 30—35 厘米,厚 12 厘米,两角柱石分别宽 38 厘米,32 厘米,后者厚 11 厘米。西侧以腰线石代替阶条石,腰线石规格 40×20 厘米,厚 10 厘米。裙肩宽 43 厘米,墙身宽 33 厘米,两边各收分 5 厘米,墙身残高 40 厘米,共 8 层砖,砖之规格 25×14 厘米,厚 5 厘米,磨砖对缝。亭西北角残存一柱顶石,规格 40×40 厘米,上皮凸出部直径 30 厘米,中孔直径 8 厘米。

亭北有小院,西、北为墙,东、南借亭和自远轩封闭,小院东西宽 2.62 米,南北 1.95 米,围墙的裙肩宽 0.54 米,高与亭面齐。墙身里侧收分 5 厘米,砖之规格 25×14 厘米,厚 5 厘米,北墙近自远轩 35 厘米处,裙肩下有过水石作,宽 32 厘米,高 25 厘米,本孔过水涵洞宽 12 厘米,高 12—16 厘米。院内西墙及亭、轩各有散水,散水宽 40 厘米,院面低于小亭 15 厘米,院内西北、东北角有假山石。院外西、北及小亭西有一排水沟,宽 26 厘米,深 22 厘米,注入水池。

又小院北约 2.3 米,有东西向土衬石残迹,应是围墙,东端接自远轩,宽 0.5 米,东西长 3.4 米,南侧与小院之间有夯土。按雷氏原图,其土衬石墙西端南转,与小院西墙直,围成一建筑或庭院。

复原:从“样式雷”图可知,藻园内有 2 个水池,考古发掘亦证实如此。

其一位于藻园西部南北向的轴线上(图五.3),即上述之水池。南岸回廊 3 间连接贮清书屋后檐廊 3 间;北岸西北有小亭,连接自远轩,共有回廊 8 开间。东岸回廊有 7 开间。

其二位于藻园东部,水池四周有精藻楼、湛碧轩、湛清华、夕佳书屋、凝眺楼等建筑环绕。因此次发掘只涉及水池的西部边缘部分,本文不多记述。

4. 自远轩、履吉斋及履吉斋南北庭院之建筑

位置:自远轩(图四.4)、履吉斋(图四.5)这组建筑位于水池北侧,东接船坞,西临西配房,北经履吉斋北小院可出藻园。

平面布局与结构:履吉斋和自远轩,居于同一建筑基础台基上,自远轩在南,为南北向,其东界大致在藻园西部的中轴线上。履吉斋在轩北,为东西向,这两个建筑与船坞西岸北段及水池北岸东段之回廊形成一座院落。

履吉斋北又有院墙环绕。自远轩与履吉斋之台基,平面为曲尺形。自远轩部分南北长 8.35 米,东西 5.7 米。履吉斋部分,南北长 9.25 米,东西 13.72 米。台基高出东南小院 35 厘米,高出履吉斋后院地面 40 厘米。自远轩东侧,履吉斋南侧之阶条石厚 13 厘米,宽 0.47 米,履吉斋北侧阶条石宽 0.45 米,厚 16 厘米。履吉斋、自远轩之屋面与贮清书屋平。铺地方砖规格为 40×40 厘米,厚 5 厘米。

履吉斋北侧保留有西数第一列和东数第二列檐柱、内柱之柱顶石;南侧明间之檐柱、内柱之柱顶石及两侧次间之一内柱柱顶石,由这 9 个柱顶石可知:履吉斋四周环有檐廊,进深为 1.3 米。明间的面阔为 3.55 米。次间的面阔 3.25 米。明、次间的进深为 5.2 米。

自远轩中部西侧保留下来一檐柱及内柱之柱顶石,两者之间距 1.3 米,距轩殿基

北界约 2.9 米,距南界约 5.5 米,参照样式雷图,轩面阔两间,南部有廊,与实际情况大抵相合。轩东檐柱柱顶石无存,推测应与履吉斋之西侧檐柱、内柱柱顶石在一线,故明间、次间面阔相符,即 3.25 米。

履吉斋明间正南有两阶,踏步高为 5 和 15 厘米,南接甬道,甬道距自远轩 1.5 米,中铺 3 列方砖,其规格为 35×35 ,两侧为卵石,通宽 1.95 米。行至履吉斋南 4.1 米处,甬道东转与船坞西侧踏步接。该踏步分两阶,第一阶与甬道平,第二阶高出 15 厘米。

履吉斋、自远轩、水池北岸东段回廊及船坞构成一进院落,院之东南有假山石。履吉斋正间北侧亦有两阶踏步,一阶与地平,二阶高出 15 厘米,北接通道,道宽 2.05 米,中为 3 列方砖铺地,两侧为卵石散水,砖之规格 35×35 厘米。

又自履吉斋西北,北引围墙 5.82 米,东转,东端残断。按样式雷图,东端应南折转,接履吉斋东北角,形成封闭院落。墙底部残宽 0.52 米,两侧有散水,宽 35—37 厘米。北墙西端有过水石作,中间有院门与履吉斋明间遥对,现只存半圆形门槛石,据此可知应为月门。门槛石上凿有放置拴杆用的半圆形小洞,月门左右有门枕石,月门与履吉斋之间通道两侧有假山石。履吉斋北侧甬道自园径北出藻园。

院墙西北有糙砾石垒砌的园墙。

复原:文献资料未标明自远轩具体位置。在贮清书屋北侧水池北岸的建筑基础,据残留柱顶石进行复原,可能是个敞轩,故推测此为自远轩(图五.4)。两开间,其西侧有廊。

文献资料亦未标明履吉斋的具体位置。明计成所著《园冶》对“斋”的解释是“斋较堂,惟气藏而致敛,有使人肃然斋敬之义。盖藏修密处之地,故式不宜敞显。”在藻园西路最北端,有南北有院、四面环廊较封闭的建筑(图五.5)。据此推测此应为履吉斋,三开间,进深一间,四周环有檐廊。斋北有石子甬路,经院往北东折,出藻园。

5. 临众芳

位置:位于贮清书屋、水池、自远轩西侧,其西有砾石垒砌的藻园园墙(图四.6)。

布局及结构:房基东西宽 4.9 米,南北长 29.6 米,除东侧有一列阶条石外,其余三面均以条砖替代阶条石。砖之规格为 $20 \times 40 \times 8$ 厘米,侧塘石以同样规格的条砖砌成。残存东檐柱柱顶石现存六个,西檐柱柱顶石 4 个,由它们的排列关系可知临众芳面阔 9 间,开间 3.2 米,进深 3.8 米。东檐柱柱顶石规格统一为 40×40 厘米,上皮凸出部直径 30 厘米,西檐柱柱顶石规格不统一,分别为 54×54 厘米,上皮凸出部分直径 30 厘米, 57×50 厘米,上皮凸出部分直径为 33 厘米;另两个相同为 40×40 厘米,上皮凸出直径 30 厘米,且做成半圆形。

自南向北排列之第 2、4、5、6、8 房间东侧有一阶踏步,踏步是用规整石材做成,外侧抹角,规格分别为 110×35 厘米, 117×40 厘米, 80×41 厘米, 95×35 厘米, 92×36 厘米,由踏步及两旁保存完好的散水推断,西配房 9 个开间似可划分为 5 个建筑单位。

房基南侧有卵石散水宽 27 厘米,东侧有 3 段卵石散水,其余为 20×42 厘米,厚 8 厘米规格的条砖的断块构成。东侧散水外有两列方砖,南北向铺成院面。

房基东南角有一段东西向石板, 140×44 厘米,石板东端接东西向糙石砌成的墙基,墙基上有过水石作,石板及墙基两侧有断砖(多为开条砖)铺成的院面,院面有排水沟、过水石作,向西北接水池西南回廊外侧的排水沟。两侧有卧立条砖护坡,另外砖区之西南角又有一柱顶石。

临众芳基础上有很多用断砖砌成的残墙,可能是晚期居民入园后建筑的。

复原:临众芳是藻园中一个建筑的名称,但其位置及建筑结构,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在“样式雷”图及发掘结果中,贮清书屋西北有一座 9 开间建筑,均不知其名。我们据其所在位置并结合临众芳名称寓

意,推测其为“临众芳”(图五.6)。

6. 精藻楼及藏舟坞

位置:精藻楼(图四.7)与其北侧藏舟坞(图四.8)位于藻园中部。精藻楼又名萃藻楼,在林渊锦镜东侧。

布局及结构:藏舟坞位于藻园中部,南北向,南北长约46.5米。北端外展,通圆明园水系,其东西两侧有回廊。船坞东、西、南三面有石泊岸,东泊岸北端以45度角外展,西泊岸北端以30度角向西北扩展。石泊岸上已破坏掉一层石条。由河道内发现的石材可知,原有柱顶石。两岸外侧2.3米处,各有一列拦土,上亦有柱顶石,柱顶石无上皮凸出部分,其上面低精藻楼屋面0.6米,柱顶石规格60×60厘米,中孔直径16厘米,深20厘米。西侧拦土上留有6个柱顶石,东侧留有8个,柱顶石之间正常间距为3.5米,推测东西各有十三开间,进深2.2米。

西侧回廊南端有一小廊与林渊锦镜相通,小廊东侧保留的两南北檐柱,柱顶石相距1.3米,柱顶石规格为33×33厘米,上皮凸出部为23×23厘米。小回廊铺地砖规格为35×35厘米,低于林渊锦镜屋面28厘米,从小回廊两端铺地砖修造的形状看,原有一阶踏步与林渊锦镜相通,踏步应为规格化的石林做成,同西配殿踏步,外缘抹角。小回廊与船坞之间又有一阶开条砖做成的踏步,踏步低于小回廊铺地砖25厘米,高出船坞回廊10厘米,船坞回廊铺地用东西错缝排列的开条砖铺地,现仅存一部分。铺地砖下为灰土夯土,自拦土向东,宽0.87米,灰土夯土与船坞石驳岸之间为素土填箱。

精藻楼位于船坞正南,台基东西13.45米,南北6.65米,东接湛清华,西连林渊锦镜东回廊。高出院面40厘米,层面与林渊锦镜平。铺地砖规格40×40厘米。

南边侧塘石拦土宽50厘米,内侧又有檐柱拦土,前者上有一列阶条石,石宽45厘米,厚16厘米,北侧阶条石厚13厘米,

现存留下东南、西南、东北三个角柱石。

明间只有内柱、檐柱柱顶石保存下来。檐柱柱顶石规格为45×47厘米,上皮凸出部直径39厘米,中孔直径9厘米,深5厘米。内柱顶石规格为52×52厘米,上皮凸出部中孔直径9厘米,深7厘米。明间开间4.53米,檐廊进深1.2米。两内柱东西各有一段槛墙墙基,宽32厘米,用两列断板瓦在夯土面上直接排列而成。槛墙同延直东西山墙。精藻楼面阔三间,左右次间的开间约与明间同,此外,内柱直到台基北侧保留有完好的铺地砖,楼后不出檐廊。

东侧拦土宽0.7米,拦土以东为湛清华之西建筑,湛清华之西建筑拦土外包砖墙,墙厚0.3米,向精藻楼一侧为磨砖对缝。

精藻楼西北与船坞两回廊及林渊锦镜之间构成一小天井。天井为曲尺形,铺有方砖,其规格35×35厘米,天井北端有排水沟。地平均向沟倾斜,排水沟宽26厘米,深7厘米,船坞回廊一侧有过水通入船坞。

精藻楼南有两阶踏步入楼前小院,一阶与地平,二阶高出14厘米。精藻楼东侧,自湛清华之西建筑的西墙南引围墙,墙宽40厘米,长约10.15米,由25×12×5厘米的小砖错缝砌成。墙两侧有散水。约距精藻楼1.55米处,有过水石作。4.15米处应有院门,宽约1.2米,门已不存。围墙南端隐见一宽约65厘米的夯土基础向西延伸,其上偶见卵石散水。

院内踏步前有卵石花径,南行,距精藻楼5.9米,分为两支,一向西南,至林渊锦镜垂花门前;一向东北经院门,入湛清华前之院落。小径宽约1.25米。

复原:精藻楼在“样式雷”图中已标明位置,三开间,前有檐廊,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吻合。(图五.7)

文献记载“嘉庆元年十二月四日;……附清单,……藻园船坞一座,计十三间,内北七间拆修,挑换金柱、八架梁、随梁枋…其余南六间拆…挑换坞门,归拢雁翅,拆卸

檐墙等……”^①。说明船坞两侧有 13 个开间。考古发掘情况与上述文献和“样式雷”图中所记载基本符合。据此复原,船坞东西各有十三开间。西侧回廊南端有一小廊与林渊锦镜相通。但船坞西侧拦土南数第二个柱顶石不符合 3.5 米的开间位置。若按此柱础实际位置复原,其西侧南数第一、二的开间比例失调。而“样式雷”图中船坞开间均为等距开间。若按等距开间复原,船坞西侧拦土南数第二个柱顶石的位置与通往林渊锦镜小廊的柱顶石位置相冲突。因此,应按此柱础实际位置复原(图五.8)。

7. 溜琴亭及花园

位置:溜琴亭(图四.9)遗迹在藻园遗址南部中段,在湛清华遗迹正南约 10 米处。花园似以溜琴亭为中心,环绕分布。

布局及结构:其遗迹只露出 4 根石柱和一段残墙。推测亭直径约 5 米,边长约 2 米,石柱的横断面略呈梯形,厚约 25 厘米,长约 70 厘米,高约 0.7—1.2 米不等,残留东侧石墙,厚 85 厘米,为碎石砌成,外墙 35 厘米,内墙 50 厘米。

亭四周为假山石堆砌环绕而成的花园,亭西 6 米处,有一墙基遗迹(三合土夯土),亭东 5 米有一道虎皮墙残迹,墙厚 80 厘米,残高 20 厘米,残长 5.9 米,与东侧虎皮墙距 1.7 米。

复原:在“样式雷”图样中,湛清华南侧的假山花园内画有一亭,但未标名。本次考古发掘在这一位置确实揭露出一亭的遗迹,经复原应为八角亭,因此,推测此亭即为溜琴亭(图五.9)。亭四周为假山石堆砌围绕而成的花园。

8. 凝眺楼

位置:凝眺楼(图四.10)遗迹位于藻园的东部,其北偏东为夕佳书屋,北临水池,西与溜琴亭花园一墙之隔。

布局及结构:这里所述凝眺楼遗迹,暂包括凝眺楼以东的两个建筑。凝眺楼北临水池,西为花园,南侧不详,其东西长 9.65

米,南北宽 4.9 米,其建筑构造基础为长方形条石砌筑。石条一般长 1.8—1.9 米,宽 0.8—1.2 米,厚 0.32 米左右,共有两层石条,总厚度为 0.63 米。石条平面之间以铁质“银锭锁”连接。石条构成的平面之上为三合土夯土殿基。残存 65 厘米,其夯土外围包以青砖,砖长 24 厘米,宽 11 厘米,厚 4 厘米。因该建筑北临水池,故在石条基础北侧有 45 厘米左右厚的石料堆积,用以加固该建筑基础。其石条基础东侧北段残存一段砖墙,砖墙紧贴石条基础而砌,墙(砖)宽 21 厘米,砖长 42 厘米,厚 6 厘米。凝眺楼遗迹南侧有楼梯残迹,长 5.7 米,宽 1.6 米,与凝眺楼台基之间有 0.5 米的间距。

凝眺楼东部建筑基础台基南北 6.5 米,东西 7.15 米,其台基由夯土构成。上层夯土厚约 60 厘米,其中,这层夯土又可分为上边 15 厘米厚的白灰三合土,下层为黄土加白灰夯土,周以石墙围挡。

中部建筑基础宽 3 米,东西长 6 米。基础南侧是 0.8 米宽的拦土。

复原:文献记载“嘉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附清单,……凝眺楼一座三间……”^②。“样式雷”图中也已标明,与考古发掘结果相合。据此复原为 3 开间,南侧有廊及楼梯(图五.10)。另外,此遗址东侧还有一建筑,略呈方形,四面有廊,东侧有楼梯,其与凝眺楼之间有走廊相连,若归属为凝眺楼建筑,则与以上文献记载不符,因此,该遗迹名称或归属待考证。

9. 夕佳书屋

位置:夕佳书屋(图四.11)位于藻园东部,其西北为水池,西南为凝眺楼。

布局及结构:该殿遗迹南北残长 10.5 米,东西宽 4 米,高 0.4 米,北侧屋内地表距散水 40 厘米,夯土台面上残存数块铺地方砖,其规格为 34×40 厘米和 40×40 厘米两种。殿址北侧和西侧北段残存部分散水,残宽 47 厘米,最外侧为 5 厘米厚的立卧青砖,内为河卵石构成的散水面。

该遗迹破坏严重,无柱础等建筑构件

出土。台基做法为铺地砖下为 10—15 厘米厚的白灰三合土,其下为黄土加白灰土夯土,外围石块。

复原:夕佳书屋:按“样式雷”图样复原(图五.11),夕佳书屋位于藻园最东边,其西为水池,西南为凝眺楼,面阔三间。考古发掘显示夕佳书屋位置与文献记载吻合,据文献记载“嘉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付清单,……夕佳书屋殿前藤萝架一座,一间……”^③,此藤萝架应在屋前即屋的西侧。

10. 湛清华

位置:湛清华(图四.12)遗迹位于藻园遗址的南部中段,位置其西为精藻楼,南为花园,东北临水池。

布局及结构:这里所说的湛清华遗迹暂包括湛清华西侧的建筑。西部的建筑的西侧与精藻楼仅一墙之隔,因其破坏严重,殿基夯土南北际线残存曲折不清,唯靠近西侧隔墙附近,其殿基南北两侧散水保留较好,据此可推出其南北宽 5 米,东西长 9 米,其散水南北侧散水均宽 45 厘米,其正中开间南侧有一个二级青石踏步,往南是一条石子甬路,路宽 1.15 米,路两侧以卧立青砖护边,在此路往东 2.5 米处又有一条石子甬路在殿前约 3.2 米处相交汇,形成向西通往精藻楼前院的甬道。

湛清华东西长 12.5 米,南北宽 8.6 米,其北侧面临水池,岸边为长条形条石砌成(已破坏,但能分辨出大致边缘),其殿基残存夯土,最上层为三合土夯土,厚 15 厘米,其下为黄土加白灰夯土,厚 28 厘米。

其殿南侧亦有一青石台阶,再南为石子甬路,路宽 1.3 米,在殿前约 2.4 米处分别往东、往西分叉,通向凝眺楼和精藻楼前院。

复原:据清代档案史料记载^④，“嘉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附清单,湛清华一座三间,…”按文献和“样式雷”图样复原,湛清华面阔 3 间,前后有檐廊(图五.12)。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同。但湛清华西侧建筑显然不应属于湛清华,否则与上述文献记载

不符。

11. 湛碧轩

位置:湛碧轩(图四.13)位于船坞东侧,其东南临水池。

布局及结构:湛碧轩西距船坞 2 米,此次考古发掘只揭露出残存建筑基础宽 4 米,残长 5 米。湛碧轩至精藻楼的围墙基础长 6.5 米,宽 0.5 米,墙两侧各有卵石散水宽 0.5 米。这段围墙与精藻楼、湛碧轩及船坞东回廊构成一个半封闭的空间。湛碧轩及围墙之散水较船坞高出约 20 厘米。

复原:湛碧轩:此次发掘只涉及到湛碧轩的部分围墙基础,基本未涉及到湛碧轩主体建筑基础。按“样式雷”图湛碧轩为曲尺形,南北 3 个开间,东西 2 个开间(图五.13)。

这次考古发掘未涉及到的藻园建筑景点遗迹有:镜澜榭,怀新馆,响琴峡,青莲朵,翠照,绮交等 6 个。

12. 镜澜榭

位于藻园东北部,此次发掘未涉及。按“样式雷”图示,镜澜榭在水池中部,东西向,面阔 3 间,前后有廊。

13. 怀新馆

此次发掘未涉及,据“样式雷”图,怀新馆紧临藻园南部园墙,7 个开间。

14. 翠照

此为石刻。位置待考。

15. 绮交

此为石刻。位置待考。

16. 青莲朵

此为石刻。位置待考。

17. 响琴峡

位置不明,待考。

从以上可知,藻园中的建筑遗迹只有

响琴峡没有确定位置,而在湛清华西侧与精藻楼之间有一建筑基础,未能定名。同时,在凝眺楼遗址东侧也有一略呈方形建筑,其与凝眺楼之间有走廊相连,没有定名。在“样式雷”图样上亦画有此二处建筑遗迹,据此推测:前者似为响琴峡,后者之名待考。此论对否,尚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据“样式雷”图样显示,藻园东北角园墙外有两开间、东侧带檐廊的建筑,推测可能为守卫的居所。其南侧有一方形院落,东有两门,西有一门。

三、结论

一般认为圆明园兴建于清康熙年间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当时只是康熙给皇四子胤禛的赐园。胤禛继位,是为雍正皇帝,开始扩建圆明园,随后雍正开始驻蹕听政于圆明园。到乾隆即位时,圆明园四十景中,已完成约三十景,乾隆即位后继续在圆明园内增添新的景区,并在圆明园左右兴建长春园、熙春园、漪春园和春熙院。

(一)关于藻园的文献

藻园是圆明园中的一组园林建筑,偏于圆明园的西南隅。由于藻园不在“圆明四十景”之列,因此,有关藻园的文献资料记载甚少。

目前,已知有关藻园的文献记载主要有:

《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长春仙馆由西南门迤西为藻园,内为旷然堂,五楹,堂后为贮清书屋,旷然堂东池上为夕佳书屋,稍北为镜澜榭,东南楼为凝眺楼,西北为湛碧轩,西南为湛清华轩。…”

《刘敦楨文集(一),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以下简称《文集》)一文记载:“(藻)园在圆明园西南隅,门内为林渊锦镜殿五间,原名旷然堂,庚申劫后犹存。前有院落,周以回廊,后为贮清书屋,殿东有池,池东曰夕佳书屋,池北曰镜澜榭,南曰凝眺楼,再

南曰怀新馆,池西北曰湛碧轩,西南曰湛清华,俱毁”。

以上两种文献是有关藻园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载,其中将藻园的8个主要殿堂建筑名称,大体布局交代清楚。

最重要的文献当属《文集》中刊布的“样式雷”的藻园平面图(图三),这是复原藻园建筑布局最直接、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新近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汇的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一书也汇集一些与藻园有关的修缮奏折、清单以及事迹。

另据《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册所刊“圆明园匾额清单”一文可知,藻园有以下建筑匾额:藻园(外檐),林渊锦镜(内檐),贮清书屋(外檐),自远轩(外檐),履吉斋(内檐),粹藻楼(外檐),湛清华(外檐),镜澜榭(外檐),夕佳书屋(外檐),凝眺楼(外檐),怀新馆(外檐),湛碧轩(外檐),溜琴亭(外檐),响琴峡(外檐),临众芳(外檐)。青莲朵(石刻),翠照(石刻),绮交(石刻)。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三、四号所刊金勋先生编写的“圆明园四园详细地名表”一文亦叙录了同样的景点建筑名称。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藻园内建筑、景物名称共有十七个,其中有三项为石刻。而林渊锦镜殿(旷然堂)、贮清书屋、夕佳书屋、镜澜榭、凝眺楼、怀新馆、湛碧轩、湛清华、精藻楼、船坞等10座建筑,均可知其具体位置和结构。自远轩、履吉斋、溜琴亭、临众芳、响琴峡的位置均为结合发掘结果推测而来。其正确与否,有待方家指正。

(二)关于藻园的建、毁、修缮年代

1 建立的年代

目前,有关圆明园论述的文章以及文献资料均未提及藻园的确切建成年代。乾隆初年,圆明园四十景已完成三十景以上,而藻园属圆明园后续营建的景点之列,即

应建于圆明四十景之后,因此,藻园建筑年代应在乾隆年间。

现已知有关藻园最早的记载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十五年,清高宗写的湛清华轩、镜澜榭、夕佳书屋、湛碧轩、怀新馆诗。这组建筑基本都是围绕东部水池而建,属藻园内的东路建筑群。其次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写的履吉斋、贮清书屋、旷然堂、溜琴亭、自远轩、萃藻楼御制诗。再次,在《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十的“贮清书屋”、“自远轩”、“溜琴亭”的匾额悬挂处所为“藻园新宫”。这三组建筑均在藻园西路。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 藻园应建于17世纪中叶。2. 藻园东路水池周围的建筑年代似应略早于西路。

2. 毁弃的年代

关于藻园毁弃的年代目前尚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据咸丰十年(1860)十月内务大臣明善奏折:“圆明园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五、初六、十一日为夷人焚烧抢劫,……山高水长均于八月二十三日焚烧……”^⑤在圆明园内山高水长、藻园都属于圆明园西路建筑群,两者相距也比较近;同时,藻园位于圆明园西南角靠近路边,又是从圆明园通向清漪园、静宜园的必经之路,而清漪园、静宜园同期亦遭焚毁,因此,藻园应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

又据《文集》一文记载:“(藻)园在圆明园西南隅,门内为林渊锦镜殿,五间,庚申劫后犹存……”据此可知,劫后的藻园仍有部分建筑残留,这其中就包括林渊锦镜殿。

3. 修缮的时间

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劫毁后,清朝统治者一直想恢复重建。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令修复圆明园,其中包括藻园。据1874年(同治十三年)9月9日上谕载“截至此时,原拟修复之殿宇,仅圆明园殿…藻园…等处进行修缮外,其他多半仍在清理

渣土”。^⑥由此可知,藻园在同治时期进行过修复,修复范围、规模不详。后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十分窘困,清政府财力枯竭,不得不将圆明园修复工程停工,但一直未停止小规模的建筑或粘修。

又据文献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后皇上(慈禧、光绪)驾幸圆明园,进藻园门,至中路慎德堂少坐……”^⑦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慈禧、光绪等至圆明园,进藻园门至后湖,……四月,拟定修理…藻园门等处活计,计钱粮,做法单。”^⑧从此可知,清末统治者多次到圆明园游玩,一直不甘心放弃修复此园。

虽然藻园在圆明园中偏于一隅,但其所在位置较为重要。它是连接圆明园与清漪园、静宜园的必由之路。大量文献记载乾隆从圆明园去清漪园、静宜园,多半经过藻园出入,据清代档案史料“乾隆二十一年穿戴档”记载:

四月初八日:…(乾隆)出西南门,…进藻园门…

四月十九日:…(乾隆)进藻园门内乘船至汇芳书屋…

四月二十日:…(乾隆)乘四人亮轿出藻园门,至静明园游行毕…

四月二十三日:…(乾隆)乘四人亮轿出藻园门,至静明园拈香毕…乘四人亮轿进藻园门内游行毕…

四月二十五日:…(乾隆)进藻园门至九州清宴少坐。

五月初二日:(乾隆)仍乘轿出大西门,至万寿山…进藻园门内乘船至慎修思永。

五月初九日:…(乾隆)乘四人亮轿出闸口门,至万寿山…仍乘轿进藻园门…^⑨

藻园作为圆明园西南角出入的园门而建筑,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南北、东西向均有近一百米,其中斋、堂、亭、轩、楼、馆、榭俱全,假山、水池点缀其间,空间收放有序,实为园林佳作,由此亦可窥见当时圆明之盛。因此,这次为配合基建工程而进行的发掘,对于藻园乃至圆明园的建筑布局、园林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399页。

②③④《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374页。

⑤《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1676页。

⑥《圆明园资料集》第380页。

⑦北京图书馆藏《雷氏旨意档》。

⑧《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1678页。

⑨《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第844、850、851、852、855、856、859页。

发掘：王武钰、王策、程利、周宇、王有泉

绘图：王策、王有泉

描图：王有泉

照相：祁庆国、王有泉

执笔：王有泉

圆明园全景（自西向东拍摄）

北平和平接管 史略

季 华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并且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历经整整50年岁月的沧桑巨变。

本文就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平的和平接管问题作简略历史回顾。

一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挥师入关与华北解放军会合,对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队实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傅作义部南逃西窜的道路,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平、天津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为了准备接管即将解放的北平,1948年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包围北平及对平津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报中,指派了北平市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①。电报还命令彭真、叶剑英、聂荣臻等立即率干部由河北平山向北平附近前进。12月14日,彭真等人遵令率领部分接

管人员从石家庄向北平进发,16日到达保定。12月17日,彭真等在保定召开了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经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批准的北平市领导机构和组成人员:中共北平市委由彭真(任书记)、叶剑英(任第一副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任第二副书记)、刘红、徐冰、赵毅敏、谭政文、萧明、王鹤峰、张秀岩、韩均等十一人组成。叶剑英兼任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徐冰为副市长。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北平市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和人选,入城后的若干思想问题,入城初期的几项具体任务,入城工作人员应遵守的纪律,确保党和军队的传统作风,以及对外人企业和私人银号钱庄、私人报纸的政策等问题。12月18日,中共北平市委又在涿县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除继续讨论第一次会议提出的议题外,还具体讨论了金融、报纸问题。接着于19日召集了市委和军管会系统部处以上50余人参加的干部会,当日晚又召集了有1100人参加的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了市委两次会议精神,宣布了市军管会的任务、组织和当前工作。20日晨,彭真等率领的1100名接管干部到达长辛店,次日又退回良乡。在这里,根据市委两次会议精神写成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



北平守军撤出城外,接收改编。

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②),在党内公布。22日,彭真等将入城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向中共中央及华北局作了报告。1949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市委又就入城后首要工作任务、接管中的几个方针和政策问题作出了决定。这两次市委会议和《通告》等文件,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方面,为接管北平作了充分准备。1月18日,北平市委迁至北平西郊青龙桥办公,北平和平解放后,于2月3日又迁至城内东交民巷原德国驻华大使馆内办公。

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对接管北平的方针曾多次作出指示。首先,中共中央于1948年11月15日专门发出指示^③,认为在新收复的大城市必须实行军事管制,明确了军事管制期间应达到的目的,并大体规定了军事管制时间。同年12月13日,华北局对平津地下党在接管城市中应做的工作也作出指示,指示对平津解放前后所应完成的任务,党的地下组织为接管城市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工作、组织准备和工作方法等问题,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及华北局的指示精神,借鉴沈阳“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经验^④,结合北平城市实际,在两次市委会议上和《通告》中,全面制定了接管北平的

方针、任务和具体政策。《通告》提出,北平解放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北平市及市郊工业区在军事时期内统一的军政权力机关,以实行军事时期的革命管制。《通告》提出了军管初期的4项中心任务:(1)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2)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即自上而下地、系统地、原封不动地加以接收与管制,然后再统一地有分别、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处理;(3)肃清反革命残余,首先是肃清潜伏的武装敌人和摧毁敌特组织;(4)动员公私力量,

向城市输送煤粮等主要必需品,保证对城市人民的及时供应。《通告》强调必须完全严格遵守中央历来规定的城市的各项政策,包括:对于一般机关部门和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如何接管,对于外国领事馆、外交人员、外国新闻记者的待遇,对于官僚资本的没收,对于私营银行、钱庄和当铺的处理,对于伪金元券的兑换,对于一切公私员工的薪资,对于私营广播电台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规定。首先,对于国民党反动的国家机构,包括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必须彻底地予以粉碎,重新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机构。但是,应该区别国家机构与企业机构,采取不同对策。第二,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明确树立为人民服务 and 建设新民主主义城市的思想。接管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发动群众,配合自上而下的行政接管。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为骨干,并依靠其他劳动人民、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要与地下党同志搞好团结,注意新老干部的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第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作风,反对和防止剥削阶级虚伪堕落作风的影响。

1949年1月19日,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和傅作义军队华北总部代表签订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后,对北平采取和平接管的方式也就确定

了下来,接管中必须粉碎敌人统治机构的总方针不变,但接管的若干方法、步骤要稍加改变。这主要是:通过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处和由北平市军管会派军事代表与联络员的方式,采取更加稳健的步骤进行接管。因此,中共北平市委在良乡集结的大批准备接管的干部,一开始只派各接管部的负责人和精干的军事代表联络员进城接管,其余大批接管人员在以后再陆续进入市内,以逐渐取代旧人员,实现完全接管。

二

1948年12月18日,在河北涿县召开的中共北平市委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在这以后,市军管会事实上已经在内部建立起来,开始了接管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拟定了组织条例,确定了机构设置,配备了各部处干部。12月21日党内公布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的通告》中,宣告在进入北平后立即成立市军管会,公布了由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决定的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员名单,提出了军管初期各项中心任务和政策。

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郊区正式公告成立。由叶剑英主任发布的第一号布告称:“北平将告解放,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持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北平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区域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并任命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⑤

与此同时,《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⑥亦公布施行。《条例》规定市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1)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肃清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军火武器和其他



北平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

违禁品,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2)接收并管理一切公共机关、公共产业、公共物资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并没收应没收的官僚资本;(3)保障一切中国人民及守法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工农商各界一切正当权利,迅速恢复市政建设事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4)动员一切公私力量沟通和建立城乡经济的正常关系,特别是指导和组织公私各种力量解决城乡人民的粮食、燃料的供应;(5)发动和组织革命群众团体,帮助建立系统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条例》规定了市军管会应设置的机构,以及它们的职责范围和具体任务。主要有:(1)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负责肃清一切反革命武装及散兵游勇,执行军纪、军法及戒严、解严等事项,并有效地组织防空。(2)市政府:负责市区内民政、公安、司法、交通、卫生、消防等一

切市政建设,管理市区内工农商学各业,管理财务、贸易、金融及有关外国侨民诸事项。(3)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并处理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负责组织动员一切公私力量,指导对城市粮食、燃料等供应事项,沟通城乡关系。按照工作需要设置财经部、交通部、卫生部、军政部、房地产部。(4)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按照工作需要设置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5)在秘书长领导下设秘书处、供给部、行政处,负责处理本会对内外一切有关日常工作及联络、供应等事宜。

北平市军管会正式公告成立以后,又于1月15日发出通知,宣布成立五个分会,即西北区分会(青龙桥)、西南区分会(长辛店)、东南区分会(黄村)、东北区分会(通州)和丰台区分会。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市军管会利用在良乡建立组织机构,等待入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紧对接管干部进行教育训练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军管会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自2月2日起移入城内办公。同日,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公告成立,在市军管会领导下执行警备任务,由程子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为副司令员,莫文骅为副政治委员。

在北平市军管会建立的同时,北平市人民政府亦同时成立。1949年1月1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在郊区正式成立。北平和平解放后,市人民政府亦于2月2日移入城内办公。

三

北平的解放具有特殊性,市郊是用战



叶剑英在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讲话。

争方式解放的,而市区则是用和平方式解放的。因此,北平的军事接管实际上兼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性质,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和平接管。

北平和平解放后,以和平方式对全市进行了军事接管。根据北平市和平解放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派遣军代表,通过联合办事处,按系统自上而下地进行接管的方法。其基本做法是:

第一、按系统自上而下地接管。所谓按系统就是按国民党原来系统来组织接管系统。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协助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了北平国民党各系统及各下属单位,建立了与之大致相对应的接管机构,并配备了解情况和熟悉业务的干部。市军管会下设市政府、物资接管委员会和文化接管委员会三大接管系统,在它们的下面又设置许多具体的接管部、处。

第二,实行军事代表制。进城前就确定了一批素质较好的干部充任由市军管会派遣的军事代表,以及协助其工作的联络员。

第三,发挥北平联合办事处的作用。在北平接管过程中一个新特点是:充分利用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和傅作义“华北总部”代表在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中关于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处的规定,通过成立的“联合办事处”,介绍到各接

收对象单位主管人员,责成其负责移交。

第四,根据接管对象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接管方法。首先,对于敌军政机关的接管采取打碎方针,粉碎旧机构旧制度,将权力完全控制在手。其次,对于一般经济部门企业单位,甚至某些行政工作部门则注意不打乱系统,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实行军事监督制。

第五,充分依靠地下党和进步群众。无论在交接和清点中,或是对旧人员的处理中,都必须依靠地下党,团结广大工人、职员、学生及一切进步力量,发动他们参加工作,提出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给以教育。

第六,恰当处理旧人员的去留。1949年3月10日,市军管会专门作了指示,要求各接管单位应根据旧人员的政治条件,工作能力及接管工作的需要,对他们加以适当处理。194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对北平市作出专门指示:对于旧职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⑦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北平市军管会专门成立了人事处理委员会,制定了处理原则,对旧人员进行了适当处理。总的说来,除少数坚决反动分子、劣迹昭著分子,不愿改过的破坏分子和不可救药分子被清洗或开除者外,一般旧人员采取了团结、改造和使用的方针,从而团结了大多数,对企业生产和机关工作是有利的。

第七,接与管并重,接管与建设相结合。北平市军管会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北平市委关于边接管边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指示,尽一切可能迅速复工,使生产不中断。具体作法上分四种不同类型提出不同要求:(1)对军政机关须加以粉碎,然后尽快从事恢复和建设工作;(2)对企业性、技术性机关(如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部门、银行、邮政电讯部分等)接了以后要立即管起来进行建设;(3)对仓库等物资较多的单位,接了以后没有业务的,但须加以保管、疏散或

调拨;(4)各地流亡机关,接后加以遣散,也就完了。北平市在接与管关系的处理上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好效果。全市接管工作,除去进城前的准备阶段,实际接管工作从1月31日进城开始到4月底基本完成,历时约三个月。各系统接管工作的概况是:

对旧政权机关的接管:首先是对旧市府的接管。2月3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和副市长徐冰召集旧市府人员讲话,宣布方针政策,对各局处均以军代表名义实行接管,并利用原机关人员工作。接着,对旧市府附属单位和各区进行了接管。共接收的市府人员(法院和各区在外)5121人。对北平市警察局的接管早就开始准备,1948年12月17日在河北保定成立了北平市公安局。1949年1月31日,新成立的公安局全体人员随军入城。2月2日,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任命了新的公安局长。当时由于接管人员力量不足,采取军代表制,设立公安军事代表办事处,代表局长督导工作,暂时利用旧机构、旧人员维持局内工作和社会秩序。2月17日,旧北平市警察局各单位和各分局都已正式接管,停止军事代表制,宣布了公安局新的组织机构和主要干部名单。对在北平的旧司法机构的接管是从2月6日开始的,市军管代表召集伪法院、检察、看守、监狱等机构的九个单位人员讲话,自即日起停止行使职权办理交接。自华北人民政府来平后,市军管会决定:伪省以上司法机关由华北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接收,市范围者由北平市人民法院接收。为了统一步调和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采取华北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统一领导、干部集中使用的合接分管办法。伪司法机构的接管工作到3月底大体完成。

对财经物资机构的接管:市物资接管委员会的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到4月16日大体完成。实际接管单位865人,人员8万余人,接管了大批贵重物资和科技人才。

对文化机构的接管:市文化接管委员会于2月2日开始接管工作,到3月份基本完成,共接管61个单位,员工2.3万余人。

其中,属教育部门的有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等 17 个单位,属文物部门的有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 6 个单位,属文艺部门的有中央第三电影制片厂、四维剧校等 17 个单位,属新闻出版部门的有《华北日报》、中央社北平分社等 21 个单位。在上述接管的单位中,有一部分是流平的学校和机关,对它们处理的原则是一律迁返原地。其中东北和河北的八所院校的教职员生工警眷属 9704 人均返回东北和保定。在接管时适逢南下工作团和三年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招生,到 3 月中旬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报名学生总数即达 5668 人。

总起来看,通过北平市的军事管制的初步工作,即接管了敌人的物质文化遗产,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人民生活等。到 4 月底接管工作大致完成,全市工作重心逐渐从军管会转到市政府方面来。

①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上接 68 页)等州步骑兵十万,声言三十万,南攻魏博。军至贝州,纵兵杀戮,清河都被尸体壅塞不流。时朝廷衰微,军阀混战,刘仁恭更是肆无忌惮,气焰嚣张,不奉朝命。此后,刘仁恭又与朱全忠争夺河北。天祐三年(906 年),朱全忠攻沧州,刘仁恭悉发幽州 15 至 70 岁的男子为兵,不论贵贱,皆在其面部刺上“定霸都”三个墨字,士人则在臂上刺字“一心事主”,一时间里为空,得众 20 万。他一方面穷兵黩武,一方面纵情享乐。筑宫室于大安山(在今房山境内),掠民女置其中。以胶泥造钱,敛民间真钱,凿山洞而藏之,然后杀工匠灭口。又招浮屠讲佛法,从方士学长命之术。

907 年其子刘守光围攻大安山宫室,获乃父而囚之,自立为节度使。刘守光之残暴荒淫,更甚其父。他十分残忍,人有过犯者,以铁笼盛之,四周燃火燎烧,用铁刷剔其皮肉至死。后梁乾化元年(911 年)八月,刘守光在幽州称帝,国号大燕。即位之日,

1993 年版,第 5 卷第 397 页。

② 载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35 页。

③ 即《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1948 年 11 月 15 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7—488 页。

④ 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陈云文选》(1926—1949)第 269 页。

⑤ 载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4 页。

⑥ 上书,第 84—87 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更正

《北京文博》1998 年第四期,第 78 页,注释①“曹子西:‘南京道的概况和契丹对幽燕地区的管理’《北京通史》卷三,31 页。”应为“王玲:‘南京道的概况和契丹对幽燕地区的管理’,……”。

契丹陷平州,幽州大惊。次年契丹攻幽州,大掠城郊而去。913 年,太原李存勖亲征幽州,擒刘氏父子,结束了其在幽州的黑暗统治。自此至 936 年后晋石敬瑭将幽州割让给契丹,它都在太原李氏势力(李氏于 923 年建立后唐)控制之下。

藩镇割据对统一国家及其中央政权来说绝非好事,但幽州由于其地处东北前沿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它自身生存而抗御北方强族入侵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起着屏蔽中原的作用。须知,自高宗、武则天时起,随着西北诸族逐渐衰落西迁与东北诸族崛起,东北方向日益取代西北,成为唐王朝的主要外部威胁所在。因此,对藩镇时期幽州屏蔽中原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重视和恰当评价。至于割据给幽州当地造成的影响,也应该具体分析,因为割据是军事寡头统治,不受国家法律、中央政令约束,统治者的个人因素就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半个世纪的回忆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一次秘密活动

周士琦

1988年秋，著名画家侯一民给我寄来一信，信中说：40年前共同学习的战友现都面临离休，有的身体多病，有的白发苍苍，

……愿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依然少年”。

随信寄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通知）“现将中共中央组织部（88）干审字 1099 号文件转给你们，请遵此执行。”

“……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即1947至1948年根据原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的指示，建立的‘进步艺术青年联盟’……等19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可视为与‘民青’、‘民联’同一性质的组织，凡当地解放前参加上述组织的正式成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这些组织之日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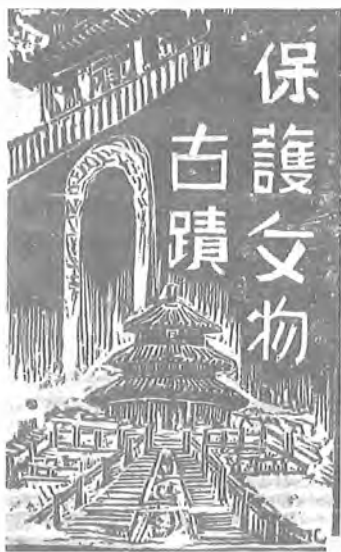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是1947年考入北平国立艺专，1948年学校迁到帅府园上课，学生课外活动很多，民主气氛十分活跃。

194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油画三年级教室，我和同学朱德埙在侯一民的主持下，举手宣誓加入“进步艺术青年联盟”，正式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保护学校的活动。记得在很小的纸片上画出学校的平面图，为解放北平做准备。

1949年1月，一天下午张信让通知我下课后到大佛寺叶浅予老师家，我们带上木板和木刻刀悄悄离开学校。叶先生的女儿给我们开了门，当时王育中也去了，他还负责到几位老师董希文、李桦、周令钊的家里取画稿。我们三人就在餐厅里开始刻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的木刻。

晚上同叶先生、戴爱莲老师一起进餐，同桌还有瞿希贤先生，他们同住一院，瞿希贤是音乐系老师。我们刻至半夜时，叶先生还拿出蜜供招待我们，我们三人一夜共刻了五块木刻，其中“废除伪法院”、“废除伪宪法”是叶浅予先生画的墨稿，由我来刻的，其他三幅是“打倒蒋介石”、“保护文物古迹”、“严惩阴谋破坏分子”。早晨离开叶浅予先生家来到外面时，解放军已出现在大街上了。



此时学校环境开始好转,更多的同学参加到木刻活动中来,他们都集中在男三宿舍,继续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宣传。

我参加这次活动,一是在 1948 年暑假,王育中和我在北大参加李桦先生办的木刻学习班,已初步掌握了一些木刻技法,二是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回校后我和宋广训接受了新的任务,我俩到校门口,等候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人。来人左手腕系白手帕,对上暗语后,即将来访者带到二楼的一个教室,任务就完成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仁才同志将他收藏的几幅木刻在建党 75 周年之际捐赠给革命博物馆收藏。我们同在一室工作,在此之前,他不知道在其藏品中有我刻的木刻作品,我也不知道我当年刻的木刻收藏在他那里,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李仁才在捐赠前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如李桦先生在回信中说:“我是参加刻传单者,不是组织者,当时地下活动是秘密的,参加也不能知底细,只按组织者的要求完成任务……革命博物馆保有这些革命资料,是很有意义的。”

瞿希贤先生在回信中讲:“解放前叶浅予和我住在大佛寺 49 号,那不是艺专宿舍,是私人住宅。解放前我是艺专音乐系教师,和叶浅予是朋友,住一个院子,那时为了迎接解放,我和他联合起来做了些工作。那时我虽是地下党员,但因组织关系未从上海转来,只能自发的做些工作……所云印木刻之事,可能和叶浅予关系更密切些。”

张信让给李仁才的信中说:“你提到临解放前夕,地下党为迎接解放刻制的一批木刻传单之事,你保存有一套拟捐给革命博物馆这是很有意义的。……当时这批传单画稿主要是王育中从董希文等先生处取来,我们秘密刻制,但当时又不能多人参加……印象中是周士琦参加。”

我们的几位老师,木刻画稿的作者,董希文、李桦、叶浅予都已去世,周令钊先生健在,已达八十高龄。王育中 1951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已患病多年,对这段历史记忆不清了。张信让毕业后到广州美院任校长,也年逾七十。

1999 年,正值北平和平解放 50 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思绪万千。这几张木刻传单现已成为文物,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加显出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

藩镇统治下的幽州

何 力

历时七年多(755年末至763年春)的“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又遭藩镇割据之害。“安史之乱”使唐中央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吐蕃势力又乘机从西面频频向唐发起进攻,唐廷对彻底肃清河北安史余部心有余而力不足,便采取绥靖政策,以安、史降将为河北诸镇节度使,致使河北地区很快形成藩镇割据之势,经过一番争夺兼并,割据势力最终演化为幽州、魏博、成德三镇鼎立的局面。幽州居北,控制着幽、涿、妫、檀、蓟、平、营、莫、瀛等州;成德居中,辖有镇、冀、易、定、深、赵等州;魏博居南,统领魏、博、相、卫、洺、贝等州。三镇之中,以幽州地域最广,兵源、财力雄厚,加之地理位置优越,又与成德、魏博二镇相呼应,朝廷最难攻讨,遂称雄河北,为三镇之首。朱滔任幽镇节度使时被推为三镇盟长,魏博、成德唯其马首是瞻。幽州割据势力在抗拒朝廷的同时,还时有觊觎魏博,成德二镇,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之意。但总的说来,在朝廷随时可能发兵攻讨的现实威胁下,三镇联合抗拒朝廷时多,自相攻战时少,和衷共济是主,相互磨擦是次。

失去对幽州及整个河北地区的控制,使唐廷在人口、土地、财赋上遭受很大损

失,同时它还不得不调集相当大的军事力量防范来自三镇的威胁,这对元气大伤的朝廷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幽州的割据在给唐廷带来损害的同时,并非对之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幽州割据势力为了自身生存,必须竭力抵御来自北方、东北方的诸族侵扰,从这个意义上说,幽州一如既往,仍起着屏蔽中原的作用,并且不费朝廷一兵一饷。长安政权也意识到这一点。《旧唐书》卷180《杨志诚传》载:太和五年(831年),幽州节度使李载义为部将杨志诚所逐,“文宗闻之惊,急召宰相。时牛僧孺先至,上谓之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上良久曰:‘卿以为不足忧,何也?’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幽州亦称范阳)得失系国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陛下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上大喜。”

藩镇统治下的幽州情况到底如何?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其间统治该地的诸节帅。从“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起,至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最后一位幽

帅刘守光被推翻止,150年中共换了28个统治者。

李怀仙:柳城胡人,安、史降将。原为安、史留守幽州,归降后,朝廷任命他为幽州节度使。代宗广德元年正月至大历三年六月(763—768年)在任。

朱希彩:李怀仙部将,原任兵马使。大历三年六月杀李怀仙自立。大历三年六月至大历七年七月(768—772年)在任。

朱泚:幽州昌平人,朱希彩麾下经略副使。大历七年七月部将李瑗杀朱希彩,军中拥立朱泚。大历七年七月至大历九年九月(772—774年)在任。

朱滔:幽州昌平人,朱泚之弟。大历九年九月朱泚入朝,奏请以其弟代领幽州。大历十年正月至德宗贞元元年六月(775—785年)在任。

刘怱:幽州昌平人,朱滔部将。原任涿州刺史,贞元元年朱滔病亡,遗命刘怱领节度职。贞元元年六至九月(785年)在任。

刘济:幽州昌平人,刘怱之子。贞元元年九月刘怱病重,以刘济代任,病故后,济乃为节度使。贞元元年九月至宪宗元和五年七月(785—810年)在任。

刘总:幽州昌平人,刘济之子。宪宗元和五年七月毒杀其父自立。元和五年七月至穆宗长庆元年三月(810—821年)在任。

张弘靖:长庆元年三月刘总献幽州,自己则落发为僧。朝廷派大臣张弘靖入幽州,做节度使,幽州暂时归属朝廷。长庆元年四月至七月在任。

朱克融:幽州昌平人,朱滔之孙。长庆元年七月幽州军乱,囚张弘靖。军中拥立朱滔之子朱泚,泚以年高,令军人立其子克融为节度。朝廷复失幽州。长庆元年七月至敬宗宝历二年五月(821—826年)在任。

朱延嗣:幽州昌平人,朱克融次子。宝历二年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军中立朱延嗣为节度使。宝历二年五月至九月(826年)在任。

李载义(又作李再义):朱克融麾下都知兵马使,宝历二年九月杀延嗣自立。宝

历二年九月至文宗太和五年正月(826—831年)在任。

杨志诚:李载义麾下副兵马使。太和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拥立杨志诚,载义入朝。太和五年正月至八年十月(831—834年)在任。

史元忠:杨志诚麾下兵马使。太和八年十月,幽州军逐杨志诚,推史元忠为帅。太和八年十月至武宗会昌元年九月(834—841年)在任。

陈行泰:史元忠牙将。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杀史元忠,推陈行泰为帅。会昌元年九月至闰九月(841年)在任。

张绛:幽州军将。会昌元年闰九月,幽州军再乱,立张绛为帅。会昌元年闰九月至十月(841年)在任。

张仲武:幽州人,幽州雄武军使。会昌元年率本军讨张绛,绛败,乃为幽州节度。会昌元年十月至宣宗大中三年四月(841—849年)在任。

张方直:幽州人,张仲武之子。宣宗大中三年四月,张仲武病故,军中立其子直方为帅。大中三年四月至十一月(849年)在任。

周继:幽州牙将。大中三年十一月,幽州军将作乱,张直方被逼举族逃往京师,军人推立周继为帅。大中三年十一月至四年八月(849—850年)在任。

张允伸:幽州人,周继麾下都知兵马使。大中四年八月周继亡故,军中立之为节度。大中四年八月至懿宗咸通十三年正月(850—872年)在任。

张简会:幽州人,张允伸之子。咸通十三年正月,张允伸病重,以其子简会代领节度。咸通十三年正月至三月(872年)在任。

张公素:幽州人,张允伸麾下平州刺史。咸通十三年二月张允伸病故,他率本州兵赴幽州奔丧,张简会惊惧,逃往京师,遂为节度。咸通十三年二月至僖宗乾符二年六月(872—875年)在任。

李茂勋:回鹘阿布思族。张仲武镇幽州时归降,为幽州军将。乾符二年六月,率

军逐张公素入朝,自立为帅。乾符二年六月至三年三月(875—876年)在任。

李可举:回鹘阿布思族,李茂勋之子。乾符三年三月,受父命继任节度使。乾符三年三月至光启元年六月(876—885年)在任。

李全忠:幽州人,李可举麾下大将。光启元年六月,他率本部袭幽州,李可举举族自焚,全忠遂自立。光启元年六月至二年八月(885—886年)在任。

李匡威:幽州人,李全忠之子。光启二年八月李全忠死,匡威袭父位。光启二年八月至昭宗景福二年三月(886—893年)在位。

李匡筹:幽州人,李全忠之子。昭宗景福二年三月,李匡筹逐其兄匡威自立。景福二年三月至乾宁元年十二月(893—894年)在任。

刘仁恭:河北深州人,李全忠部将。李匡筹夺兄位后,投奔太原李克用。昭宗乾宁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攻克幽州,李匡筹死。次年二月,李克用以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回师太原。乾宁二年二月至后梁开平元年四月(895—907年)在任。

刘守光:刘仁恭之子。后梁开平元年四月,刘守光囚其父,自为节度。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太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克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自此至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割让幽州与契丹国,幽州都在太原李氏控制下。刘守光于后梁开平元年四月至乾化三年十一月(907—913年)在任。

以上28个节度使中,除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因刘总献幽州,朝廷得派大臣张弘靖入幽州为节度使外(在任仅三个月便被军人推翻),其余27节度皆本镇自立,长安政权所能做的,只是事后加以承认,授之节钺与节度使名号而已。节帅更迭的方式,或父子兄弟相传,或军人以兵变拥立。几乎每一次更迭,都伴随着暴力、杀戮与混乱,给社会和百姓带来灾难。这种更迭十分频繁,150年中换了28个统治者,平均每

五年多更换一次。其任期最长者为刘济25年,最短者为陈行泰、张绛、张简会,仅一个月。其余则任期数月的有7人,两年以内有5人,3至5年有6人,6至9年5人,10年以上5人(朱滔10年,刘总11年,刘仁恭12年,张允伸23年,刘济25年)。按家族划分,朱氏(朱泚、朱滔兄弟、朱克融、朱延嗣父子)共统治了18年;刘氏祖孙三代(刘怵、刘济、刘总)统治36年;张仲武、张直方父子9年;张允伸、张简会父子23年;回鹘李茂勋、李可举父子10年;李全忠、李匡威、匡筹父子10年;刘仁恭、刘守光父子19年;以上7家共统治幽州125年。最频繁的人事更迭发生在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一年中换了4个统治者(史元忠、陈行泰、张绛、张仲武)。藩镇统治下,如此频繁地更换统治者,带来的是不稳定,是破坏与灾难。

尽管分裂割据给幽州地区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因素(诸如:割据使幽州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与长安中心地区的交流受到阻碍;某些节度使的野蛮统治给本地区带来的破坏;节帅频繁更迭造成的混乱;与朝廷及其它割据势力间不断征战所带来的灾难等),长达150年的藩镇统治,对幽州地区的自身发展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割据势力的生存,是以军力、财力等实力为基础的。只破坏而不治理,只消耗而不补充,只维持而不发展,是难以生存或根本无法生存的。对幽州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它除了要对付来自中央政权和其它藩镇的威胁,还要抵御境外强族的侵扰,比别人更多了一重生存危机。幽州的割据者,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努力维护和发展本地区各方面的实力,特别是当政者比较开明以及在任时间较长时,更是这样。所以,在藩镇统治下,幽州地区既有破坏,也有发展,并非一无是处。下面就将这段历史择要述之。

李怀仙是藩镇幽州第一帅、开创者。在其统治期间,招还散亡的安、史旧部,筑城邑,缮甲兵,扩充军队,至劲卒数万。他自己任命文官武将,赋税不入朝廷,天子不

能制。

朱希彩杀李怀仙后,自称节度留守,只待朝廷予以承认。唐廷以黄门侍郎、周平章事王缙为幽州节度使,往幽州上任,授朱氏节度副使之职。朱希彩闻王缙至,盛陈甲兵以迎之。王缙见势知其终不可制,劳军一番便返回长安。

朱泚、朱滔兄弟统治时期,是极不安宁的时期。特别是在朱滔统治的后几年中,不断对朝廷用兵,搞得兵连祸结,使幽州、河北和中原广大地区深受其害。朱滔狡诈多变。德宗建中初年,他与成德、魏博二镇连兵对抗朝廷,长安发兵讨魏博田悦,朱滔率兵救援,军中有不从者,被他杀掉二百人,全军震慑。建中三年(782年),朱滔与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纳等割据势力,效法列国连横抗秦,结盟称王。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为魏王,李纳为齐王,共推朱滔为盟主,朱滔自称“孤”,其余三王称“寡人”。朱滔遂改幽州为范阳府,居室皆称殿,妻称妃,子为国公,属下皆称臣,呼朱滔为殿下。朱滔还伪署文武百官。及建中四年朱泚反于长安,称大秦皇帝,朱滔与之相呼应,传檄诸道称:“今发突骑四十万走洛阳,与皇帝(指朱泚)会上阳宫。”他又乞兵于回纥(即回鹘),后者出兵三千。回纥兵过幽州,朱滔对之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玉帛子女,计可得也。”他以步骑兵五万、战车千乘,私属家兵万余、回纥兵三千、共六万三千众,杀奔东都洛阳。不久,朱泚平,朱滔亦败还幽州,从此一病不起,委政刘怱,贞元元年(785年)病亡,时年42岁。

刘怱、刘济、刘总父子三人统治幽州共35年,其间幽州得到较好治理。刘怱在朱滔手下官至威武军使。他广垦田、节用度,政绩颇著。他曾致书朱滔,劝其勿叛朝廷,后者不用其言,终致败亡。刘济任节度使时,数平边患,使本地区边防巩固,社会安宁。德宗贞元中,北方强族乌桓、鲜卑屡犯边境,刘济率军抵御,将其击退,并乘胜追击,深入千余里,东北晏然。其后奚族又侵

掠檀、蓟二州北境,刘济率军再破之。刘济在任20余年,对朝廷恭顺,对内则注意治理,亦有政绩。后为次子刘总所杀,时年54岁。宪宗元和中(806—820年),朝廷先后平定了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魏博、成德二镇亦相继归附。刘总忧惧,谋自安之计,又因杀父兄而夺位,心怀愧惧,遂于穆宗长庆初,以幽州之地归国,请朝廷派节度使统领,自己则落发为僧,乘夜离去,军中不知,行至易州而亡。

刘总之后,相继有朱克融、李载义、杨志诚、史元忠、陈行泰、张绛为帅。张绛之后,为张仲武。张仲武是幽州人,少学《左氏春秋》,长大后投笔从戎,为蓟北威武军使。武宗会昌初年,张绛杀陈行泰,令三军上表朝廷,请准许以之为节度使,朝廷以为张仲武忠顺,乃命他为节度使。不久,回纥宰相赤心率部众七千帐数万人进逼幽州,张仲武派其弟领精兵三万人御敌,大败之,先后俘获其王公贵族千余人,部众三万多。朝廷加封他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宣宗大中初年,又击败来犯的奚部落。史称张仲武“威加北狄,边鄙安宁。”张仲武在任8年,御外治内,功绩卓著。

继张仲武之后,在任时间更长的张允伸也是幽州人,其曾祖父做过境内之檀州刺史,祖与父都在幽州军中供职。他当了幽州节度使后,对朝廷亦较恭顺。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徐州军人叛乱,张允伸请求以幽州兵马为朝廷伐叛,朝廷婉言谢绝,张乃进献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懿宗下诏嘉奖之。张允伸在任23年,亦颇见政绩。史书称其“领镇凡二十三年,克勤克俭,比岁丰登,边鄙无虞,军民以安。至今谈者美之。”

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的19年,是藩镇割据该地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为政不仁,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害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刘仁恭得幽州后,野心勃勃,一心想扩大势力范围,乃广为募兵。昭宗光化初(899年),夺沧、景、德三州之地。又图河北,悉发幽、沧(下转第62页)

万寿寺选址成因考

·孔祥利·



万寿寺

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京西万寿寺,不仅在初创时期即被历史文献载称建筑规模“极其宏丽”,^①而且在清代又得到多次重修和扩建,形成了规模更加宏大、且风格独特的古建群体。即使到了近代,这座皇家建筑仍然保持着它鼎盛时期的完整和规模。究其原因,万寿寺之所以历经几个世纪保持不衰,乃至发展扩大,不仅在于它的皇家寺院地位、佛教文化特性诸因素受到皇家重视之故,还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带给它的优势。这一优势是促使清皇室对它更加注重的主要原因,并导致它在清代的昌盛。这一优势的出现是寺院初创时期选址成功的结果。

万寿寺的初选址是在风水勘輿术盛行于明代社会之背景下进行的,勘輿术对其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寺址选定于赴西郊御园之途及水上御道之中,是有其历史缘故的,这一缘故后来促成万寿寺的扩大和发展。万寿寺的勘輿选址还形成了它的建筑群所特有的格局,这一格局使万寿寺建筑群构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建筑景观,成为人们领略明清建筑艺术的典型例证。

一、选址的历史地理因素

据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载,原皇

城东北隅有“番汉二经厂，其来久矣，穆宗尝诏重修，以祝釐延颺，厥功未就。”明万历五年，慈圣李太后发布懿旨，称皇上欲创“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②此寺即为万寿寺。李太后与万历帝的意图是以寺院取代原属内府的汉经厂。因不是修复汉经厂而是另建寺院，所以面临寺院选址问题。选址的方向有京城和京郊两种选择，另外由于汉经厂除收藏汉文佛教经典之外，还收藏有永乐时所铸巨型佛钟，移钟并非易事，故也应考虑这些佛教法物迁移的方便。

在京城建寺，据以往先例，往往需要拆迁大量民居，动辄费银巨万。据载，“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数百家，费内帑数十万！”^③由此可见，在京城建寺，实属劳民伤财之举。对此，李太后转万历帝的话说，“朕时佩节用之训，事非益民者弗举。”^④依此言，寺院排除了在京城定址的选择。

迁移汉经厂所藏巨型佛钟，其工程将十分浩大，故寺址虽定于京郊，但不宜择山地，选择京郊平川之地为宜，所以万寿寺基址最后确定在离京城数里之外的平川地带。

万寿寺的创建，是在万历帝尚未亲政之时，慈圣李太后代皇上发布的旨令，这无疑与李太后本人的意愿关系密切。据载，李太后不仅是个“好佛”之人，且以“九莲菩萨”自居。^⑤她于“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⑥兴建万寿寺是她于明万历初捐出巨资修寺的活动之一。对于尚未亲政的年轻天子来说，以慈悲为怀的李太后当然要为他树立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事非益民者弗举”，表明了天子的爱民之心，所以没有将寺址选在京城内而惊动百姓。同时，又以“不可烦有司”之旨，^⑦李太后等人自出宫中储资，以太监主持兴寺之役，在远离京城之地选址营建，以致“虽大作，役不逾时，公私若无闻知”，^⑧“一以大珰莅之，有司例不与闻，民间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话也”。^⑨万寿寺营建之役，不仅耗费巨资，而且建筑规模“极其宏丽”，被时人叹称“儿与

大内等”。^⑩如此之大役，“公私若无闻知”，寺址选在京郊是主要原因。

万寿寺的选址营建筹划组织者是司礼太监冯保，据《敕建万寿寺碑》载，慈圣李太后“命司礼监太监冯保等卜地，于西直门外七里许，广源闸之西特建梵刹，为尊藏汉经香火院。”^⑪由此可知，选址于京西长河广源闸附近是卜占吉地的结果。此系根据风水术“吉地不可无水”的原则，^⑫寺址选定于长河边。

选址长河一线而非其它水系，这与寺院筹措者司礼太监冯保的导向有关。冯保在万历初年万历帝未亲政之时，是左右内廷朝政的实权人物，“外廷稍引三公势，内禁亲操六玺权”，^⑬与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政治上联手，又得李太后赏识，自是骄横一世。在明代太监佞佛修寺的风潮中，冯保自不例外，凭借他的“三公”地位和权势，营建寺宇也自然要显荣择吉。据载“万历初，大珰冯保营葬地，造寺曰双林。双林，冯之别字也。”^⑭该寺建于长河白石桥之西。可见冯保早已看中长河河畔这块风水宝地。万寿寺作为以万历帝名义兴建的皇家佛寺，自然成为冯保兴作的首要大事，而寺址的择吉更是至关重要之举，故长河河畔成为他的首选之地。

长河以自然条件之优越吸引着众多的寺观营建者。长河自开辟以来，经人工整治建设，已成为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的京郊胜地，寺观由此不断兴起。据文献描述，“出西直门，过高梁桥，杨柳夹道，带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见沙石，蕴藻萑蓂，飘走带牵，小鱼尾游，翕忽跳达，巨流背林，弹刹相接，绿叶浓郁，下复朱户，寂静无人，鸟鸣花落。”^⑮长河的这种自然环境符合风水术中对基址环境的要求，所以，这条河道沿线的多数地方被视为风水宝地，在河道最佳形势地段，往往都有著名大刹，如真觉寺、极乐寺、双林寺等。万寿寺系明末在长河沿线兴起的最后一座巨刹。长河上游源于昆明湖秀漪桥，下游终于西直门外高粱桥，是连接京城与西郊御园的水系。广源闸建于

长河中游中段,万寿寺选址广源闸附近,是取长河御道中点之意,它便于皇族于巡幸中途驻蹕息息。可见作为皇家佛寺的万寿寺还要肩负着为皇族出巡服务的任务,故其择址定位意义重大。万寿寺寺址的位置在万历朝即实现了它为皇族服务的目的。据载,万寿寺为万历帝“幸山陵尝为驻蹕地也。”^⑩万寿寺在选址问题上为皇室巡幸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其选址成功的根本因素,它使万寿寺与皇室建立起长期密切的联系,将佛寺文化融进宫廷文化之中,从而使万寿寺历久不衰。

二、堪輿术对寺院选址的影响

明代堪輿术从理论到实践都已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并且盛行于皇家和民间的建筑、营葬选址活动中。佛教寺院虽属佛家圣地,也依然在选址营建上受到堪輿术的影响,何况皇家寺院更指望好“风水”带来的灵气为皇室谋求吉利。万寿寺的兴建选址于是有皇帝“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卜地”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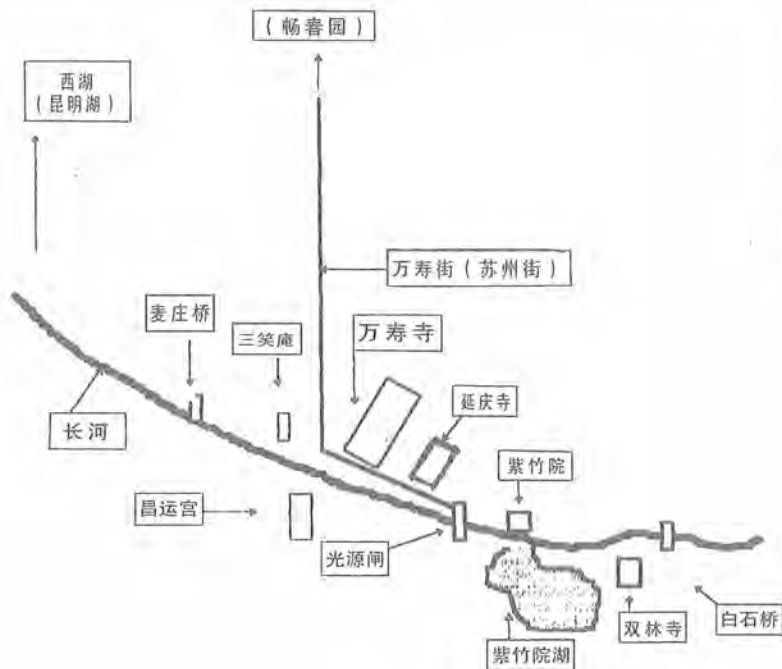
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万寿寺择址于平原地带的长河一线,在选择水系及其寺址具体方位时,风水堪輿术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选择水系,勘輿理论认为,“行到平阳莫问龙(山脉),只看水绕是真龙”,^⑪“寻龙择地须仔细,先须观水势”,^⑫“吉地不可无水”。由此可知,万寿寺基址限

定于平原地域,定址水系一线是最佳选择。根据勘輿术所规定的“风水宝地”环境模式,寺基确立于长河北岸,面河而建;长河南岸有丘陵作为“案山”,长河水流自西向东,形成大的环抱水势。“勘輿家之言风水,乘风则散,界水则止”,^⑬寺基于长河北岸是藏风聚气思想的体现,勘輿理论认为如此寺内的气场较佳。

万寿寺前长河水道的走向为西北——东南向,这一流向符合勘輿术对水流向择吉的要求。对水道流向的评判,古人认为水自西北而来,向东南流去为佳。因为古人认为“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⑭“乾为天门,巽为地户。”^⑮“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窠,以象地户……,是古以西北为天,东南为地户,西南为人门,东北为鬼门。”^⑯故勘輿家将“天门地户”作为水口、关锁,而万寿寺前水流方向恰好符合这一条件。

勘輿理论对河道上下游水势又有所规定:“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



明代万寿寺基址形势图

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不竭。”^②“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③根据勘輿术的这些理论,万寿寺基址具体位置的确定必然要考虑上下水口的形势。以上游而论,水自源头南下,偏转东南折向万寿寺前,从寺基可不见源头,此即所谓“天门开”。以下游水口而论,寺基东侧不远有广源闸,闸东水流折而向东,从寺基可不见水之去,此即所谓“地户闭”。广源闸建于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98年)。由此可知,广源闸实际上是定址的参照物。通常情况下,勘輿家是在基址下游增建堤塘闸桥、楼台塔亭之类的建筑物作为关锁、镇物。

万寿寺上游河道的偏北走向以及下游河道的折东走向,构成了寺院基址前河道的朝抱大形势。这种朝抱走向的河道类似圆弧,而在五行学说中,金象圆,所以这种形势又称作“金城环抱”。五行说认为金能生水,勘輿家又以水为财,故“金城环抱”的形势被称颂为大吉之地:“横水过宫,金城抱负,若捍此地,富贵不绝。”^④这里所谓“富贵”、“福祸”之说,只是一种寄托附会之说,实际上,金城环抱的形势构造了一种良好的视觉环境和生存环境,形成了使人事有利于发展的自然条件。

三、勘輿术对寺院建筑格局的影响

在勘輿术指导下,万寿寺基址确定在广源闸之西的长河北岸,水口、水势均获得较佳的局面。除此之外,寺院的建筑格局、朝向为取得与外部环境的谐调,依然要按勘輿术理论来指导营建、规划。对于建筑朝向,勘輿术要求考虑周围环境形势的需要,以获取良好的视觉和心理感觉为最佳标准。据观测,万寿寺建筑朝向向西偏离正南约30度,即西南朝向、东北坐向,与通常建筑的正南朝向有所不同。究其缘故,系寺前长河走向为西北至东南向,而寺院建筑平面横轴又与河道走向平行,故出现偏差。据实际观察,这种偏差并不给人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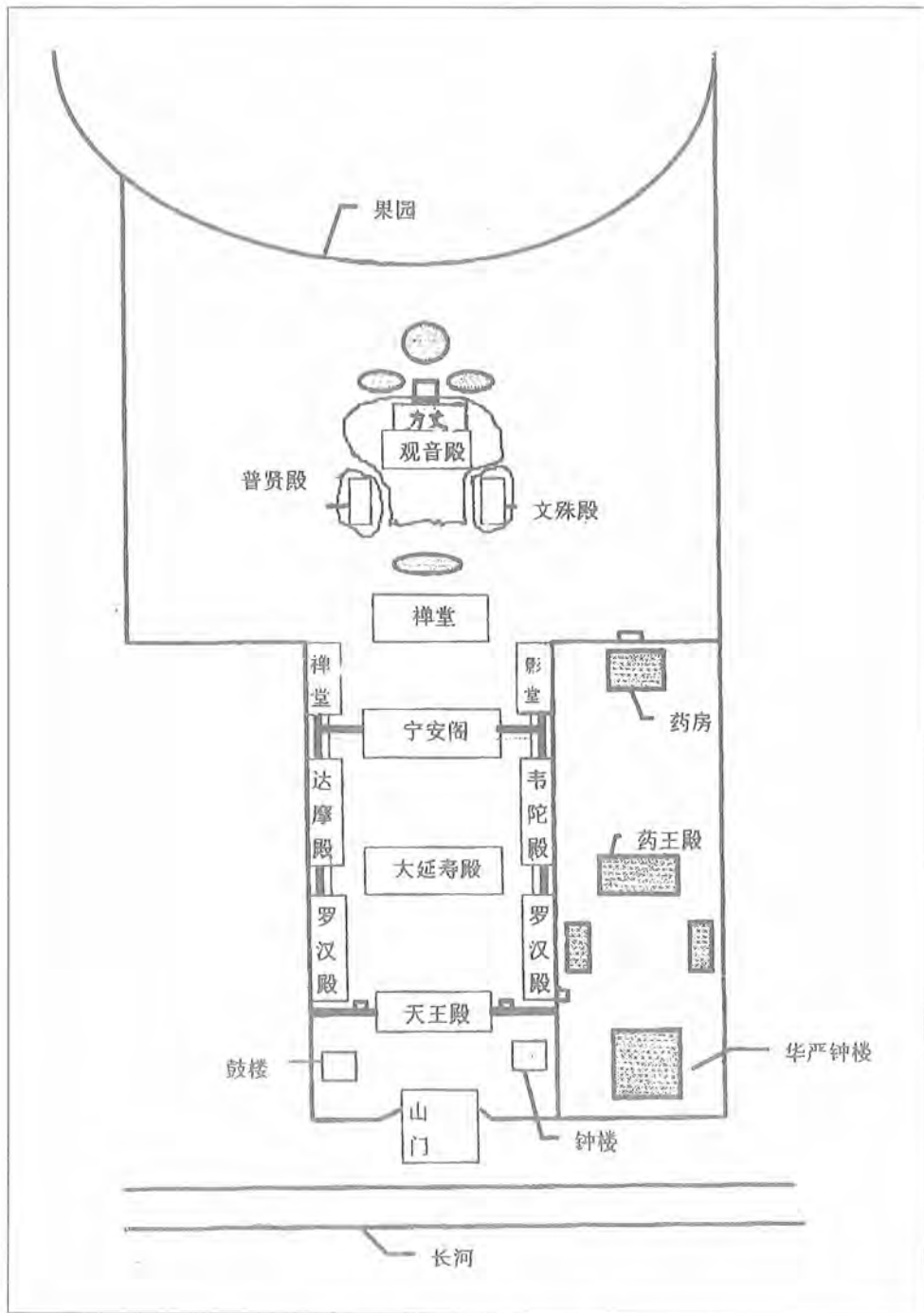
毫不适之感,相反,寺前的景观十分和谐,整体环境的确达到了勘輿术所要求的那种良好视觉和心理感觉。可见万寿寺建筑朝向的这种设计是十分成功的。实际上这是建筑朝向屈就于环境形势的结果,这种屈就正是勘輿术中要求建筑朝向与形势谐调的一种体现。

建筑朝向正南是勘輿术为建筑自身取得最佳日照时间方向所规定的。万寿寺建筑朝向因河道偏离正南30度尚属勘輿术容许范围,因偏离正南30度内对日照的时间、方向影响不大,可略不计。这样建筑朝向在与周围环境谐调时就有了一定的余地。这种情形也说明在选址时务必考虑到河道走向对建筑朝向的影响。万寿寺上游河道走向偏北直至正北,在偏北的河道上建筑朝向难以面水又面南,无法取得水流朝抱的形势。故万寿寺基址没有选在广源闸西侧更远一些的地方。实际上,广源闸以西附近的河道是上游水域唯一可择之地。

广源闸以东下游水域河道曲折,但大体为正东流向,大多数地段适宜建筑水面南而建,并取得好的河道形势。正因为如此,广源闸以东水域在明晚期以前普遍为寺观所占据,高粱桥以西有真觉寺、极乐寺等,白石桥以西有双林寺、护国仁王寺等。可以说,较好的地段均已有大寺占据,故万寿寺基址只好避开这段地域。广源闸以西原有延庆寺等寺院,无较大寺观立足,故此为万寿寺建基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地域。

在取得面水形势的基础上,万寿寺的建筑格局也采取了人工模拟改造的方法以适应勘輿理论的规划。按“风水宝地”的形势,在寺院后部以人工垒石为山的作法取得依山面水的形势。据载,“寺后垒石为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⑤寺院假山与长河共同构筑了面水依山的风水宝地地域模式,并与长河南岸的丘陵(案山)遥相呼应,形成了寺院的大环境形势。

万寿寺假山的营建可谓匠心独运,构



明代万寿寺建筑布局示意图

□ 万历五年建 ▨ 万历三十五年建置 - 穿廊 ○ 水池

思奇巧。万寿寺建筑坐向为东北,即坐艮山,因古人认为“东北为鬼门”,又《内经》九宫八风之说认为东北为凶风,所以在寺后东北向起山有镇山辟邪的作用。假山构造的特点是“攀石为山,所取土处为三池。山上三大土殿各一,三池共一亭”^②。假山寓意三大佛教名山,不仅使其营建名义符合寺院文化氛围,而且以山水相依的布局形成了寺院后外部环境的谐调一致。

寺院面水而开正门,此“亦依《八宅周书》例,然佛门坎、艮、震、巽、离、坤、兑七山可开正门”。^③万寿寺建筑坐艮山,故可开正门,面水而开正门,寺院外部景观从而与周围环境达到了和谐一致。

万寿寺环境的优美主要依赖于寺前长河水道的风景宜人,在勘舆理论指导下,万寿寺基址选择了长河水系较佳的位置,这里的地形、地势、地理、地貌适宜寺院之营建;这里的水质清澈,林木茂盛,庄田广袤,具有上好的生存环境。万寿寺置身其中,与周围环境和谐融洽,浑然一体,自然天成。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寺院由此香火极盛,延续数百年不衰。这些正是勘舆理论中合理成分对寺院择址的良好影响和结果。

同样,在勘舆理论指导下,万寿寺建筑規制齐整,形制错落有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地位突出,两侧对称配以配殿厢房。寺院“宏畅深静,規制壮丽。”^④“丹楼绀宇,几与大内等。”^⑤由于假山的设置,寺院布局上形成前殿后园的建筑风格,构成平川式寺院鲜见的寺院园林景观,从而使寺院建筑格局具有鲜明的特色,成为最吸引都人游赏的京郊名胜之一。

四、选址御道对寺院发展的影响

万寿寺因选址于长河水路御道之途,其驻蹕功用明代已初见端倪。清王室入主北京以后,营建西郊御园、建立离宫的活动开始兴起,同时通往御园的御道建设也开始受到重视,万寿寺作为御道沿途的皇

家佛寺由此得到了较之明代更为丰厚的礼遇。

康熙二十六年,清圣祖首先在西北郊兴建畅春园作为离宫。^⑥在这之前的一年即康熙二十五年,万寿寺得到敕修,^⑦这是清王室首次重修万寿寺的活动。万寿寺的重修活动与畅春园的兴建活动同一工期绝非偶然,显然万寿寺作为赴离宫途中的皇家建筑而得到启用和重视。由于康熙敕修万寿寺碑无存又无文献可考,其敕修直接原因不明。但从有关金石文献及档案记载推测当时寺院增修的殿阁情况,可略知本意。

通过寺院内所存《重修药王殿记》碑及乾隆初年《万寿寺八景倡和诗·序》之描述,可知寺院在康熙二十五年重修中得到扩建和改建。《万寿寺八景倡和诗·序》载:“寺中殿宇裔皇,杰阁上凌云汉,则贮藏经处也。入渐深,架峰石为山岩,像普陀,玲珑万状。石门洞开,别一福地。最后则白松七株,分列殿前。”《重修药王殿记》为康熙三十七年所撰,其称:“殿后阁前,罗汉松七八株,大可两人合抱。”这两个文献中所称的“白松”、“罗汉松”系同一植物,栽于寺院假山之后,而寺院在明代仅有五进院,假山为最后一进。“分列殿前”的殿堂应指三圣殿(寺院最后一进殿堂),系清代增建;“殿后阁前”的殿应指无量寿佛殿,阁指千佛阁(三圣殿上层楼阁),亦系清代增建。“石门洞开”,系指假山区得到改建,水池已不见,而增建地藏宫洞。这两个文献均早于乾隆十六年万寿寺重修之时,故推知扩建和改建系康熙二十五年重修活动所为。另从乾隆十六年重修万寿寺奏销档案中“改建行宫五间”的记载可知,寺院西路在康熙重修活动中已增建行宫建筑。由此可知,康熙二十五年的敕修不仅投入大,而且确立了万寿寺作为行宫附着点的地位。在康熙二十六年初畅春园开始接待康熙皇帝的同时,万寿寺作为御道途中的驻蹕之所而为皇室所用。万寿寺在畅春园的兴建同期得到重修和扩建,并确立行宫地位,是寺院选址活动体现为皇室巡幸服务之思想的延续。

乾隆十六年和二十六年,清高宗为其母后祝寿,两度重修扩建万寿寺,其中寺院西路行宫得到完善,东路僧舍得到改建,从而形成了寺院三路规模的格局,寺院建筑规模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纪录。

万寿寺能够得到乾隆年间的重修,其御道途中位置的确认是主要原由。据乾隆十六年《御制敕修万寿寺碑记》载:“自昆明湖循长河而东,缘岸多乔林古木,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广源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乾隆辛未之岁,……朕恭奉大安舆由畅春园道西直门至大内,銮御所经,兹寺适居其中,且喜其嘉名符祝釐之意,命将作新之,更加丹牖,绣幢宝铎,辉耀金碧,以备临览。”^⑧乾隆十六年在寺西改建行殿,二十六年又辟行殿院落及其附属御园建筑。这一年还兴建买卖街于畅春园南至万寿寺西侧,即将万寿街改装成江南苏州式建筑商业街,人称“苏州街”。苏州街作为皇族巡幸之所系皇家禁地,它把畅春园与万寿寺行宫连接起来,这时的万寿寺已完全融入皇家御园的领地之内。比之康熙在万寿寺增建行宫、扩建寺院,乾隆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万寿寺寺址位置的重要由此得到进一步昭显。

光绪二十年时逢慈禧皇太后六十寿辰,万寿寺再度获得重修。此时已非康乾盛世,而且畅春园、苏州街已遭焚掠,万寿寺陆路一侧与皇家御园的毗邻已成为历史。由于慈禧在国库空虚之时仍动用海军军费营建颐和园;故西郊御园之途仍有着皇室巡幸的纪录。慈禧与乾隆帝同样喜爱走水上御道,乘龙舟凤舸奔赴郊园。颐和园恰在长河上游,取道西直门高粱桥,即可从长河下游直达颐和园。据光绪二十年《重修万寿寺碑文》称:“粤壬辰、癸巳之岁,万寿山、颐和园告成。皇太后以春秋令日清蹕莅止,道西直门经广源闸,御凤舸西迈,闸之上有万寿寺焉。寺为乾隆中一再修建,……兹者恭逢慈禧皇太后六旬庆典,懿旨申谕:以民生国计为念,罢臣工贡献,……凡踵事增华之举,概从撙节。……维

兹寺宇为慈圣所瞻礼,且成宪具在,敢不恪遵?”慈禧寿辰临近,又逢进驻熙和园时于途中瞻礼万寿寺,故寺院得到重视。虽声称“概从撙节”,但仍以前朝之先例,对寺院加以整饬修缮。对此,万寿寺所据有的嘉名无疑对修缮活动的提出起着重要作用,但若寺院不在御道之途,也是难以得到修缮机会的,故万寿寺是这一时期极少得到修缮的皇家寺院建筑之一。万寿寺由于有幸得到这次19世纪末叶的修缮,故在近代它能保持完整的建筑群体,以致现代世人仍能见到它原有的风貌。

五、寺院基址对华严钟悬置方位的影响

华严钟(永乐大钟)在万寿寺的悬置方位,据文献考之,并非寺院中路之钟楼位置。据载:“(万寿)寺有方钟楼,前临大道,楼仅容钟。”^⑨“寺左钟楼,前临大道。”^⑩据此推测华严钟应在寺院东路前首。故推知华严钟于万历三十五年移置寺院后另外加筑钟楼,而不是对寺院中路一进院钟楼进行改造。又据寺院所存《重修药王殿记》碑所称:“万寿寺在西直门外六里,一侧药房□□,明后宫于此建药王殿,以祀药王者。……入寺,前殿已毁,殿基立巨钟。”该碑系康熙三十七年所立,故记载华严钟楼已毁,钟卧于钟楼遗址,并与药王殿同在万寿寺一侧。

华严钟悬置于寺院东路前首,是受勘察理论制约的结果。类似的实例有华严钟悬于觉生寺之动议的陈述,见雍正十一年四月内务府移钟奏折:“为移安万寿寺钟事,……觉生寺在京城之乾方,圆明园之巳方,钟之本体属金,若移安觉生寺后甚为合宜;看觉生寺殿宇五层,后阁属土,若在阁后另建一层安设此钟,取金土相生之意,甚为妥协。”这里所说的钟体属金,及圆明园之巳方适宜悬钟之论,源于五行之说。《五行大义》称:“金受气于寅,……生于巳,旺

于酉，墓于丑。”所谓“生于巳”，指巳方即东南方宜金之生长，故有“圆明园之巳方”适宜悬钟之说。同样，华严钟在万寿寺东南方悬置亦依此理。又奏折中后阁五层属土之说，源于易数之阴阳五行说。《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阴阳五行之说赋予数学五行之性，“五”被赋予“土”性。觉生寺后阁为第五层，故属“土”，土能生金，故后阁之后建钟楼，“取金土相生之意。”华严钟悬于万寿寺东路一层，“一”被阴阳五行说赋予水性，以金能生水，故有钟宜悬前首之说。万寿寺建筑坐向为东北，为丑方，金“墓于丑”，故华严钟不宜悬于该寺寺后，即使该寺院建筑也为五层。

六、万寿寺基址说质疑

关于万寿寺原址为唐代聚慧寺之说，此说引《京城古迹考》所载为据。《京城古迹考》称：“（万寿寺）臣按寺即唐之聚慧寺也。”《京城古迹考》系清乾隆年间奉旨调查京城古迹的大臣励宗万所著。其所调查的材料既有依前朝文献记载的转引，又有调查实证。所谓“臣按”即励宗万据其它文献引征所得出的结论，并非调查所得。此按语笔者认为有误，其理由如下：

据有关文献记载，聚慧寺与慧聚寺是同一寺宇，建于唐武德年间，其寺址在京西马鞍山，历史上曾易名万寿。《天府广记》：“唐聚慧寺武德中建，正统中改名万寿寺，在城西戒坛。”此载为“聚慧寺”。《帝京景物略》：“（戒坛）唐武德中之慧聚寺也。正统中易万寿名。”此载称“慧聚寺”。《宸垣识略》：“万寿寺在马鞍山，唐武德中建，曰慧聚，明正统间改名万寿。”由以上三条可知，聚慧寺或慧聚寺寺址在马鞍山，与长河万寿寺寺址不符；聚慧寺在正统间易名万寿，与长河万寿寺为明万历年间所创起源不同。故唐聚慧寺之后易名的万寿寺与明万历所创的万寿寺无延续性和接替性，既非同一寺址又非同一寺院之易名。励宗万

所称应属对文献记载的误引。

另从勘察术角度考察，万寿寺原址不会存有唐代寺院建筑遗址。我们从万寿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建筑坐向可知，万寿寺在选址过程中基本上依赖于对已有地形地势的取舍，即河道形势决定了万寿寺的具体位置，河道走向决定了万寿寺建筑的坐向。依勘察术的这种择址方法可知，长河一线的寺宇建筑均应晚于长河开辟的年代。而据历史文献记载，长河始辟于金，成于元，故长河沿线寺院建筑不会早于金元时期。据此亦可知，万寿寺基址为唐代寺宇原址之说不成立的。

①④《长安客话》卷三，“郊西杂纪·万寿寺。”

②④⑦⑩《张太岳文集·敕建万寿寺碑》卷十二。

③《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⑤《明史》卷一二零《诸王传》。

⑥《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

⑧⑭《帝京景物略》卷五，“万寿寺”。

⑨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京师敕建寺。”

⑩⑬⑲⑳㉑㉒《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国朝苑囿”。

⑫《秘传水龙经》卷一，总论，丛书集成本。

⑬⑱《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郊坰·西八”。

⑮《天府广记》卷三十五，“岩麓”。

⑬⑳《秘传水龙经·序二》，丛书集成本。

⑱《天台山方外志》

⑲《周礼·大司徒疏》卷三。

⑲《易纬·乾凿度》。

⑲《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⑲《入山眼图说》卷七，水口。

⑲《地理大书·山法全书》卷首上。

⑲《秘传水龙经》卷四、五，“论支干”，“诸格一百八十七图·金星城格”，丛书集成本。

⑲《地理直指原真》下卷。

⑲《北京通史》第七卷，中国书店版，第437页。

⑲《京城古迹考·万寿寺》载：“康熙二十五年奉敕重修，……有圣祖御制碑文一座”条。

（作者为北京万寿寺艺术博物馆馆员）

密云长城“四路”

营城 城堡 关口 城楼

郑云山

密云长城环县境的东南、正北、西南三面，从东南的大城子乡下栅子村入境，穿越54个村庄，于县西南的小水峪出境入怀柔县，全长三百多公里，实有长城213公里。

密云长城属蓟镇长城所辖，“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圯，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一，先建千二百座，然边卒木强，律以军法将不堪，请募浙江人为一军，用倡勇敢。”^①明朝洪武初年建造长城墙，但不完善，没建城楼，隆庆年调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分管蓟、昌二镇边防，开始建造城楼、敌台、烽火台，蓟镇1200里长城，建1200座城楼。密云长城段上建660座城楼，密云段的长城是蓟镇长城长度的三分之一，而所建长城楼台则是半数多，故有“密云长城城楼多之说”。

密云设边关四路，即墙子路、曹家路、古北口路、石塘路，四路边城设六十七个关口，在长城段的重要关口上及其要塞处建造三十三座营城，城堡，所以密云长城又有营城城堡多和关口多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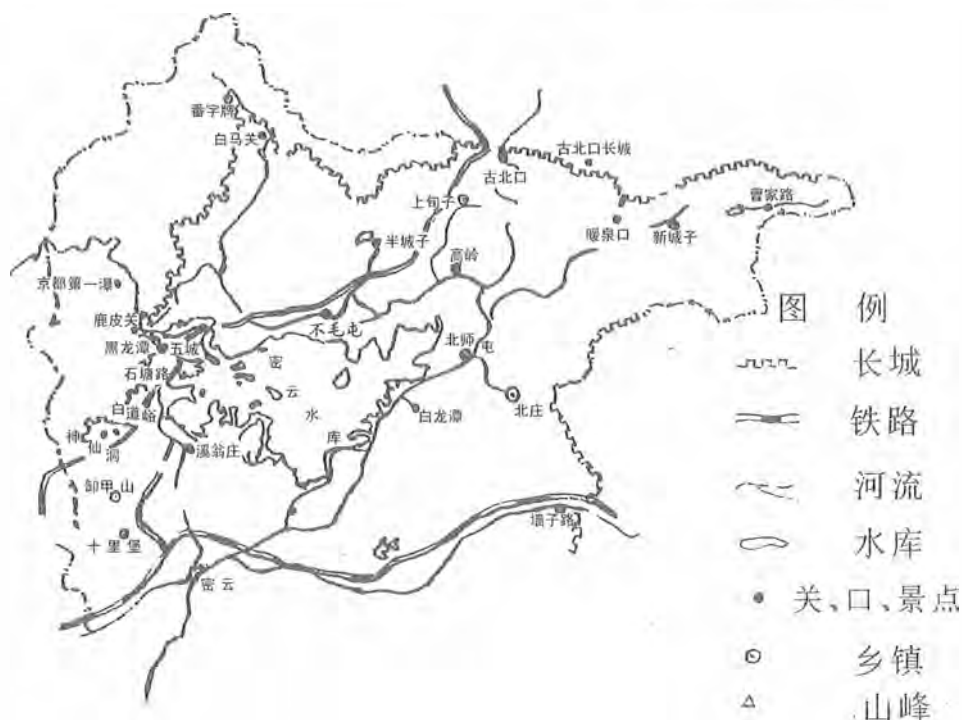
密云长城四路，以古北口为京师要冲，自古称古北口为“京师锁钥”。以曹家路为首要，以墙子路、石塘路为分防。

四路所辖关口

密云边关与蓟镇长城西协四路，主要防御蒙古部族。“俺答款塞，久不为害。独小王子部众十余万，东北直辽左，以不获通互市，数入寇。……”^②对京城的威胁，经常骚扰。从武初年开始修筑边城，但边城不完善，没建城楼。因此，谭纶，戚继光调入蓟镇后，上书皇帝批准从而在蓟镇、昌平镇城墙上建造城楼，分设关寨，建营城和城堡。^③

墙子路，从东南至正北下辖11关口，它们是：熊儿寨河口、南水峪、北水峪、黄门口、南峪寨、墙子路、磨刀峪、泉水河、石灰峪、小黄岩、大黄岩。

曹家路，从东南到西北共辖15个关口，它们是：姜毛峪、苏家峪、南峪、大虫峪、走马安、镰钯峪、黑峪关、芍香峪、二道口、汗儿岭、倒班峪、齐头岩、柏岭安、师姑峪、



密云长城边关“四路”示意图

土墙子。

古北口路,从东北到西北共辖 15 个关口,它们是:汤河、沙峪、龙王庙、窨子峪、红门、砖垛子、炮子口、古北口河西、古北口便门、鸽子洞、黄榆沟、七寨关、吊马河、乍儿峪、古北口。

石塘路,由左二关到怀柔县的河防口共辖 26 个关口,它们是:左二关、陈家峪、东驼古、西驼古、大战峪、响水峪、红土峪、白马关、划车峪北口、划车峪南口、杏树沟、朱家峪、孟思郎峪、白连峪、冯家峪、西口外、营城峪、黄峪口、鹿皮关、东石城、西石城、水峪、白道峪、牛盆峪、小水峪、大水峪。

密云边关四路营城

密云边关四路以石匣为中心营城,石匣地处密云盆地,与墙子路、曹家路、古北口路、石塘相距五、六十里。隆庆二年蓟镇

兵力部署,密云四路石塘路驻军 11805 人,古北口驻军 11491 人,曹家路驻军 7847 人,墙子路驻军 10488 人。^④

石匣城初建于明朝弘治十七年(公元 1504 年)。巡抚洪忠建筑土城,城廓周长 4 里。明嘉靖三年(公元 1566 年)改建为砖城墙。城周 4 里 224 步,城呈正方形,置四门,城内分为南北,东西十字形大街,南北长 500 米,东西长也是 500 米。因此,匣子形,故而称为“石匣”。

石匣城在清康熙 60 年,建筑北城楼及钟鼓楼。同治十年县丞及守备又一次培修。

石匣城今已沉入密云水库。用密云人一句口头语叫作“没实闲”即“没石匣”。石匣城从此成为历史。石匣是明朝设密云四路中的一个中心营城。

墙子路在密云城东南,距石匣城 60 里,与兴隆县交界。



墙子路营城“墙子雄关”

墙子路营城，初建于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城周850多米，置东、西、南三门，东门曰：永熙门，西门曰：安边门，南门曰：墙子路。城基为块石，城墙为砖。长方形城，北城墙随山势呈半圆形。明永乐年（公元1403—1424年）增建西仓库。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重修城墙。南门楼上竖汉白玉匾，正中刻“墙子路”三个大字。有对联，上联：“皇明万历三年岁次乙亥仲春吉旦立”。下联：“钦差总督蓟辽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关中杨兆书。”字体浑厚刚正。

墙子路原名墙子岭，为明修建营城密云四路之一，墙子岭改叫“墙子路”。

墙子路的大街呈丁字形，条石漫道，城中心有一座“影壁”。

墙子路营城在明嘉靖年设参将，提调驻守。城内建有都司署和把总府。

墙子路长城上建空心敌楼79座。

曹家路在密云县东北，距石匣60里，京东最高山雾灵山西侧，四面环山。

曹家路营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初建为土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建成砖石结构的营城。营城占地12亩，设

东、西、南三门，另外东、西城又各设一个便门。

曹家路营城，分为旧城、新城两个城。洪武年间建的城为旧城，万历年间建的为新城。因地势关系，城依山就势，东墙和北墙沿山岭砌墙。北面城墙建在山梁之上。

城内设都司府，中军千总衙门。东门外有校军场、演武厅。城西还建有军营堡一座，设二门，驻守游击将军。

古北口路，古北口营城建于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周长四里三百十步，不规则多角形的城，东西长三华里，南窄，北宽，城依山势起伏，城墙上的转角处建战台，战台大小不等。城设三门：东门、南门、北门。其中东、南二门靠北侧各建一水门，小河由此门流过。南门上建一城楼，巷门上砌石刻“古关”两个大字，匾一块，东门是个小便门。北门建在乾枝岭半山峡谷上，高三丈、宽二丈，门外有瓮城。瓮城上建一座关帝庙。瓮城墙外大道边上有一座“琉璃影壁”，影壁墙后面有一座“杨令公庙”。

古北口营城，城内狭窄，适宜建筑面积很小，故而城内除衙署外居民建筑不多。



司马台长城

古北口仓,密云后卫署,后卫学署,都司署都设在城内。古北口仓,初建于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重修。并由翰林院编修童承撰写《重修古北口仓碑记》石碑一块。密云后卫署,建于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古北口设守御千户所后改为“密云后卫”,为26外卫之一。设总兵驻守。

古北口路,辖15个关口,隆庆二年驻军11491人。

后卫学署,始建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6年)重修。万历年间由蓟镇总督刘应节,总兵戚继光建之于城内,其正殿祀文昌,俗称“文昌阁”。

石塘路。明洪武初年,建石塘路城堡,称“石塘堡”。后于明嘉靖年间改建石塘路营城。所辖边城125里,城楼95座。

石塘路营城呈方形,城周长2000米,置四门,城中心建一座钟鼓楼,城内东、西街分设文、武衙署。北门竖一块匾,上书“石塘岭”三个大字。南门城墙砌着一块石匾,上书“石塘路”。

石塘路城中的衙署,在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61年)设参将驻守。隆庆年驻军11805人。



曹家路营城东南便门遗址

石塘路城南山顶上建一座空心城楼,居高临下,警戒四方。

石塘路辖关口26座,最重要的关口是白马关,鹿皮关两个关口。

密云边关是蓟镇十一路中最重要的四路。隆庆年密云兵备道整饬地方;兵备参政王惟宁监督料理。四路驻军41630人。^⑤从当时情况说可算设重兵。

四路所辖城堡33座

从西南向东南沿长城线及其附近建33座城堡,其用途是驻扎军队,有的城堡有住户,有些城堡就是驻军。

小水峪城堡建于明永乐年间,堡呈方形,周长240米,设一南门,墙体是山石结构,城门砖石砌筑。

牛盆峪城堡建于明永乐年间,周长260米,设一南门,建在谷口内侧,是扼守谷口的城堡,城堡呈长方形,墙体为山石砌筑,城门是青砖和石条砌成。

白道峪城堡,周长220米,设一南门。墙体为山石,城门砖石砌筑,建于明永乐年间。

白道峪东堡,建在山谷入口处,城墙随山势而建,城堡周长



石塘路钟鼓楼遗址

275米,设一南门,墙体为石块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黑山寺城堡,周长250米,城呈方形,设一南门,墙体为山石砌成,城门砖石结构,建于明永乐年间。

北白岩城堡,周长440米,坐北朝南,设东、南二门,墙体为块石砌筑,城门砖石结构,建于明永乐年。

北白岩村西城堡,建于明永乐年间,周长200米,城呈长方形,设一南门,墙体为石块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鹿皮关城堡,城堡建在二道河子村北,城堡的名称为“骠骑堡”。城呈长方形,周长六百多米,设南、北二门。墙体为石块砌筑,此城为军营,地处白河河口,西侧悬崖峭壁,是一处军事战略要地。

水堡子城堡,又名东水谷堡。城堡呈长方形,周长250米,设南、北二门,南门有石匾,上书“东水谷堡”四个大字。城堡建在一座小山上,南面是山川河流,山石筑成城堡。

马营城堡,地处白河南岸,长方形城堡,坐北朝南,周长280米,设南、北二门,河光石砌成墙体,青砖石条砌成城门,为驻军人马匹的城堡。

南石城城堡,呈正方形,周长320米,石块砌筑城墙,设一东门,地处南石城小河流南岸,地势较高,北靠长城五座楼,素称军家必争之地。

北石城,又称西石城,城堡呈长方形,周长350米,设一南门,背靠山崖,面对溪流,墙体为山石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黄峪口城堡,城堡周长150米,城堡呈方形,设东、西、南三门。墙体为山石砌筑,城门为砖石结构。

西湾子城堡,城墙随山就势而建,高低错落,周长300米,设一南门。墙体为山石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石炮沟北堡,石炮沟城堡靠西山坡建筑,周长200米,设一南门。墙体与山石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石炮沟南堡,在石炮沟南半里路处的

高台上建一城堡。呈方形,周长324米,设一北门。东南和西北城墙上各建一角楼。墙体为山石,城门砖石砌筑。

冯家峪城堡,城堡呈长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设一南门,门楼上有一匾曰:“冯家峪堡”。墙体为河卵石砌筑。

上峪城堡,在冯家峪西三公里的山谷中高台上,城堡周长450米,设南、北、东三门。城堡的南山头上建一座瞭望楼。墙体为山石,城门砖和条石砌筑。

石佛城堡,城堡呈长方形,周长218米,设南、北二门,城墙为河卵石砌筑,城门砖石包砌。

下营城堡,城堡呈长方形,周长550米,设南、北二门,在城堡的东、南城墙上各建一座方形角楼。城门为砖石包砌。

西白莲峪城堡,又称营子城堡,建于明永乐年间。城堡呈长方形,南北长120米,东西宽90米,坐北朝南,设南、北二门。墙体为大块石砌筑,城门砖石包砌。此城堡内在当年为千总官驻守。

白马关城堡,白马关是京北重要关口之一。白马关城堡呈长方形,周长四百多米,设一南门,门匾上石刻“白马关堡”四个大字砌在门楼上。城墙山石砌筑,城门砖石结构,如今城堡基完好。

西驼古城堡,建于明永乐年间,城堡呈方形,周长408米。设南、北二门。城墙为石块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陈家峪城堡,城堡坐落在陈家峪村中。城堡周长358米,设一南门。墙体由山石砌筑,城门洞和城堡的垛口青砖垒砌。如今城门尚存,城墙残缺。

潮河关堡,古北河西三里潮河关村。明洪武年建城堡,城堡呈正方形,周长500米,设一南门,河光石砌筑城墙,城门青砖和石条砌筑。

古北口河东上营城堡,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堡呈方形,周长480米,设南、北二门。城墙由河光石砌筑,城门和城墙垛口青砖和条石砌筑。

司马台城堡,城堡呈正方形。周长400

米,设南、北二门。城墙为山石块,城门砖石砌筑。此城在隆庆年间驻提调和把总等军官。

土墙子城堡,位于寨子沟村。城堡地处两山峡谷之中,靠山沿溪。城堡呈长方形,东西长153米,南北宽55米。墙体为块石砌筑,在东南角处借助自然坚石为门,故称“石门”。南、北两山岗上各建一座楼台。此处原有小寨子,在修筑长城时,在原寨子的基础上建筑这座城堡。

新城子城堡,新城子城堡建于永乐年间,周长700多米,城堡呈长方形,坐北朝南,设南、北二门。城墙高7米,顶宽4米。城墙砖石垒砌。南门洞上方竖一匾,上写“新城子”三个醒目大字,城堡的四个城角上各建一座角楼。

遥桥峪城堡,城堡呈长方形,东西长123米,南北宽102米,周围总长为450米。城墙高7米,顶宽4米,城墙大块岩石砌筑,设一南门,城门砖石砌筑。在城墙北面建一座“真武庙”,城墙南门上建一座“魁星楼”,现在城体完好如初。

小口城堡,又称“将军台堡”。其城堡依山势而建,南临小河流,北靠山,城堡坐北朝南。城周围总长为546米,设一南门。城墙为大块石,城门砖石砌筑。城堡建于明洪武年间。

吉家营城堡,城堡周长1000米,城墙高7米,顶宽4米,设东、西二门。城墙为山石砌筑。城东门外设演武厅,点兵台,教练场,为军事培训城堡。

菜家店城堡,城周长750米,坐北朝南,设一南门。城墙山石砌筑,城墙上的垛口条石和青砖。南门上砌有“菜家店堡”四个字的石匾。城门洞的东侧设一砖砌的小巷门。

大角峪城堡,城堡呈方形,城堡周长600米,设一南门,城门上竖一匾,上书“大角峪堡”四个大字,城墙砖石砌筑。

姜毛峪城堡,城堡呈正方形,城堡周长595米,设一东门,城墙大块石砌筑,地处野

外没有住户,纯属兵营。

黑峪关城堡,花园村东三里,城堡周长380米,设一北门,东西城墙借用长城,墙体为大块山石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东沟城堡,东沟城堡周长180米,城堡呈长方形,设一南门,城墙北面是山崖,南面是一片开阔地,城墙山石块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唐家寨城堡,城堡呈长方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70米,设一南门。门楼上砌一匾,上书“唐家寨堡”,城堡的北山岗上建一座楼台。

破城子城堡,城堡呈方形,南北长60米,东西宽50米,设一南门。城墙大块山石,城门砖、石砌筑。

关上城堡,城堡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城堡呈正方形,城周长200米,设南、北二门,北门上砌一石匾,上书“墙子雄关”四个大字,城堡万历四十五年建造,城墙石块砌筑,城门砖石结构。

密云长城四路属蓟镇长城的西路,每一路下分成二个小分区,每个小区各统辖数座或十几座关寨,关寨设官提调。按照这一编制密云四路67处关寨,半数关寨都建有城堡。

①《明史》第十册,列传第一百,戚继光,五六一〇至五六一七页。

②《明史》第十册,列传第一百一,张居正,五六四三至五六五三页。

③《明史》第十册,列传第一百十,谭纶,五八三三至五八三六页。

④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撰写十八卷《密云县志》第五卷。

⑤《司马台长城》1992年2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第8至14页。

密云县文物保护协会秘书长李大儒提供长城和城堡资料。

(作者为原密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任密云县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清朝曾是历史上开创多民族、广地域的朝代之一。乾隆帝承袭先祖遗志,继续进行统一民族的大业。其中处理川北少数民族问题是民族统一大业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定金川战役”。金川战役分为二个时期。这里着重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大金川之战。此次战役涉及到傅恒。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傅恒宗祠碑》^①一通。此碑记载了因大金川之役比较得体的解决,乾隆为傅恒建宗祠一事。此碑螭首龟趺,额篆“御制”二字。龟座下为海墁石;碑两侧各雕若隐若现升龙图案;龟座两侧各雕麒麟、狮子。墁石及碑侧均采用高浮雕手法,层次繁复交错。碑通高6米,宽1.6米。龟趺首尾长3.65米。碑阳为满、汉合文,汉文部分共13行,每行字数不等,共517字。碑阴无字。碑阳与碑阴边框皆雕满游龙。《傅恒宗祠碑》无论从形制或从气势或是从雕工来看,都属清代碑刻的精品。

据《清史稿》本传,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之弟。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傅恒自侍卫擢为户部侍郎。乾隆十年(1745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二年(1747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1748



「傅恒宗祠碑」 与大金川战役

李
巍

年)三月,孝贤后从上南巡,还至德州崩,傅恒扈行,典丧仪。四月,敕奖其勤恪,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这时,因金川地险,前线将领指挥无方,正相持不下。

金川,分大金川和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合岷江注入长江,以产金得名,位于今四川成都西北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是藏族聚居地区。隋始置金川县,唐代属维州管辖,明代封金川土司哈衣麻衣喇嘛为演化禅师,颁授印信,隶杂谷安抚司。顺治七年(1650年),小金川首领卜儿吉细归诚,授土司职。康熙五年(1666年),其首领嘉勒巴归顺,清政府授予他“演化禅师”印。康熙六十年(1721年),莎罗奔命其头目赴四川省城投诚,并拨士兵五百名随清将岳钟琪征剿西藏羊峒有功,清廷授予其“大金川安抚司印”。乾隆初年,莎罗奔将女阿扣嫁与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生性懦弱,政务为阿扣和泽旺之弟良尔吉所控制。莎罗奔便想利用亲戚关系兼并小金川。乾隆十一年(1746年),莎罗奔和阿扣、良尔吉合谋,派步卒将泽旺劫至大金川,并夺其印,后来在四川总督的檄文命令下,莎罗奔才不得不把泽旺放回。第二年,莎罗奔公然发动武装叛乱,指挥土兵攻战周围土司。地方政府无力平乱,上奏朝廷。

乾隆帝决定任用曾经跟随鄂尔泰在贵州征讨“苗寨叛乱”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

四川总督,进讨莎罗奔叛乱。张广泗至小金川后,固执己见,任用良尔吉,至使清军作战计划通过良尔吉泄露给莎罗奔。接着又因副将马良柱未请命而战,将其撤职,换用他将。^②给叛军乘机建筑石碉、储蓄粮草提供了条件。每个石碉均在高山峭壁之上,用巨石筑成,高三、四丈,形似矮塔,四面开窗眼。叛军躲在石碉中,以暗击明,居高临下,枪无虚发;而清军从下仰攻,枪弹只中石块,即以炮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③清军每夺一碉,即死伤数百,此碉虽毁,彼碉复立,清军损失重大。为求早日平定金川,清高宗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明降谕旨,命大学士讷亲^④为经略,驰往川西军营督师。又起用赋闲在家的老将岳钟琪^⑤,任四川提督,因其官居西蜀多年,熟谙此地民情,素为莎罗奔所畏服。

讷亲锐意灭敌,“持其才蔑视广泗”,^⑥到达军营,即下令限三日攻克噶尔崖官寨,“将土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⑦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相继阵亡。讷亲经此惨败,转攻为守,采用以碉逼碉,以卡逼卡的战术(实际上是躲在军营,坚守不出),不敢再言进取。张广泗笑讷亲不懂兵法,轻视讷亲。这时,讷亲密奏,“张广泗驭下不公,偏袒黔兵,人心不服,又与巡抚纪山各持己见,不能和衷共济,专务欺饰,贻误军机”。^⑧岳钟琪亦密奏,“张广泗误听汉奸王秋之言,令小金川土舍良尔吉领兵,良尔吉伪降张广泗,骄纵土兵,不听约束,其所领绰斯甲布土兵对敌时,竟不施放枪弹,复暗助大金川粮饷弹药,泄露军情,奸谋久露,张广泗始终加以庇护”。^⑨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张广泗被押解入京,乾隆亲自问罪,斩之。又命讷亲报告详细情况。而讷亲奏中,嗷嗷万言,无一要领,惟欲急于见帝自陈,讷亲以满洲经略大学士统领官兵,从不亲临督战,漫天胜算,劳师糜饷,乖张退缩,亦奉旨革职。其后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以其祖父遏必隆之剑,送往军前,赐令自裁。

战将之间关系不和,互相推诿,军心涣散,前线战局丝毫没有进展,空耗财力、人力,两员朝廷命官接连获罪。乾隆在震怒之余,也在考虑相应对策。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上谕,任命傅恒为经略大臣,暂管川陕总督,寻授保和殿大学士。

从史料及《傅恒宗祠碑》记载上分析,乾隆选派傅恒是有深意的。第一,在大金川战役不顺利之初,傅恒就曾上奏请缨参战。《傅恒宗祠碑》记述:“大学士公傅恒,夙夜宣猷,襄赞机务,前因金川番蛮不靖,丹诚奋发,自请督师”。傅恒正当血气方刚的年龄,尚未建立过战功,在维护满清皇叔利益上是义不容辞的。对于傅恒的请求乾隆帝自是欣慰,然而他对人事安排上自有想法。讷亲是前朝旧臣,乾隆帝即位之初,认为讷亲勤慎可托,厚加信任。《清实录》载乾隆帝谕:“……傅恒即曾陈奏,愿效前驱。朕以封疆大吏自能办理,不必特遣大臣。即应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讷亲之先,未经俞允。……”^⑩可是讷亲辜负了乾隆厚望。退缩不前,还终日在营帐中饮酒度日,奏章也是空洞乏力,前后矛盾。及至传谕询问,有召其回京的意思时,讷亲有“如获更生”之感,赶紧回奏有面陈情节,亟欲回京。讷亲临阵退却的情形有损统治阶级形象,使乾隆无法向满汉大臣们交待。与之相反的是,群臣之中只有傅恒勇于任事,信心十足。乾隆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第二,从关系上说,傅恒是乾隆的妻弟,即所钟爱的孝贤纯皇后的胞弟。在王权绝对集中的时代,有谁能比傅恒更值得乾隆信任。在远离中央的地区谁能在处理边疆事务上绝对服从中央的指挥。在这诸方面,傅恒自为首选。第三,派遣傅恒,给他创造建立军功的机会,亦是对其皇后的慰藉。据史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及孝贤皇后东巡至德州,帝在舟中召歌舞伎饮酒作乐,皇后闻之,恐因此而招非议,至帝舟中进谏,言语激切。这时,帝有些酒意,借酒辱骂皇后,皇后羞忿返回自己船上,途中失足落水而死。乾隆酒

醒后深悔不已。为此还兴起了牢狱之灾，乾隆身为天子，后宫佳丽如云，但是他毕竟与常人一样，有血有肉，有亲情，有爱恨，对于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结发之妻的感情自是深厚。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把这种爱缘及皇后的亲人身上，以弥补他心中的悲痛。正像昭槠评价的，傅恒是“受椒房之优宠”。^①第四，傅恒办事勤谨，为人忠厚谦和。鼓舞前线士气、处理将官之间的关系上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上谕：“……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则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际此戎马未息之时，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谅亦心所不安，况军旅之事，乃国家所不能无。满洲大臣，必历练有素，斯缓急足备任使，傅恒著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一切机宜，悉心调度，会同班第、傅尔丹、岳钟琪等，妥协办理。”^②

《清史稿》载：“乾隆十三年九月，命傅恒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十一月三日，傅恒自京师起程，乾隆亲诣堂子告祭，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啸亭杂录》中对傅恒的出行有详细描述：“傅文忠临行时，上亲祷明堂，张黄幔以宴公，亲酌之酒。命于御道前上马，设大将旗鼓，军容颇肃，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观者”。这不仅仅是乾隆重视这次平乱，希望早日听到捷报，更主要的是设立这样铺张的场面为傅恒树立威信。十一月二十四日，傅恒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四川境内。乾隆随即以傅恒师行甚速，纪律严明，命议叙，部议加太子太保，特命加太保。又赐双眼孔雀翎。傅恒到达金川之后，乾隆以金川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为由，赐傅恒人参三斤。即使在乾隆打算主动撤兵之后，仍然封傅恒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频频加恩，是进一步确立傅恒在军中的地位。

在傅恒接替讷亲之前，乾隆就盘算着克敌的办法。他回想清军起兵之初，清太宗皇

太极依靠八旗劲旅蹶云梯登城与明军展开白刃战，破明军十三万，以少胜多。如果今天以这样胜勇的军队和勇气攻碉，何碉不克？终于决定在北京西山附近仿照敌军寨样式，依山筑石碉六七十座，选精壮武勇之人按照八旗编制，每旗设碉楼若干，每天历练攻碉之术。终于训练出一支精练有素的云梯部队。地点就在香山团城演武厅一带旧址。大金川战役结束后，乾隆在此设立了健锐云梯营。并在碉楼附近修建实胜寺，立碑以资纪念。目前演武厅犹存，碉楼群大多早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千亩果园。但散见于其附近的个别碉楼仍偶尔可见。

傅恒率领着这支二千多人突击队以及增派的东北各地三千多清兵，诸行省调拨的满、汉兵共计三万余，并军饷四百万白银，内务府又出白银十万作为犒赏将士之用。傅恒在至军营途中密令副使马良柱以迎接经略大臣为名，将良尔吉调出土兵大营。次日，将良尔吉带往相距卡撒军营十五里的邦噶山，傅恒面数其罪，枭首军门。傅恒在了解前线情形之后，上疏乾隆帝：“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炮不能洞坚壁，于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③傅恒到达金川两个月之后，计划还未实施，上谕下：“……傅恒此行本欲得勒乌围、刮耳崖，擒莎罗奔，荡平贼境，慑服群番。……然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恒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是恒已目击而心知之，且一再试之。……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半年辨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金川小丑实所谓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何值如此办理。……”^④乾隆遂以其母皇太后息兵宁边之谕，命傅恒班师还朝。

无论是从乾隆后悔用兵不当，耗费粮饷，克捷无期考虑，还是从他连失两员大臣，

不愿朝中“第一宣力大臣”再有闪失来看，都要决意收兵。

在傅恒出兵不久，就接到一道上谕：“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经费实亦难乎为继矣。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可一举而迅奏肤功，诚为国家大庆，倘万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未遽扫穴犁庭，一过春期，经略大学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岂可久劳于外，且入夏雨多，进取非便，而京兵不耐水土，又岂能暴露蛮荒，驻待秋晴攻剿。况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资之糜费，尤为非计。……朕意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亦未始非两阶干羽之遗意。”^⑮对于乾隆来说攻打金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借这次平叛的机会，新培植一批效忠于皇帝的亲信党羽；对于傅恒来说，以这次出兵为契机，建立功勋是主要的。

前线情势在傅恒到来之后正有转机。傅恒率领一路清军采取不与叛军争碉，只是四面包围，乘其外守严密，内部空虚，出其不意，直捣巢穴之计，连克右山梁下巴郎平碉及色尔力石碉；岳钟琪率领四路人马驻扎党坎，四面皆为敌军碉寨，碉碉相连，寨寨相通。起初，清兵连续出击不利，多有惰志。岳钟琪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募健勇数千，声言攻康八达，而暗遣精锐直取跟杂，出其不意，连克敌军碉卡四十七处。乘势进攻葛布基，又督军直逼勒歪隘口，于康八达碉前囊土为城，运粮以备攻碉之用，等到夜晚，士兵持喷筒鸟枪四面埋伏。敌人果然中计，乘夜抢劫清军粮草，这时埋伏四周的清军枪筒齐发，敌人死伤无数。

清兵连克数碉，军威大振。莎罗奔父子原只想争夺邻近土司地域，又屏借碉坚地远抗拒清廷，盼望清兵知难撤兵，并无深谋远虑。此时清军锐不可挡，设在清军中的内应又被除掉，后方的人力、财力毕竟有限。更无取胜的把握。当年岳钟琪征西藏时，莎罗奔曾是军中一小头目，与岳钟琪是旧相识。于是派使者向岳钟琪请降。《啸亭杂录》生动

地记载了这段受降过程：“傅文忠公命岳公来会师，岳公乃袍而骑，从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贼巢，莎罗奔等稽顙膜拜，衷甲持弓矢迎。公目莎罗奔，故缓其辔，笑曰：“汝等犹识我否！”众惊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请降，争为前马，导入帐中，手茶汤进。公饮尽，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群番欢呼，顶佛经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帐中，公解衣酣寝如常。次日，莎罗奔率子郎卡入傅文忠公营投降。进得元帅大帐，傅恒升幄端坐，岳钟琪戎服佩刀侍立一旁。莎罗奔大惊，出帐说道：“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这段描述难免不有刻意粉饰的成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岳钟琪在十三年五月任职前往金川，良尔吉、王秋等奸细还在营中，像这样大的举动，莎罗奔会不知道？为何傅恒誓师金川之后，莎罗奔就有请降的行动呢？实际上是密令岳钟琪宣谕招降。大金川乞降，也并非震于天朝威德。莎罗奔虽然投降，却更加藐视清廷，日渐桀骜难制，终于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又兴兵劫掠周围各土司。

对于凯旋的将士自是有一番嘉奖。晋封岳钟琪为三等公，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傅恒四团龙补褂，^⑯晋封一等忠勇公，照勋臣额宜都、佟国维之例，敕建宗祠，赐第东安门。

为功臣敕建宗祠，自顺治十一年始，各朝仅有几人受恩。至乾隆朝，傅恒是第一人，而且傅恒在出征之前，毫无战绩可言，乾隆就有为其建宗祠的愿望，^⑰可见对这一臣子优宠倍至。而且恩及傅恒上三代，均追封为公爵，妻俱追封为一品夫人。特意批准建正祠五间。

这次大金川之战，历时两年多，消费白银一千多万两，调动七省之师，征调兵役达二十万人。此役是因大金川恃强劫夺，在局部地区造成混乱，但其力仅能自守，而不能出击。清军停战对大局并无影响，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旷日持久，徒然耗损国力。乾隆认识到收兵的必要性，选择傅恒解决了金川问题。傅恒因大金川之功得到显赫殊荣。

皆大欢喜的结局淡化了乾隆军事措置上的失误。

傅恒宗祠碑详细记录了因大金川之战，乾隆为其敕建宗祠之事。《清史稿》中缺少关于为傅恒建生祠这样详细的记录，对《清史稿》列传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研究傅恒的中外学者来说，这通《傅恒宗祠碑》无疑是重要的历史实物佐证。

《傅恒宗祠碑》录文如下：

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人子报本之忱，必念尔祖；国家酬庸之典，爰及所生。大学士公傅恒，夙夜宣猷，襄敷机务，前因金川番蛮不靖，丹诚奋发，自请督师。维时朕以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钟庆树涂，朕辉懿戚，悉由乃祖、乃父积厚流光，诞兹良弼。陞辞之际，朕欲加恩，赐立祠堂，秩于祀典。大学士公傅恒奏称，臣仰蒙高厚，荣贲先人，实出至愿。如果凭仗天威，肃清荒徼，凯旋之日，拟当恳请殊恩。今威信远孚，番酋效顺，肤功克奏，美著旂常。宜考懿章，以示优锡。其照勋臣额宜都、佟国维之例敕建宗祠，春秋致祭，增光俎豆，用奖忠勋。著该部即遵谕详议具奏。钦此。经礼部议称，锡类以展殊勋，彝章聿著，推恩而颁特典，秩祀增荣。益者太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禀承圣谟，牧宁边徼，皇上嘉乃丕绩，恩乃所生，念其祖、考忠贞衍庆，令臣详议祀典，敕建宗祠。臣等查得，大学士公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汉，父李荣保，前蒙特恩，均追封公爵，妻俱封为公妻一品夫人。应请照例建立正祠三间，各设暖阁，按昭、穆安设神主；大门三间；东西两庑各三间，一为宰牲及供办祭品之处，一备守户居住。每岁春秋遣太常寺堂官读文致祭，祭祀牲、果、酒、帛等项，交太常寺备办，盖造祠堂暨一切祭祀应用器皿交工部造办，牌位匾额及祭文俱交该衙门撰拟。祠宇落成，翰林院撰祭文，太常寺备祭品，奏遣大臣读文致祭一次。如此，则堂宇轮奂，祭祀适时，允足以示隆恩而昭懿典矣。于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题准，又于四月初十日，工部奏办建立宗祠房间工料。奉旨：正祠著盖五间。钦此。

①此碑曾立于傅恒家庙，1986年迁移石刻艺术博物馆。傅恒家庙位于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1934年其家庙及府第（松公府）作为北京大学地质馆址，曾由梁思成、林徽音共同设计建造了一座西式三层小楼。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0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②昭槎《啸亭杂录》记载：副将马良柱转战沃日，收复小金川，直抵丹噶，如果张广泗乘叛军防范未严快速出师，还有取胜机会。然而张广泗不仅坐失良机，在马良柱乘胜攻克孙克逊，叛军具稟请降时，张广泗又毁书辱使，务期捣其巢穴。并想治马良柱之罪，乾隆命将其押解回京。

③《圣武记》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④訥亲，《清史稿》有传。

⑤岳钟琪，《清史稿》有传。康熙末年，随年羹尧征西藏有功。雍正十年，征准噶尔，因别将迟发，贻误战机，受大学士鄂尔泰等参劾，至使被革职削爵。另一种说法是传言岳钟琪为年羹尧复仇，将起兵叛清，因而获罪。乾隆十三年起用，时年六十三岁。

⑥⑦《啸亭杂录》卷一。

⑧⑨庄吉发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四章第二节。

⑩《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六，乾隆十三年冬十月壬午朔。

⑪昭槎《啸亭杂录》

⑫《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五，乾隆十三年九月己卯。

⑬《清史稿·列传》卷八十八。

⑭《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六，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

⑮《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乙卯。

⑯四团龙补褂，旧制，同族封王者，皇上赏赐才能服用。异姓初无赐四团龙补服的，雍正中，年羹尧特赐四正龙补服，不久即以骄败。乾隆中，傅恒平定大金川、北惠平定西藏、阿桂平定两金川、福康安平定台湾，皆赐四团龙补服。

⑰碑文记载：“陞辞之际，朕欲加恩，赐立祠堂，秩于祀典。大学士公傅恒奏称，臣仰蒙高厚，深贲先人，实出至愿。如果凭仗天威，肃清荒徼，凯旋之日，拟当恳请殊恩。”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助理馆员）

灵严寺大殿修缮工程概述

——灵严寺大殿构造简述及其年代初探

李小涛

灵严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乡齐家庄,距北京市 108 公里,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寺庙坐落于齐家庄村东,坐北朝南,北靠青楞山(当地人称凤凰山),南临清水渠。据寺内残留明朝成化年及嘉靖年间碑文记载,灵严寺创“建于唐武德年间,明永乐丙申,有张氏女生而灵异,落发为尼,居民为重建。”《宛署杂记》载,该寺院原占地七亩,内有天王殿、佛殿、伽蓝祖师殿、厨房等。现寺院仅存佛殿一座。从佛殿的建筑结构形制等方面考证,其建筑手法及用材等与周边(包括山西境内)遗存的元代木结构古建筑类似。可以说,灵严寺是北京地区所发现的现存文物建筑中,较古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厅堂建筑之一。此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经诸方努力,1997 年北京市文物局拨款对该佛殿做了保护性修缮,并对某些部位做了复原性维修。

一、大殿建筑结构及现状分析

1. 平面

大殿的台基,筑于自然走势的山脚下,台基前高后低。前高 0.32 米,后与院地平等高。

大殿面阔三间(12.6 米),明间 4.6 米,次间 3 米;进深三间(10.6 米),前后檐柱距金柱 2.05 米,两金柱间距 4.2 米。宽深比约 6:5。从梁架结构等方面分析,大殿原有

进深为两间,前金柱是后人为加固四椽袱而设。山面中柱置于前后檐柱中心。大殿原有的柱网排列,除将明间面阔增大外,室内金柱也向后移动,此种排列方式,实为加大室内主要活动空间,以满足于建筑的使用功能。这种移柱造及不均等间的构筑形式,盛行于金元时期,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实例很少。殿内所有柱均有不同程度的收分,尤其室内金柱最为明显。金柱高 4.62 米,柱根直径为 0.44 米,柱头直径 0.35 米。柱径与柱高比为 1:10.5。大殿前后檐柱高 3.29 米,前檐柱根直径为 0.39 米,柱头直径 0.36 米。檐柱径与柱高比为 1:8。殿内所有柱(新增设的前金柱除外)头,有复盆式卷刹。柱础形制,墙内不露明柱础,都使用不规则石料,露明金柱及明间檐柱底部都有厚 6 公分的圆形木料,与埋入地平之下的不规则石柱础相接。此种木质材料,似为早期的柱槓。

2. 斗拱及材枋分析

大殿外檐斗拱为斗口跳。除柱头铺作外,各用补间铺作一朵,共计斗拱 10 朵。大殿斗拱形制较奇特,每朵斗拱在十字相交的拱下有小拱头,似为加长十字拱的长度,以悬挑深远的出檐。此种斗拱做法,山西应县木塔最高层有之。大殿斗拱宽 12.7 公分,高连同小拱头 28.5 公分,其中小拱头高 7.5 公分,拱高 21 公分。所有斗均有幽度。金檩枋与檐檩枋在每间中部垫有散



修缮前的大殿整体木构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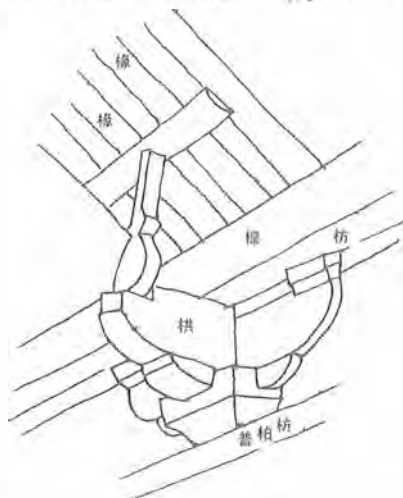
修复后的大殿全貌

斗。坐于攀间枋或正心枋上。柱头铺作后尾无小斗,直接支撑四椽栿或割牵。补间铺作后尾于栿上支撑高 10.3 米,厚 0.6 米。形立柱,立柱托起半椽径的弧形条木,载于四根椽挡下。立柱上下均有榫卯与邻近构件连接(图一)。此种做法,用以与前升平衡,在同类建筑中是没有见到过的。

灵严寺大殿属三间厅堂建筑,以宋《营造法式》“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的规定,应当使用五等或六等材,即材高 6.6—6 寸(宋尺。折现尺寸应为 21.1—19.2 公分)、材厚 4.4—4 寸(折现尺寸应为 14.1—12.8 公分)。此殿实测数据,材高 21 公分(以高十五分之,每分应为 1.4 公分),材厚 12.7 公分,基本符合《营造法式》用材要求。

3. 大木构架



大殿结构形制,属宋《营造法式》中的厅堂建筑。它的主要结构是梁柱,斗拱只是在外檐部分和梁栿交接点上使用,不做为结构层。室内梁架,为《营造法式》厅堂建筑图样的“四架椽屋分心用三柱”。脊檩下用叉手、丁华抹额栿、蜀柱、合楹置于平梁上。平梁前端上承金檩,下用大斗,毡笠驼峰支于四椽栿上,后端下为大斗,大斗坐于金柱头上。四椽栿后端插入金柱内,与后檐割牵相接,下用榫头承托。四椽栿前端及割牵后端分别插入前后檐斗拱内,与挑檐檩相撞。次间梁架,平梁以上同明间梁架,平梁以下由中柱承大斗。横栿支顶平梁。前后乳栿、榫头、小栿头与中柱榫卯连接,似为穿斗构架。大殿纵向构架,除用桁及枋做为联系构架外,金檩下施攀间枋两道,脊檩下用一斗三升攀间斗栿及攀间枋一道,明间最下一层攀间枋,使用原有不经加工的圆木插入金柱头。檐柱头阑额普拍枋构成 T 字形,阑额高、厚为 18×7 公分;普拍枋高、厚为 9×20 公分。大殿主体梁构架,截面为  形。平



图一

梁截面尺度为 37×21 公分,高、厚比例为 3:1.7;四椽栿高厚截面尺度 46×32 公分,高、厚比例为 3:2.09。大殿木架材质,为枣皮松、黄花松、油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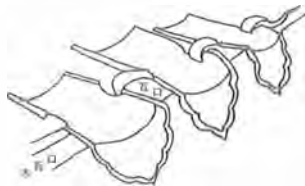
4. 屋面

大殿屋面形制,未经修缮前为硬山顶,后檐无飞椽。修缮中在拆除山面墙体后,露出大木原本悬山的结构体系,四角柱头斗拱约二分之一被墙体包围,斗拱以上各檩枋被锯掉。屋面瓦件,滴水瓦及当沟瓦较有特色,当沟瓦成  形;滴水瓦在腰际开卯口,与  形木瓦口榫卯相接(图二)。屋面兽件荡然无存。正脊中部有脊刹底座。大殿屋面椽上铺设砖望板,而前后出檐部分铺木望板。上檐木构架,前后挑檐檩中距 9.09 米,屋面举架坡度为 1:3.96。

5. 彩画

大殿外檐彩画,总体感觉是不拘格式。两次间外檐彩画为包袱式苏式彩画,绘制多个表情不一的人物头像。明间各檩枋绘制龙凤枋心,阑额盒子绘有人物做工等画面。内檐彩画为龙锦枋心彩画。内檐横向构件,只绘枋心、旋花找头及箍头,无盒子。后檐外檐彩画均已无存。内外檐斗拱彩画使用退晕做法。彩画的绘制,没有厚实的地仗,绘制图案内容较随意,并使用沥粉手法,似为清末民间特色做法。

综上所述,该建筑断代应为明代早期。因地处偏远山区,主要构架未能脱离元代



图二

构筑遗风,尤其是用材方面,更具元代建筑特色,例如个别枋柱使用原有不经加工的原材料;墙内不露明柱础,使用不规整的石块等。本次修缮,主导方针为保持现状,恢复原状。在施工过程中尽可能地使用原材料和原工艺。

二、工程维修项目

在对大殿勘测并加以分析后,认为灵严寺大殿是一座具有早期特征的建筑。它不同于北京其它文物建筑的统一格式,结构及制做手法具有自身的特色。它与周边留存的几处古建筑,如清水双林寺伽蓝殿(金元时期的建筑),斋堂北山区灵岳寺(明清建筑),在制作手法及用材规格上都有相似之处。因此对大殿的修缮,决不能类同市区的官式建筑,应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各历史时期的信息量。对于经过百年考验的基础工程,更没有必要重新开槽砌筑。

本次工程,分为加固和复原两项内容。

(一) 加固项目

1. 台明

修缮前的台明,仅前檐露出地平 32 公



剔补柱下角

分,由于地势走向,后檐院地平几乎与室内地面等高,加之长年累月的积土,整个庙宇院落低于西部地面。为使修复后大殿原始基础不被破坏,院落排水必须畅通,因而修缮中将两山及后檐台明依照前檐制作手法给以复制,并作出散水、排水沟等。室内地面,重新按原有方式铺设,缺损方砖依照现遗存规格(34×34公分)补配。

2. 立柱

所有立柱 12 根,均为原物使用。其中有 8 根下脚外皮有不同程度的糟朽。施工中采用剔槽镶补法修补。

3. 梁架

除归按拨正。除后檐东西次间挑檐檩糟朽严重做了更换外其它均原物使用。另更换斗 16 个,修补 7 个。整座大殿仅对两次间梁架中柱与乳栿间拉结铁活加固。

4. 屋面

屋面修缮基本使用原有瓦件,残缺者依照原样做了烧制。原有吻兽,没有找到一丝历史纪录,因此根据《威尼斯宪章》的维修原则,做成清式吻兽,脊利用方砖磨制叠涩做成塔形。屋面原有砖望板,全部铺在金檩以上,金檩以下补配使用木望板。经统计,屋面更换新材料,瓦件:20%;椽:45%;前檐飞椽:70%。

5. 油饰彩画

彩画维修原则为原样保留,不再重新绘制。新更换构件,只做木材的保护性油饰。修缮过程中,保护内外檐油饰彩画的同时,将前檐彩画外表泥污清洗。补配新木材及山面复原后露出的梁架,先用桐油钻生一道,然后依建筑后檐柱枋露明处原有色泽掺入桐油再刷第二道。

(二)复原项目

1. 山花出际部分

修缮前建筑的硬山形式与大木结构极不协调。修缮时在山墙拆除后露出纵向构架的端点,除斗拱以下各构件保留原有完整形制外,斗拱以上各檩枋都有被锯毁的痕迹,以此断定大殿原建筑形制为悬山式。复原过程中,原有檩枋均有被利用的价值,因此采用榫卯及铁板拉结加长。加长尺度根据宋《营造法式》及参照周边建筑的地方特色换算而来,并配备悬山处的搏风、悬鱼、荻草等构件。

2. 后檐飞出

大殿原有上出檐,前檐为 164.5 公分,其中椽出 120.5 公分,飞出 44 公分;后出檐为 124 公分,无飞子。此种做法,纯属为适应硬山式封护檐而设。复原后的悬山式屋顶的大殿,后出檐依据前檐挑出尺度修复。

3. 装修

修缮前的大殿门窗格式,似同地方民居形式。修缮中根据同期庙宇门窗式样,做了复原性维修,原有槛框保留使用,窗成直棂窗,门成四扇格扇门。

三、工程评估

灵严寺大殿于 1998 年 6 月修缮完成。新的殿座恢复了原有的建筑风貌,外表与结构保持一致,纵向构架的端点有了交待。同时由于修缮过程中工程人员的科学态度,除对大殿日后保护采取一定措施外(如排水系统畅通等),新殿座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有结构或构件,使其不失历史文物价值,使研究北京地区建筑史实物得到妥善保护。

(李小涛执笔,熊炜、李小涛制图及摄影)



玉璧鉴赏

李宏

中华民族用玉的历史之久远,是使用任何器皿、器具都不可比拟的。在古代历史上,上起君王下至庶民都有用玉、佩玉的习惯,其用玉之久、视玉之尊、选玉之严、治玉之精都可称之为“最”。玉璧则是玉器中最为常见且流传最久远的器型之一。人们最早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开始使用玉璧了。

玉璧是圆型片状的器物,中间有一孔。《尔雅·释器》中对玉璧、玉瑗、玉环的形状有详细的记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其中所谈的“肉”指的是玉质部分,“好”,指的就是孔。玉璧是礼器中的“六瑞”之一。古人用璧礼天、等贵贱、享赠、辟邪、敛尸。古代用苍璧祭天,因为天是“苍天”。苍璧的玉色是青色,用青色意取其色象天。玉璧也被用于祭山林川泽。古代人把玉璧佩带于身上,用来表现人们的品德、操守,另外也显示不同人的财富、等级,故此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说。在商周时代,除了公、侯、伯爵持圭朝见君王之外,子爵、男爵则需分别持谷璧和蒲璧了。在古代,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也常在礼品单中列入玉璧,其目的是以赠玉璧修德结好。人们佩带玉璧还有避邪的功用,佩带玉璧的人可以免受雅恶、病患的侵袭。死后人们仍然用玉璧陪葬,既表明死者生前的地位、德行,又保佑死者入土后平安。我们从大量古墓葬的发掘中可以看到,玉璧大都在人骨架近旁,有时是与玉环、玉璜等玉器组成串饰,佩带在死者胸、腹及膝间。^①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人们用于避邪佩带的玉器造

型比较多了,佩带玉璧的方式也比较简单了,有的就单独系挂在腰间。

随着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表现在玉璧上的风格也不断地变化。特别是在造型、纹饰方面都相继发生了改变,体现出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

最早的玉璧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在我国辽宁西部的阜新地区胡头沟墓地、三官甸子墓地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玉璧。^②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等地都相继发现有玉璧出土。当时的玉璧无论从用料的质地、治玉的造型都与今天我们常见的清代玉璧截然不同。当时所用的材料多为蛇纹石、阳起石类的半石半玉材料。这些材料一般为青灰色,有的由于长年埋于地下受到浸渍,表面呈现白色或黑色浸痕。璧体也往往薄厚不均,外型也不够圆,璧孔也往往不规则,有的孔并不在璧的中心。璧的内缘部分稍厚一些,而外缘部分比较薄,像钝刀一样。玉璧的表面也不是平的,而是呈微弧状。这时期的玉璧基本上光素无纹饰,有少数留有一、两道锯痕。尽管如此,也已经使我们看到当时原始先民们已经能够掌握开片材、钻孔、抛光等技术了。

商周玉璧用料有青色、红褐色。青色玉璧的玉质较为细腻,表面光滑,有时也呈现褐色斑。红褐色的玉璧,玉质较粗糙,璧体有厚重一些的,也有薄些的。商代玉璧无纹饰的多。周代玉璧中直径大的光素的多,直径小的纹饰精美。这些纹饰以龙纹、凤纹为多,还有鸟纹。纹饰雕刻的方法主



周代玉璧



周代玉璧

要是以阴刻线托出阳刻线。阴刻线还有单线、双线之分，雕刻的刀法纯熟流畅，纹饰的线条柔美，回旋圆润，每条线从开始到结尾都是来得优雅、去得尽情，纹饰的走向基本上都是弧线。表现动物纹饰的眼睛非常形象，眼珠为双阴刻线圆圈，外廓以美丽的勾型眼眶；龙凤的身上还刻有鳞状双重环纹，首尾相缝，尤其凤的尾部甚至翻翘到凤头之上，看上去精巧秀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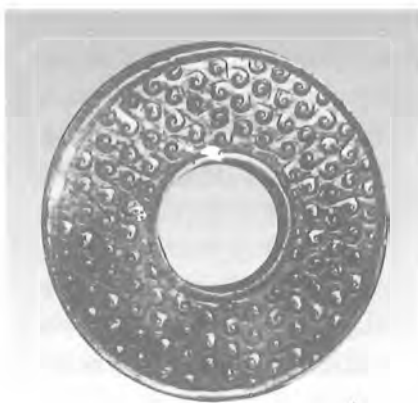


周代玉璧

经过春秋时期承上启下的过渡，战国时代的玉璧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在选材方面除继续用青玉之外，开始较多地用白玉。璧体比以前薄了许多，甚至有的直径约一尺的大璧，其厚度也不足一厘米。在玉璧的制作方面，比以前更加精细，璧面打磨得十分光亮，由此更显示出玉的坚硬、古朴、典雅的美。雕琢玉璧地子时，在内外边缘处还留有一圈立墙，用手摸这圈立墙时会感到它的锋利，其刀法之娴熟，更突出了战国璧的冷峻之美。这一时期，许多璧的轮廓上方还沿伸出了雕琢精美繁缛的龙纹、蟠螭纹、兽纹等装饰；这些动物装饰生动而富有活力，尤其是静中取动，令人回味无穷。这时期玉璧上的纹饰也丰富起来，有谷纹、蒲纹、各种变形云纹、龙凤纹、蟠螭纹等。谷纹是一种将璧的地子铲平之后留下突出地子的小颗粒。战国谷纹每个颗粒都打磨得工整、圆滑，和它的边缘一样，用手摸这些颗粒，会感到似乎有尖。颗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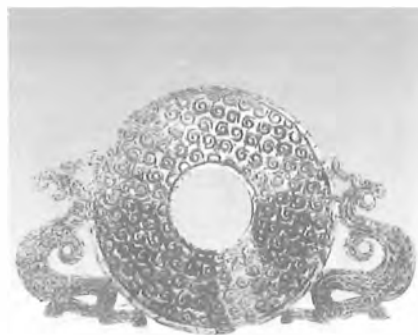
周代玉璧



战国卧蚕纹璧



战国谷纹璧



战国出廓璧

布局是均匀、密集的,颗粒之间没有打格的痕迹,说明碾玉的技巧精湛且功夫到位。另外,还有一种谷纹,也被称作卧蚕纹,即在谷纹颗粒旁出芽,就像蝌蚪身后的小尾巴,尾巴上有一阴刻线,故有时也被称之为蝌蚪纹。这种谷璧多用于祭天地。蒲纹则不同了。它不是一颗颗圆型的颗粒,而是一个个六边形的小鼓钉,虽然地子上没有留下明显的打格痕迹,但从鼓钉排列之整齐、密集的情况看,也是先经过打格后再琢磨的,但地子处理得比较平整。战国璧上还出现各种变形云纹,有的云纹之间有双线、单线互相连接,有的互相之间不连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云纹,这些云纹有突起的减地阳纹,也有简单阴刻线的,更为常见的还有像英文字母“S”形的曲线纹饰。这种纹饰在战国其它玉器上也颇为盛行,在陶瓷器、青铜器上也经常可以见到。战国璧上的龙纹、蟠螭纹、凤纹、兽纹等,其特点和战国其它器物上相同的纹饰一样,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般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汉代璧

汉代玉璧总的特征是大。大器形、大纹饰、大线条。大型的玉璧比战国的略厚,谷纹、蒲纹颗粒比战国的,而且比战国的稀疏。地子也琢磨得不够精细,一般都留有打格的痕迹,另外,汉代玉璧采用镂空雕法的也比较多。

魏晋南北朝至隋灭陈统一全国,中国

社会经历了约 400 年的战乱历史,政权频繁更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社会经济文化都遭到很大破坏。这时期相继出现的少数民族内迁、民族矛盾和战争以及民族的融合,都对汉族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化方面,人们冲破了儒学独尊的束缚,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同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也已经开始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并强烈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礼教。这使得传统礼器也自然受到了人们的轻视,无论从传世或出土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玉璧比较少见,故其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到了唐代,玉璧又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纹饰方面也比以前更加丰富多样了,奇花异草、飞禽走兽都成为玉器雕刻的题材。常见的表现方法为一面是谷纹、蒲纹,一面是兽面纹、蟠螭纹;也有一面为兽面纹、蟠螭纹,另一面为花草纹。在纹饰的雕刻技术方面,也表现得刀工纯熟、线条流畅,用较粗的阴刻线雕轮廓,用细阴刻线陪衬,线条有时并不连接,但是它的走向趋势使雕刻的创意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使人感受到一种美的满足、美的尽兴。玉璧上的谷纹也与这时期的特点相一致,细小柔和。轮廓不十分清晰,但打磨十分精细、光亮。玉璧上的云纹也变化多样,大都是阴刻线,无论变化成何种形态,总的风格是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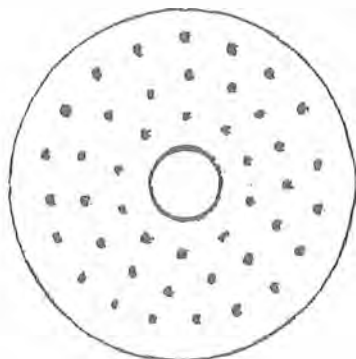
展、柔和、流畅。有的云头之间还有花蕊样的装饰纹。带有蟠螭纹的玉璧,蟠螭纹呈半浮雕形式,身上以阴刻线表现各部位的细节。比如以一道阴刻线表现蟠螭的脊椎,由颈至尾渐细,用粗阴刻线表现眼睛、额毛,以涡纹(或称卷云纹)表现四肢的肘关节部位。关节以上丰满肥硕,关节以下细小无力,尤其是小爪子常由简单的四道小阴刻线表示,与其矫健、柔美的身躯相比显得不太相称。蟠螭的尾部也较粗大、有力,尾尖卷曲起来,有单尾,也有分叉向两边卷起的双尾,尾上刻有阴刻线绳纹。兽面璧的眼睛风格和蟠螭璧差不多,也是粗阴刻线轮廓上有细阴刻线的毛,用涡纹表现耳朵眼、鼻孔,兽的角也长而较粗,角尖卷起用一道粗阴刻线表示,兽瞪眼龇牙,和常见的唐代镇墓兽的风格相似。

宋代玉璧在风格上较前代有所改变,多带有汉代风格,在器形上比较明显的是璧的边不见棱,从侧面看上去呈弧形,而不是像以前呈方形。另外,虽然谷璧的谷钉与唐代相似,但却不如唐代的那样柔和。其它如云纹、蟠螭纹等纹饰上,虽然带有汉代风格,但与之相比汉代的线条粗旷简单,宋代的略有添加,更趋向于逼真。

元代的玉璧器形厚重,多是系璧。白玉璧器形较薄,一般为一面光素,另一面有纹饰。元代玉璧上常见的纹饰有谷纹、蟠



唐代龙纹璧



明代玉璧

螭纹、兽面纹。谷纹的谷钉比较大,比宋代的稀疏。蟠螭纹有正面、侧面,中含灵芝或嘴吐祥云,并有立体感,但雕工的味道粗糙一些。明代玉璧形式变化较大。这时的玉璧主要为佩带之用,礼仪规格也不似先前那么鲜明。玉璧的用料以青玉、白玉居多,碾玉光泽明快,特别是有的作品利用玉料的皮色,巧妙地琢成凸起的蟠螭纹及浮起的谷纹,具有俗称俏色的效果。大形璧比较少,但碾磨得比小璧精细。明代玉璧的璧孔棱角处磨成略圆状。谷纹雕刻方法如同明代玉器中龙纹的眼睛,是用管钻琢磨,再剔去地子使谷纹突出,故此谷钉比较圆。明代也有一类不太规则的谷钉,看着似圆似方,谷钉高而且稀疏。另外,明代玉璧上的纹饰还出现了八卦纹。



清代玉璧



清代玉璧

清代的玉璧从用料到纹饰,多种多样,但以乾隆时期的为最好。乾隆璧无论从选材到雕刻,都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以羊脂玉为材料的璧,雕刻更加精美。这时的璧除了传统的半浮雕样的蟠螭纹、谷纹、蒲纹、云纹等之外,还有几条线并列转折或称之为“阔带”组成的几何图案。从雕工看,蟠螭雕得比例匀称,姿态矫健、优美,地子平滑,蟠螭的背上起脊,脊的正中有一道阴刻线从颈至尾,将螭身明显地分出了左肋右肋。也有少数脊背正中没有阴刻线的,但脊背正中仍高起,用手摸有棱。有一些玉质也白,但蟠螭趴着,背部不起棱,圆而且较矮,这样的璧年代就稍晚一些了。

清代中期、后期的玉璧也很多,材料有白玉、青玉、青白玉、少量的碧玉、云玉。总的质量不如以前,虽然其中也有雕工精细的,但多数都不如乾隆时期的好。纹饰方面也很多,有一面蟠螭纹一面谷纹、一面谷纹一面蒲纹、如意云纹、卷书云纹、几何纹等。还有的只以简单粗糙的阴刻线雕的龙纹、凤纹、云纹等。尤其到了清末、民国初期,工艺水平越来越差,加上使用劣质材料,大多数玉璧已经失去它应有的美感、质感而变得俗不可耐了。

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鉴赏玉璧不能孤立地去看,要和各朝代的时代风格结合起来,特别是表现在所有玉器上的特点。同一时代的器物都有它的共性,比如商代兽的眼很像汉字的“臣”字,我们称臣字眼,不仅表现在兽面上,商代的鸟纹、人纹等的眼都是“臣”字眼,在鉴别时首先要记住各时期的特点,并要多看实物,这样由一般到特殊,再由特殊到一般,循环往复,那么,掌握鉴定知识就不会感到很困难了。

① 贾峨“关于河南出土东周玉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83年第4期。

②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公司振环阁门市经理)

北京市文物局
1998年四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10月5日 就罗哲文等专家提出保护粤东新馆的呼吁,完成关于粤东新馆迁建保护工作的说明,并向市政府作了专题报告。

10月6日 协助市文研所与京沈高速公路指挥部签定考古勘探发掘协议书,随后,文研所开始进行通县段的考古发掘工作。

鲁迅中学修缮工程通过验收。

原荷兰大使馆旧址修缮工程开工。

10月7日 原意大利使馆爱黎楼修缮工程开工。

10月9日 雍和宫佛像保护贴金项目开工。

10月9日至14日 组织专家对智化寺、十三陵、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的近2000件藏品进行了鉴定。

10月10日 在平安大街工程施工中发现西压桥遗址。

市文研所对其进行了清理并留取资料。

11月3日 市建委在平安大街指挥部召开“西压桥”各方协调会,会议一致决定原址保护桥址,市政管线绕道施工。

10月12日 国家文物局陪同世界遗产基金会副董事约翰·斯塔布斯先生,在先农坛座谈了有关基金会向中国文物部门捐助事宜。座谈后参观了具服殿、观耕台等处。并对先农坛内部的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10月14日 市文研所完成对颐和园元代耶律铸墓的发掘工作。颐和园管理处委托清华设计所进行墓葬保护的方案设计。

10月21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潭柘寺修缮工程开工。

10月15日 召开局级立项课题《北京契约文书汇编》阶段成果汇报会。承担该课题的首都博物馆向与会专家、有关方面领导作了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专家、局科研部门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

10月16日至11月26日 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北京市优秀青少年教育基地考评工作,并对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市档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17家博物馆进行了考评。

10月19日 完成对《珍贵文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工作。

10月19日至20日 分别召开局属各单位领导、区县文化文物局主管局长及国保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安全工作会,布置了冬防及对市级以上文保单位整改隐患工作。

10月20日至22日 组织博物馆专家对要求登记的中国保利艺术馆、中国邮电博物馆、海淀上庄乡纳兰性德纪念馆、东方模型博物馆、北京民俗博物馆进行了考察,并于11月5日召开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专家会议,审评以上博物馆的资格。

10月23日 协助市文研所与房山区文化文物局签定黄土坡新村搬迁工程考古勘探协议书,该工程正式启动。12月1日勘探工作结束,发现墓葬15座、灰坑131个。

10月23日至30日 召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会。

10月28日 北海棣园门大修工程开工。

10月 法华寺文物被盗案及系列文物倒卖案涉案文物1500余件由市公安局移交市文物局。

11月3日 富国街四合院(祖大寿旧居)大修工程通过验收。

11月4日 协助市文研所与通州区文化文物局开始勘测运河沉船工作。

11月6日 召开市“九五”社科规划重

点项目《图说北京史》进度情况会议。承担该项目的市文物研究所作了汇报；市社科规划办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11月19日市社科规划办召开会议决定市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图说北京史》列为明年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精品”。

11月9日 西单一工地发现一座唐墓，协助市文研所对其进行清理。

11月10日 香山罗汉堂抢修工程开工。

完成《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科技进步奖奖励办法》、《北京市文物局科研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

接待了罗马市政府国际关系、旅游、联络部主任诺维利率领的罗马市代表团。

双方就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发展现代化城市的关系、文物保护的管理与技术的经验交流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双方的会谈为明年北京同罗马即将签署的友好城市交流协议中文物保护部分确定了基本内容。下午代表团参观了首都博物馆。

11月12日 通州区北运河整治工程施工中发现一条古船，协助市文研所对其进行清理。

11月13日 德胜门加层工程开工。

11月17日 端门热力工程通过验收。

京师大学堂配殿抢险工程通过验收。

11月 召开北京市城区文物市场工作会议，并着手对各区文物市场实行市区两级分级管理制度。

11月至12月 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循郡王府门枕石丢失事件进行了查处。

12月2日 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天坛、颐和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12月8日 北京图书馆（老馆）装修工程开工。

12月9日 北京饭店改造工程开工。

12月11日 宣武区燕京汽车厂内职工住宅楼工地发现唐墓2座，辽墓1座，其中1座唐墓规模较大，有精美的砖雕影作和壁画。协助文研所清理后，联系古建中心将

砖雕影作和壁画装箱异地保护。

12月15日 完成市第六批危旧房改造中文物建筑保护名单的上报工作。

12月24日 召开颁发北京文物建筑修缮资格书大会。

12月29日 辽金城垣水关遗址通风工程开工。

绒线胡同四合院修缮工程通过验收。

12月30日 东便门明城墙局部修缮工程开工。

12月 完成《北京市社会文物流通管理办法》、《北京市博物馆条例》送审稿工作。

完成对北京市所辖39家文物经营代销网点的年终审检工作。

对海淀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家花园的违章行为进行了调查。

在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孚王府大门西侧违章建筑已被拆除。

国子监街孔庙“清代下马碑倚鼓石撞坏”事件得到查处。

局属博物馆'98 二季度
参观人数一览表

单位简称	总人数	成人人数	学生人数	外宾人数	其中免 费人数
艺博	37950	9229	537	10450	17734
辽金馆	4633	2172	1413	13	1035
古建馆	第四季度闭馆改陈				
正阳门	18780	16980	1200	100	500
首博	135000	30000	25000	25000	55000
大觉寺	12869	10610	1102	94	1063
大钟寺	15131	12287	1211	1633	0
石刻馆	5417	2168	854	564	1831
徐馆	18000	9000	8500	500	0
德胜门	7113	4106	1229	50	1728
西周馆	3727	1851	1242	13	621
大葆台	10000	5300	3400	548	752
智化寺	625	372	110	107	36
团城	2295	1019	384	0	892
总计	271540	105094	46182	39072	81192

(本表由博物馆处提供)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1999 年第 1 辑/张展主编.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3

ISBN 7-5402-1185-7

I. 北… II. 张… III. 历史文物-北京-期刊 IV. K87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572 号

北京文博(1999 * 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 782 信箱

煤炭印刷厂制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00 元



◎ 何鲁丽副委员长参加剪彩仪式



◎ 文物局副局长舒晓峰讲话

老舍纪念馆开馆



◎ 老舍故居内景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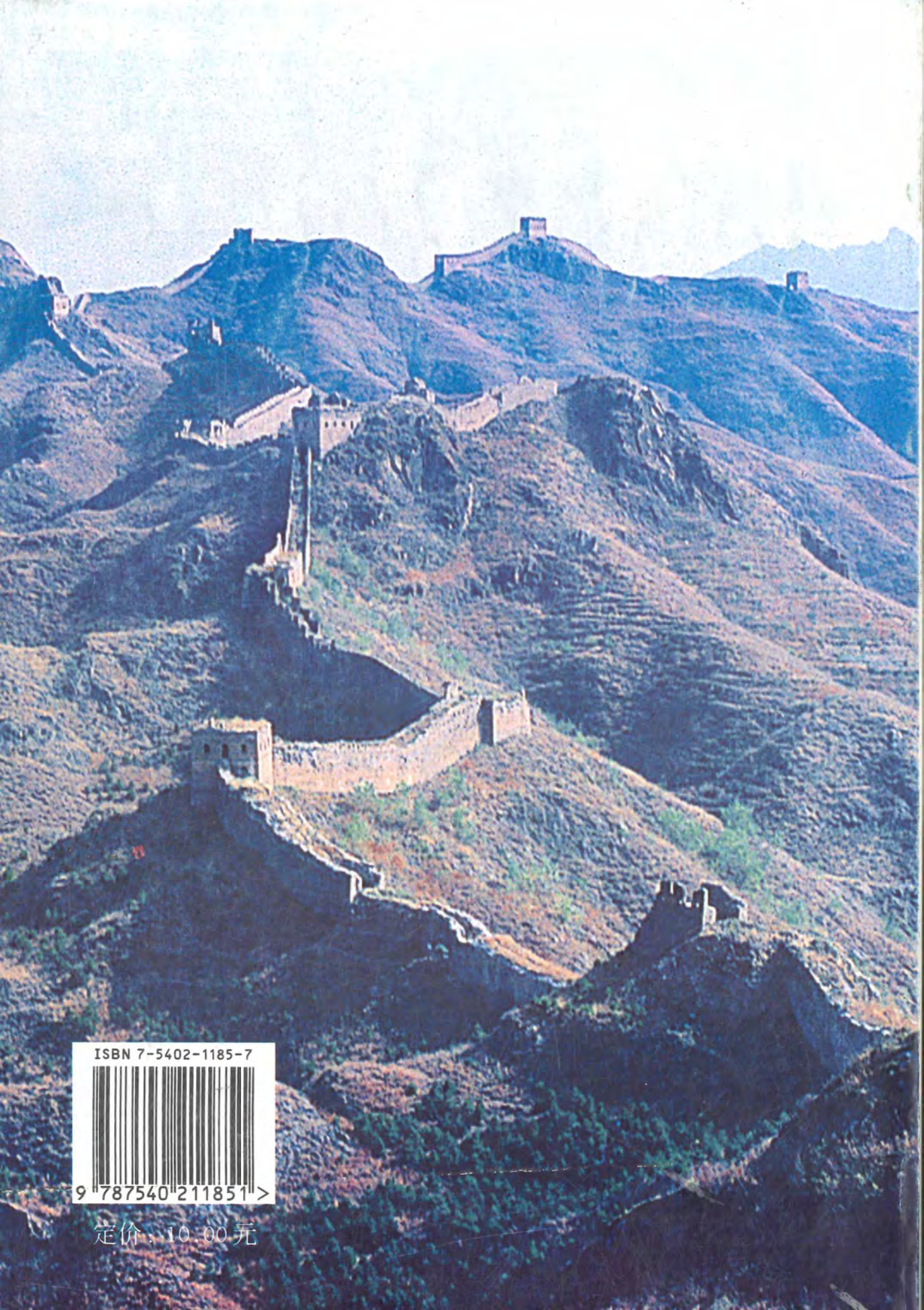
东岳庙民俗 博物馆开馆



③

- ① 开幕典礼会场
- ② 东岳庙首届春节庙会
- ③ 东岳庙历史沿革展

摄影：徐佩仁



ISBN 7-5402-1185-7



9 787540 211851 >

定价：10.00元

北京

文匯

第 1000 號

1951.10.1